

# 炎黄春秋

第 8 期

2012年

**改革开放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天安门城楼秘密翻建始末**

**我所知道的“章罗同盟”**

**田纪云：回忆渡江南下和进军大西南**

**对“民主”的三个认识误区**

## 目 录

### 春秋笔

- 1 改革开放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 晏乐斌  
10 建国前党对新闻自由的说法与做法 ..... 孙旭培

### 亲历记

- 17 我所知道的“章罗同盟” ..... 王 健  
24 回忆渡江南下和进军大西南 ..... 田纪云

### 沉思录

- 27 对“民主”的三个认识误区 ..... 尹保云  
34 审判独立的60年纷争 ..... 崔 敏

### 往事录

- 40 毛主席怎样培育8341部队 ..... 武健华  
47 天安门城楼秘密翻建始末 ..... 陈徒手  
53 贵州“文革”触及“贵州事件” ..... 邓振新  
57 中苏团结旗号下的强迫失忆 ..... 姜万里

### 求实篇

- 60 斯大林为何在党内大开杀戒 ..... 马龙閃

### 人物志

- 64 杜润生：一个符号 ..... 陈越光  
65 张恺帆在1959年 ..... 宋 霖  
72 南京解放前后的陈修良 ..... 唐宝林

### 群言堂

- 80 实践检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韶 华

### 怀人篇

- 84 怀着青年时代的共同理想 ..... 穆广仁  
87 陈翰笙的五个细节 ..... 高 放

### 海外事

- 89 美国政党的轮流执政与司法独立 ..... 董郁玉

### 编读窗

- 92 读者来信摘登 ..... 凌 云 等

### 顾 问

杜润生 于光远 李 锐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卢跃刚  
曲润海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希清 张荣华 张惠卿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李一鑫 李大同  
李冰封 李宝光 李维民 杨天石 杨奎松  
杨继绳(副召集人) 沈志华 苏双碧 陈 敏  
邵燕祥 周瑞金 金冲及 胡德华 赵德润  
保育钧 钟沛璋 郭道晖 资中筠 凌 云  
展 江 徐小岩 秦 晖 袁 鹰 袁伟时  
高 放 高尚全 陶斯亮 钱理群 章诒和  
萧蔚彬 彭 迪 韩 钢 董 健 曾彦修  
鲁 諝 雷 颐 魏久明

社 委 会 杜导正(主任) 吴 思(副主任)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张晓鸥

社 长 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 常务社长 吴 思  
副 社 长 杨继绳 李 晨  
社长助理 胡竞成 张晓鸥 杜明明

总 编 辑 吴 思  
副总编辑 徐庆全  
执行主编 洪振快 黄 钟

总 经 理 李 晨  
副总经理兼网络总监 张晓鸥  
财务总监 胡竞成  
发 行 部 孔 屏(主任)  
办 公 室 王海印(主任)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莊其環 李 琼  
秘 书 长 吴 思  
副秘书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荣赵阔律师事务所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010-85869163)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100045  
网 址 <http://www.yhcqw.com>  
编辑部邮箱 [yanhcq@sina.com](mailto: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mailto:yanhcq@gmail.com)  
发行部邮箱 [yhcqfxb01@126.com](mailto:yhcqfxb01@126.com)  
电 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68539058  
编辑部 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部 010-68525374  
办公室 010-68522852(兼传真)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单本定价 8元 全年定价 96元

# 改革开放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 晏乐斌

## 一、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演变

1949年之后,对敌对分子、敌对阶级的认定,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确认,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政治环境的变化,不断更新、演变。这里,我引用我的同事丁明清(化名)同志在《关于专政对象的演变》一文中的论述:

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对象,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定群体,它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不断显现和更新。对于专政对象的界定,从来没有履行过严格的法律程序,没有进行科学论证,没有征得大多数民意认可,而是国家领导人(主要是毛泽东)根据政治需要的随意施为。所以,这是一个不确定的、随时可以发生变化的、命运难卜的人群。

专政对象,随着革命形势的演变,不断扮演着进入、退出的角色。演变的脉络,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49~1953)

专政对象被统称为“反革命分子”。

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官方对反革命分子界定为“五个方面的敌人”:

土匪头子,中队长以上,惯匪;

特务;

恶霸;

反动党、团、军、政、警、宪骨干:党,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区分部委员以上;团,三青团分队以上;军,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军队连长以上;政,政府科长、乡长以上;警察,警长以上;宪兵,排长以上;

反动会道门头子:点传师以上或相当于点传师和职业办道人员。

### 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1953~1966)

对专政对象的称谓,简称为“五类分子”。

第一类:地主。1955年,第二次镇反运动中,把不法地主列为打击(专政)对象。以后的工作实践中,取消了“不法”二字,守法地主也是专政对象。

第二类:富农。和地主同等政治待遇。

第三类:反革命分子。这是一个涵盖广泛的政治术语,它像一个“筐”,凡是当局认为对政权构成危害或可能构成危害的人,都可以往“筐”里装。例如,除了第一次镇反中界定的“五个方面敌人”外,凡历史上担任过反动职务、有过反动行为的人(敌伪军政警宪骨干、托派、汉奸、叛徒、帝国主义分子、买办、洋奴等),以及虽无反动历史问题,但具有现实危害的人(现行破坏活动,反党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等),则分别称为历史反革命、新生反革命,归于这一类。

第四类:坏分子。毛泽东对坏分子有个笼统的界定,他说:“社会上流氓、阿飞、盗窃、凶杀、强奸犯、贪污犯、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等严重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必须惩办。”(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第五类:右派分子。1957年“阳谋”论的受害者。

1959年,庐山会议后,划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享有右派分子的同等政治待遇。只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风云变幻,他们中一部分人退出了牢笼,一部分人仍受煎熬。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

这个时期,划定专政对象的工作,是混乱、无序的,为所欲为的。专政对象的通俗称谓,叫“牛鬼蛇神”。沦为此类者,遭到法西斯式专政手段的非人折磨与摧残。

对专政对象的具体称谓,除了沿袭旧的名称外,新的花样有: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镇压反革命分子

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

资产阶级分子;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

保皇派;

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家属、子女);

臭老九(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

在湖南省的邵阳地区,当地的造反派在驻军的支持下,划定21种人为专政对象,大肆杀戮,致资江漂尸月余。他们的身份是:

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坏(坏分子)、右(右派)、叛(叛徒)、特(特务)、走(走资派)、臭(知识分子)、党(国民党)、团(三青团)、民(民社党)、青(青年党)、军(国民党和汪伪军人)、政(国民政府和汪伪政府工作人员,含保长、甲长)、警(国民政府警察)、宪(宪兵)、会(会道门分子)、卜(算卦先生)、巫(巫婆)、神(神汉、迷信职业者)。

那个时候,有人把这“二十一种人”,编了一首顺口溜。

即:

地富反坏右,叛特走,

后面跟上一个臭老九。

牛鬼蛇神没个完,

还有军政警宪民青和党团。

会道门,算卦仙,

巫婆神汉站两边。

#### 四、改革开放时期(1978 ~ )

毛泽东从“神坛”上走了下来。列为“祸国殃民的余孽们”悉数“归位”。接着,党内的一代人杰胡耀邦,连续动了几次大的手笔:真理标准的讨论,批判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右派改正,地富资本家摘帽,一律释放在押国民党军政人员等,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变革。真可谓日月重光,否极泰来。那种随意划定专政对象,限人以罪的恐怖勾当,已成历史陈迹,就连“反革命”这个人人恐惧的“罪名”,也从法律条文中删除了,成为一种政治术语。

那个时代所划定的“反革命阶级基础”,后改为“反革命社会基础”,丁明清同志在《反革命基础》一文中写道:

反革命基础,这是中国公安工作的专用名词。它的全称,叫做反革命分子赖以生存与活动的社会基础,或叫反革命社会基础,也有称反革命阶级基础的。这个称谓指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的社会群体。

#### 名称的由来

1954年,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宣布结束。同年6月30日,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中国公安工作将由群众运动转入经常斗争,重点加强隐蔽斗争中的侦察工作,打击隐蔽较深的反革命分子和特务、间谍。为此,调查、监控他们赖以生存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的工作,便被提上了日程。

#### 涵盖的社会群体:

反动阶级的人们:那时的反动阶级,是指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子女。特别是被处决和关押者的家属子女;

敌(国民党)、伪(汪伪)、军、政、警、宪人员;

知识界的反动分子;

社会游离阶层。乞丐、妓女、艺人、卜巫

之类；

民主党派、宗教、民族上层中的反动分子。

并不是上列特定社会群体中的每个人都是反革命社会基础，统统被列为调查和监控的对象，而是有选择的。凡选择列为调查、监控对象的人，还要履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一般地说，在城市，由公安分局审批；在农村，由县一级公安局审批。如果把有影响的高级人物列为反革命基础进行监控，还要由更高一级的公安机关批准。

实施监控的执行人员，一般由公安派出所的户籍民警承担。

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将来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这一批人实际上是国民党”。他把阶级斗争的对象已经由地、富、反、坏、右扩展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是出身这些阶级的知识分子。尤其令人震惊的是，毛泽东把这些人定性为“国民党”。

“文革”的第二年，1967年春，公安部长谢富治视察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东华门派出所，要求公安机关以实际行动支持造反派，支持红卫兵，允许向造反派、红卫兵提供公安机关掌握的“牛鬼蛇神”，包括反革命社会基础名单。

各地效仿北京。造反派、红卫兵手持公安机关提供的名单，私设公堂，随意确定、升级、扩大专政对象的范围，打砸抢烧杀，掀起“红色恐怖风暴”，全国大乱。湖南零陵地区、邵阳地区的造反派成立的“贫下中农最高法庭”，各杀戮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属、子女数万人（吴清濂《难忘196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广西《联指》造反派，成立“贫下中农最高法庭”，采用枪决、木决、石决，推下山岩摔死，推下水淹死等杀戮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属、子女数万人的惨剧（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领导小组调查组报告，1983年12月）。

可以说，在1949年之后的30年里，是人们不断受到各种政治运动“革命洗礼”的时代，是人们不能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时代。在这样的政治

生活环境中，“斗争哲学”大行其道。

## 二、专政惩治、冲击的人数

### 地主、富农分子

地主、富农分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专政对象之一。1946年起，在华北、东北与西北的部分省的根据地，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对拥有较多土地、房屋、财产，自己不劳动，或只附带劳动，靠剥削雇工、佃户的劳动成果，或放贷款当高利贷对待，其剥削收入占全家全年总收入达50%以上者，划为地主成分，其家庭成员中有主持、操纵家务的成年人，划定为地主分子，除按人口分给一定数量的劣质土地和偏僻破烂的房屋外，其余土地、房屋财产，全部没收，扫地出门，无偿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对占有土地，拥有较好的劳动工具与生产技能，自身和家庭成员均参加劳动，雇工或出租部分土地或放贷款，其全家全年收入中的剥削量，已达25%以上的，定为富农成分，其主持家务的成年人，定为富农分子，其出租的部分土地和自耕的土地与房屋、财产与划定的地主一样。在东北、华北、西北部分地区的土改中，对地主、富农在政治上、经济上同等对待，作为专政对象进行专政、批斗、吊打。其全家全年收入中的剥削量达到18%的，定为富裕中农，以团结对象对待。

夺取全国的政权后，在全国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中，对富农的政策有所改变，即按照1950年政务院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对富农的部分出租土地予以征收”，“其自耕土地和房屋、财产等不受侵犯，受法律保护”。但土地改革运动实际执行中，所谓“征收”，实际是没收。在政治上对富农采取孤立政策。到了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以后，对富农分子采取专政，被纳入人民群众的“包夹改造”之列，进行监督改造，限制人身自由。对富裕中农则列为资本主义势力对待，农村有了资本主义苗头，便在他们中找。

1951年全国土地改革运动高潮中，毛泽东估计全国地主、富农分子的人数，约占全国人口的5%。那时全国总人口4.5亿，90%在农村，即4.05亿农村人口，地主、富农分子有2025万人，以一



《中国的反右运动》封面

家5口人计,则地主、富农家庭成员,包括地富分子在内,计有1.0125亿人。

毛泽东这个估计数是否准确?我们根据现有数,并考虑时间的变迁因素,予以验证。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经胡耀邦等于1982年给仍然活着的地、富分子摘掉政治帽子,恢复其公民民主权利。这时,只剩下440万人了。

土地改革运动的年代和以后的岁月,正是毛泽东形容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年代,地富分子和其家庭成员处于“暴风骤雨”的中心。生存条件十分恶劣,到了1982年,30多年过去了,按照人生的自然规律,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当年的壮年与老年的地主、富农分子,难以活到七八十岁,可能早已走到人生的尽头。这些当年40开外或50岁、60岁的地主、富农分子,约占地主、富农总数的一半,即2025万减去一半,剩下1012.5万,是当年的青壮年地、富分子。这些人在30年的阶级斗争风浪中,累遭批判斗争、吊打,被打死、折磨死的,饥荒年代饿死的,自杀的不在少数。这一少半人,就是1982年摘掉地主、富农帽子的440万人。

## 反革命分子

反革命分子,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对它的领导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法律制度,持敌对态度的人们。这是各种类型反革命分子的总的称谓。

历史反革命分子。旧政权下遗留下来的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专政对象之二。1950年10月10日,经毛泽东批准,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对“五个方面的敌人”纳入打击对象。他们是:

反动党、团、军、政、警、宪骨干分子。党,含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区分部委员以上;团,三民主义青年团区队长以上;军,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来,军队连长以上军官;政,科长、乡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排长以上为骨干。

特务分子。为国民政府、日、汪伪政权搜集情报的军统、中统、保密局、情报总部、总局的情报、间谍人员与嫌疑人员。

恶霸分子。依仗国民党政权和封建等黑恶势力,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善良,侵犯他人生命、政治、经济利益的人。

土匪头子。从打家劫舍,抢掠财物,残害人命,危害社会治安的经济土匪,发展到配合国民党残余分子,杀害干部、群众、颠覆新政权的政治土匪中的中队长以上的骨干。全国匪众达200万人。

会道门头子。点传师以上、职业办道人员,打着宗教旗号,以封建迷信为手段,在人民群众中秘密串联,发展秘密组织,在网罗人员已达到一定数量与占领一定地盘后,其首领萌发登基称帝的政治野心,妄图夺取政权,1952年全国发现其成员近2000万人,骨干分子89万人。

1949年10月,毛泽东在绥远(现内蒙古自治区)接见傅作义将军部下起义部队将领时的讲话中有一个估计,他说,国民党党政军警宪人员,留在大陆有1000万人。1950年11月,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正紧张进行时,他对反革命分子的人数,也有一个估计。他说,反革命分子的人数,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二、三,但分布不均匀,有的地方比例高一点,有的地方比例低一点。那时,全国人口4.5亿,1%,是450万,2%,是900万,3%,是1350万。

毛泽东这两次估计,应该是相近的,即前面所指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有1000万至1400余万人。第一次镇反运动(1950年10月~1953年),打击的对象是历史反革命,逮捕判刑、处决、管制共计500万。第二次镇反(1955年~1956年),第三次镇反(1957年9月~1958年),整风整社运动(1960年~1962年)、“四清”运动(1963年~1966年)、“文革”运动(1966年~1976年),对残存的历史反革命的打击,从未停止放松。27年间,逮捕判刑、处决、判处管制的历史反革命也有500万。两者相加,1949年夺取政权以来的二十七年间,共打击处理了历史反革命分子有1000万人。那时,全国农村共有42889个人民公社,847894个生产大队(村)。大部分人民公社中的反面教员(地富反坏右分子)的门类应该是齐全的,生产大队中的这类分子门类不一定齐全,但最少也有五六人。如果其中一半是残余历史反革命分子250多万个,加上城市中的残余历史反革命,全国未经过打击处理的残余历史反革命的数量,将不少于400余万人。

这样,二十七年间打击处理的历史反革命1000万人,未经打击处理的历史反革命400余万人。两项合计,全国历史反革命的基数为1400多万人,同毛泽东的估计相差不多。

#### 冠以各种罪名被专政、冲击的人群

冠以各种罪名被惩治的人群,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交错被惩治、处理的人。这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内部肃反、内部清理那“五方面的敌人”未包含在内,随后的一些政治运动中,以及平常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受到冲击的人,有叛徒、内奸、汉奸、托匪、阶级异己、帝国主义分子,买办、洋奴、民族分裂分子,宗教界的反动分子,大汉族主义分子,叛国投敌分子,共12种人。

叛徒。原为共产党员或革命组织、外围组织的成员,后背叛了共产党或革命组织,投靠了敌人,破坏革命事业的人,或被国民政府、组织、人员逮捕、关押过的人。这些人在镇反、内部肃反、内部清理整顿时,都被严格审查、清理,有的被逮捕法办而过了关,有的通过审查、清理,问题已弄清,留在内部给以一定的工作,给他以生活出路;有的放回社会,自谋职业。可是到了后来的政治

运动中又重新对其进行审查、清算的人。

内奸。受敌人派遣,隐藏在新政权组织内部,进行破坏活动的人;或革命组织成员,被敌方策反、利用,按敌方指示进行活动的人;或新政权组织工作人员,与被审查的贪污嫌疑人,肃反嫌疑人,反右倾运动被审查的嫌疑人有过接触的人,也被认定为内奸。

汉奸。为日伪、汪伪政权和外国势力,出卖祖国,出卖民族利益,甘心为外国侵华势力服务,充当侵略者走狗的中国人。

托匪。亦称托派,前苏联托洛茨基派的简称。斯大林从1920年代开始,在苏联掀起了清剿托洛茨基匪帮的运动。这是一桩被斯大林颠倒是非的冤案。中国共产党追随斯大林,在其根据地时期和1949年取得政权后,在公安机关的政治保卫部门设置有专门机构“肃托”,对中国的托派进行了镇压与取缔。开始称托匪,后又改称托派,人数较多的有山东、江苏、上海、广东、香港等地。抗日时期,在根据地的山东湖西地区、泰安地区的肃托,搞得残酷,泰安地委社会部长武戈(化名)领导的肃托,就处决几百人(抗日时期曾任泰安县公安局长、后任中南公安部处长、中央公安部处长、吉林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夏新生态同志1983年来京时亲自告诉笔者)。

阶级异己分子。隐瞒剥削阶级家庭或个人担任反动职务的真实身份,混入革命组织内的人;或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参加革命工作后,仍坚持反动立场的人。

帝国主义分子。1949年前,为外国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侵略利益服务,新政权成立后在华居留的外国人。

买办、洋奴。1949年前,为外国资本家、传教士、驻华机构服务,在外国资本家在华开设的洋行、工厂、公司、仓库、银行中充当高级职员中国人;为外国传教士开设的教堂、学校、诊所、医院,充当职员、服务人员的中国人。

宗教界的反动分子。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中有影响的人士,反对共产党或与境外、国外的反动势力勾结,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分子。

民族分裂分子。在少数民族中,反对共产党,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煽动民族独立,分

裂祖国的分子。

大汉族主义分子。在少数民族地区,那些认为汉民族是优等民族,主张享有特权,欺压少数民族,破坏民族团结的分子。

叛国投敌分子。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公安、国家安全、外交等部门掌握国家机密的工作人员,叛逃出境或合法出境,向敌对国家出卖国家利益、机密、情报的人。对于这一类的败类,应予以严惩。但是,自1949年以来,一些人想往国外生活,非法出境,或因公因私合法出境,滞留不归,并未叛逃、叛国、出卖国家利益和情报,也往往以叛国投敌对待。

以上“冠以各种罪名被惩治”的十二种人,全国约有300万。

### 新的反革命分子

新的反革命,即新生反革命,亦称现行反革命,与老的历史反革命相比较而言,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惩治专政的人群之一。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人由对政府的某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政策的不满,进而发展到有过激、敌对行为的人。如,所谓的“恶攻”(领袖、党、党政领导人)案件、政治性组织案件等等。它的数量是政府历次打击行动中,逐年积累起来的。从毛泽东主政到他去世的二十七八年间,几乎每年都对现行反革命活动进行打击处理,他发动的政治运动,从来都将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列为重要内容。当时的中国是以意识形态定是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度,无论什么问题与是非,都要打上政治烙印、阶级烙印,识别打击新的反革命也毫无例外。一个人是否是新的反革命分子?他的行为是否构成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首先要看他是否出身剥削阶级,在历史上是否同旧的政权、反动组织、反动人物有政治上的瓜葛,是否具有地主、富农、资本家子女、反革命家属、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与士兵,基层政权的保长、甲长、警察、宪兵的一般人员,会道门的徒众的政治身份。同样一个问题,比如,打架斗殴一类的小事,如果发生在工人、贫下中农身上,就属于一般民事纠纷,各级政府官员是不过问的;如果发生在上述具有某种政治身份的“反动社会基础”的人身上,就是大问题,官员们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判断,一般事件就可能变成政治事件,用阶级分析的方

法进行分析判断,就可能变为反动阶级对革命阶级报复,是反革命复辟活动,是现行反革命案件。用扭曲了的心态,来分析处理社会现象,现行反革命分子多得不得了。这是这个时代的一大特征。

1949年至1976年,发生的现行反革命案件2200万件,按一案1至2人,被判处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是4000万人左右。若按3000万人计,加上历史反革命分子1400万人,就有4400万人投入监牢、劳改队。

### 坏分子

坏分子,作为共和国的一个“罪名”,是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由毛泽东提出来的,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专政惩治的人群之二。到了1957年,毛泽东对坏分子的含义,做出了解释。他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这样,所谓坏分子,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刑事犯罪分子。

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去世,全国共发生刑事案件1000多万宗,按一案平均以2人计算,约有刑事犯罪分子2000多万人。

中国与外国的法律制度不同。在外国,刑事犯罪分子在服刑期间是罪人;刑满释放后,除少数依法继续剥夺其公民权利者外,都是享有公民权利的正常人。中国则不然,中国有“多留少放”,“刑满留场就业”的政策,即70%的刑满人员则要留场就业,主要是怕这些人放回社会后重新犯罪,危害社会。这一政策是1952年下半年公安部召开的一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决议,上报毛泽东批准后决定下来的,1953年开始执行。30%的人释放回家。刑满释放的人,还被称为“劳改释放犯”。而留场就业的刑满人员,则被称为“刑满就业职工”,当“二等公民”对待。少数有幸释放回家的人,仍被戴上“坏分子”的政治帽子,由群众监督劳动。所以在当时的中国,坏分子的政治帽子一旦加身,将伴随终生。

“坏分子”在中国还有一个独特之处,他包括刑事犯罪分子,还包括“公众认为是坏人的人”。这一罪名,从来没有作过法律规定与权威的解释,没有严格的批准程序,随意性很大。这就给

那些称霸一方、为所欲为的基层干部与某些官员，提供了他们侵犯他人人权的空间和机会。在农村，贫下中农子女，政治地位高，基层干部对他们比较忌讳，不敢得罪他们，不敢随意加罪。而地富反坏右、刑满释放人员、原国民党党、团、政、军、警、宪人员及其家属子女，和其他被人冷眼对待的弱势群体、牛鬼蛇神，就成了基层干部、某些官员作威作福的发泄对象。什么“谩骂干部”、“不听指挥”、“不服从领导”、“挑拨干群关系”、“维护反动家庭利益”、“反攻倒算”、“破坏生产”、“破坏团结”等等罪名与指控，都可以成为戴“坏分子”帽子的根据。这些怪事非一地专有，而是全国的普遍现象。

据最保守的估计，在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刑事犯、右派分子中，至少每两人里有一人的子女是“继承父业”，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加上原国民党党、团、政、军、警、宪、特人员及其子女家属，被戴上“坏分子”帽子的，约3000万人。有刑事犯罪身份的坏分子，和没有刑事犯罪身份的坏分子，两项相加，全国坏分子的人数当不少于4000万人。

### 资产阶级分子

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分子，是区别于官僚资产阶级的民营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新政权把他们按敌对分子论处，民营资产阶级官方称作民族资产阶级。五星红旗中的一颗“星”就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

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由座上客，变成了“阶下囚”。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要惩治专政的人群之三。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展社会主义改造的“公私合营”运动中，先是将私营工商业雇工10人以上者，定为资本家，继之，又将雇工7人以上者，定为资本家，到了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高潮中把民营的旅店、商店、作坊、工场中凡雇工（或学徒）3人以上者，定为小业主，按资产阶级分子对待；农村土改中作为团结对象的中农，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按资产阶级分子、资本主义势力对待。

当时，城镇里定为资产阶级分子的人，有人估计，约300多万。1982年，给活着的70多万资产阶级分子摘掉帽子，给予公民权利。



批斗彭德怀

### 反党分子

这里所说的反党分子，是指1949年以来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中，所形成带有规模性的反党分子。至于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对少数人，或个人所定的反党分子，比较零碎、分散，不包括在内，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要专政惩治的人群之四，其中：

右派分子。据官方于1982年公布的数字，全国共划定资产阶级右派552973人，1982年止，给予改正552877人。但是郭道晖在《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一文（《炎黄春秋》2009年2期）中说：“2005年5月中共中央解密档案，1957年整风、反右和1958年反右补课，全国共划右派3178470人，实际划为右派分子的，是1982年官方公布的55万个右派分子的5.74倍，还有1437562人定为中间偏右的‘中右分子’，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定为有右倾思想的有几百万人。对被定为右派的人，绝大部分送劳动教养场所，集中监督改造，少数人送农村和农场监督改造。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59年，在全国掀起了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运动。据中央组织部统

计、公布，这一运动在全国打了380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中中共党员达365万。

“表现坏的坏人”。这是农村人民公社进行整风整社的用语。1960年冬至1962年，毛泽东在全国的农村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将公社和公社以下的基层组织、基层干部队伍划分为四种类型：一、表现好的，紧跟党中央部署，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工作有成绩的；二、表现比较好的；三、表现差的；四、表现坏的，指坏人篡夺了领导权，或蜕化变质分子，办了坏事的人。全国有五分之一的社队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列为第四类的人不少于500万人。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1963年毛泽东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便于1963年至1967年1月，连续在全国城乡开展“四清”运动，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国从机关、团体、厂矿企业、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四清”和清理整顿中，清理出来被戴上走资派、四不清干部、有问题的人或坏人帽子的，约有1000万人，从干部队伍中清洗出去。

1958年至1959年“大跃进”运动中，基层社队组织、干部，甚至地、县级党政领导干部指令基层组织，对那些大法不犯、小法不断、小偷小摸、不参加集体劳动、不听指挥和顶撞干部、破坏生产、挑拨干群关系、阶级报复等类罪名的人，非法私设集训队、劳改队、劳教队，进行刑讯逼供、罚跪、吊打、折磨，全国受到惩治的达3000万人，少算也有2000万人。在1959、1960年反瞒产私分运动和大饥荒年代，省、地党政机关的负责人将责任推给县和社队基层干部与社员，关押打击了一批人，全国不下3000万，少算也有2000万基层干部与社员群众受到惩治。

1959年10月，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根据浙江省公安厅总结该省诸暨县枫桥区对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关于十个好人包夹改造一个坏人，矛盾不上交社会改造的经验》，上报毛泽东，得到毛泽东的赞赏与肯定，遂向全国进行了推广。这项名为“社会主义改造五类分子的运动”在全国开展，一直延续到“文革”开始，全国达2000万人。包夹改造五类分子，限制人身自由，外出要经过

批准，每半个月要向包夹改造小组作口头或文字汇报改造表现，定期进行训话，接受教育。

### “文革”时期被专政、惩治冲击的人群

“文革”10年，是中华民族的空前浩劫。“文革”中迫害人，给人以罪名的，名目繁多。就反党分子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还有什么“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保皇派”；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找不到合适罪名加害于受迫害者时，就以“牛鬼蛇神”代替统称。前述湖南邵阳地区的造反派，就给被迫害者列了21种名称的罪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据辛子陵的著述，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讲话中指出，“文革”中全国整了一亿人，死了2000万人。

### 受惩治人群的估算

如前所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惩治、专政的地主、富农分子，为2025万人，历史反革命分子为1400万人；冠以各种罪名的人300万；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新生反革命分子3000万人，坏分子4000万人，资本家资产阶级分子300万人，反党分子2200万人（包括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走资派和划为第四类的坏人）；1958年~1959年对大法不犯、小法不断等类人打击2000万人；1958年~1960年基层干部、社员受打击迫害2000万人；“文革”时期的1亿人；1959年~1966年包夹改造五类分子2000万人。

这些统计数字不包括公办的劳动教养的600多万人，收容审查、强制劳动、集训的200多万至300多万人，更不包括公社、大队私设的劳改队、劳教队、强劳队、集训队限制人身自由的人。

## 三、劳动教养、强制劳动与收容审查

### 劳动教养

1957年7月，公安部与内务部共同商讨研究，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有劳动能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为了进一步维护公共秩序，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就收容劳动教养问题，两部联名向国务院作了报告，

我参加了两部向国务院报告的起草工作和《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的起草工作,不久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申请。1957年8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该《决定》对下列几种人,收容劳动教养:

一、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等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

二、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三、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能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四、不服从工作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

劳动教养就性质来说,该《决定》明确地说:“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员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行政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从同年的8月份开始,采取了:

一、1955年4月至1956年,第二次镇反和内部清理、内部肃反运动中尚未处理的一部分人,继续留在内部不适当,又无适当办法处理他们,就将他们送去劳动教养;

二、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和1958年反右补课,全国城乡定了300多万右派,其中多数送劳动教养场所;

三、按照《决定》规定的四项劳动教养收容范围,以及随后开展的各项政治运动,和公安机关破获的反革命案件,各种刑事案件中,不够追究刑事责任,放回社会又有危害的人,自1957年8月至1980年代初的二十五六年来,收容劳动教养的人,达500万。此外还应提到的是,公安部办公厅对1958年县以下的公社私设劳教队,据14个省的不完全统计,共强制收容了300多万人。

四、1983年8月至1987年,全国开展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三次严打战役中,对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而收容劳动教养,不少于100万。

### 强制劳动、收容审查

1959年以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批准,各地公安机关,对轻微违法犯罪的人和流窜犯罪与重大流窜犯罪嫌疑的分子,以及逃避改造到处流窜的四类分子,还对在大饥荒年代大批民众,主要是农民为了求生存外出逃荒乞讨,被当成盲流、流窜犯进行围堵、拦截,收容审查,先后出台了《关于强制劳动的决定》和《收容审查的决定》。

地、县公安机关强制收容和收容审查的人员,从1959年以来,到21世纪初的50多年来,究竟强劳、收容审查了多少人,官方未公布过,只有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强劳所、收容所,一个一个地查和搜集,才能弄清楚,笔者估算不少于2000万人(不含县以下私设的强劳、收容站队)。■

(作者后记:本文引用了我的同事丁明清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演变》一文观点与素材。)

(作者为公安部退休干部)

(责任编辑 黄 钟)

## 本刊声明

为保护本刊和作者权益,凡转载本刊文章,请注明“转自《炎黄春秋》”。

##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一稿一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 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 100045

本刊电话: 010-68534879

传 真: 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 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 建国前党对新闻自由的说法与做法

○ 孙旭培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间的28年里,民主自由始终是党最响亮的口号之一。中国共产党对于新闻自由的态度,与第二国际的做法不同,与共产国际的做法相同。

## 20世纪40年代党对自由民主的追求

毛泽东的有关论述甚多。1942年2月,在《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一文中,他批判国民党“言论不自由”,“党禁不开放”,要求国民党政府“开放党禁,扶植舆论”。1943年要求“诚意实行真正民主宪政,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1945年在七大政治报告中,他说:“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他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1945年9月,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书面提的第十个问题是,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毛泽东做了如下回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中共在重庆办的党报《新华日报》和在延安办的党报《解放日报》,对于民主、自由的宣传更是不遗余力。

### (一)对《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宣传民主、自由的内容分析

《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分别作为国统区和

解放区公开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最为重要的两份报纸。在20世纪40年代两报发表了大量的言论。这些言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便是宣扬民主与自由。

为了准确地说明两报20世纪40年代言论的特点,笔者和自己的研究生董柳,曾选取从1940年1月5日(《新华日报》发表《论冬季出击的胜利》)至1947年3月27日《解放日报》停刊这段时间,两报的关于民主和自由的言论进行量化研究。本文所指的言论包括两报在40年代发表的社论、短评、时评以及附在评论后的诗歌(如《新华日报》1941年7月9日附在《隧道惨案善后问题》后的诗歌《快给我们呼吸自由》;1943年7月4日附在评论《真实的民主战士》后的诗歌《为了人类》)。

这项研究对1940至1947年有关民主自由,以及涉及民主自由言论的文章进行了统计。

表一:两报1940-1947年各年度有关民主自由言论的篇数统计:

年份	言论总篇数	新华日报言论篇数	解放日报言论篇数
1940	2	2	0
1941	7	2	5
1942	11	7	4
1943	12	10	2
1944	31	29	2
1945	22	20	2
1946	16	15	1
1947	1	1	0
总计	102	86	16

表二:两报1940-1947年涉及民主自由言论的总篇数统计:

	内容涉及民主的言论	内容涉及自由的言论	内容既含民主又含自由的言论
新华日报	53	21	12
解放日报	10	2	4
总计	63	23	16

(注:“内容涉及民主的言论”和“内容涉及自由的言论”均不包括既有民主又有自由的言论,如《言论自由——民主的基础》没有统计在前两者之中,而统计在“既含民主又含自由的言论中。)

从表一可以看出,1944年、1945年,也就是在抗战后期,两报的民主自由言论最活跃,尤其是《新华日报》,民主自由言论的总篇数分别为31篇和22篇。从表二可以看出,两报在40年代均有涉及民主和自由的言论,其中有关民主的最多,高达63篇,而又以《新华日报》为甚,为53篇。关涉自由的言论达23篇,也是《新华日报》最多。既论述民主又论述自由的言论总计有16篇,仍以《新华日报》居首。原因在于《解放日报》言论的重点是宣传党的路线以及怎样建设解放区,虽然也有关于民主自由方面的言论,但从数量上来说,远少于《新华日报》。

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历史的先声》,把《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上的关于自由民主的社评以及其他文章等编辑在一起。这本书上的文章都是由共产党人或共产党的同情者撰写的。看看那些文章的标题就知道其主要观点了:《中国人民早就有实行民主政治的准备》《不能因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中国共产党不是苏联那样的共产党,不会模仿苏联的社会和政治制度——1944年毛泽东与福尔曼的谈话》《一党专政反民主,共产党绝不搞一党专政》(刘少奇)、《政党本身不是权力机关,不能凌驾于群众和政府之上》(徐特立)。从这些文章上,读者不难看出,共产党的民主观念与国际上通行的民主观念并没有什么区别。

## (二)对40年代两报民主和自由言论的内容分类

### 1. 争民主主要是争政治民主

在两报的民主、自由的言论中,争取什么样的民主所占的比例最大。关于争取什么样的民主,大致有三种,一是争取经济民主,二是争取民主权利,三是争取实现政治民主。其中,争取政治民主的言论占大多数。

争取政治民主主要是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组建由普选产生的国民大会,召开新政协会议,组建民主联合政府等。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在答中外记者团时说:“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为了打倒共同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及一个很好



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延安《解放日报》的创刊号

的和平的国际关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评论称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开头即指出,“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最后,“结束党治,不会使国民党削弱,只会使它加强起来”。《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的社论,则呼吁要“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并称这才是“民主的正轨”。针对1946年全国范围内的自然灾害,《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社论直接以“一党独裁,遍地是灾”为题,“老实说,国民党内反动派的内战及维持一党专政的政策是建立在制造饥饿和灾荒上的,所以这些救灾的治本办法,只有国民党确定的和各党派一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时,才能完满解决”。

争取经济民主以1944年12月26日《新华日报》发表的社论《经济界需要民主》,和1945年2月8日《新华日报》的评论《中国工业化与民主是不可分开的》为代表。争取民主权利的评论也很多,《解放日报》评论明确指出,“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边区过去

早已注意保护,今后仍当循此前进”。

## 2. 强调言论出版自由的基础地位

在40年代两报的有关自由的评论中,论说自由的文章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人身自由、读书自由、学术自由、思想自由、人民自由、国家自由等。其中,涉及最多的是争取言论出版自由,而在评论言论自由时,民主与言论自由的关系论述最多。这是因为言论自由是“第一自由”,是民主运行的基础性条件。出版自由则是言论自由的延伸。而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又构成了新闻自由(从清末以降,出版自由从内容上都包含报刊自由、新闻自由,到1944年出现新闻自由一词)。《新华日报》刊登题为《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的评论,说“言论出版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是民主还是独裁就看有无言论自由”;该报还刊登《出版业的危机》一文,指出以出版自由繁荣出版业是解除精神匮乏的不二法门。

每年的“九一”记者节前夕是各媒体为言论出版自由造势最活跃的时候。重庆社会的大气候就是争民主,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统治组建民

主联合政府。而对于新闻界来说,争民主的前提就是要争言论出版自由,这是民主政治的先决条件。记者节前几天,有几家报纸就有意刊登言论自由的文章,为记者节造势。1944年8月31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引用邱吉尔的话说,讲言论自由时“提出一大堆批评不得的人和事,结果在事实上等于取消言论自由。”社论还提出了判断是否有民主的三个最低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是不是人民有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选举等权利和身体的自由。”次日,《新华日报》又发表了短评《记者节的真意义》再次阐明了言论自由。1945年记者节时,新华日报刊发时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揭示了新闻检查制度对言论出版自由的戕害。

## 3. 对当时社会上有关民主自由错误思想的批判

两报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是在批判当时社会上有关民主自由错误思想的同时进行的。

当时社会上有关自由的错误认识主要有:(1)认为自由在当时的中国万万不能实行。《和平日报》1946年1月17日的社论即宣扬这种观点,《新华日报》在次日即发文《实现自由是“不切实际”吗?》否定了在中国不能实现自由的观点。在《论学术自由》中,庄沙音对学术自由是洪水猛兽的观点给予了批驳。(2)不从正面而从侧面反对,借自由不是绝对的来最终否定自由。对这一问题,潘梓年发表《学术思想的自由问题》,从学术思想自由的角度反击了这种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自由的做法。(3)认为民主可以等人家给予,认为一国的民主可以由国际条件来决定的观点。《新华日报》的社论反驳了这一类观点,认为“……他们就要以主动积极的态度,以明确和坚决的精神,根据民主原则来参与国事,来掌握中国的命运;这样一个民主的新中国就一定要实现”。

## 延安整风时期党报理论的形成

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基本上是按照列宁的要求和共产国际的规定行事的。共产国际为各成员党规定了十分严格的党报体制。“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一切定期和不定



《新华日报》1945年8月28日为毛泽东到达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出版的号外

期的报刊、一切出版机构都应该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在各级党组织内实行像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因而党内只有铁的纪律,而没有言论自由。

中国共产党的党报体制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形成的。整风运动之后,首先是一种新的新闻宣传理论体系诞生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体系。

### (一)延安整风时期党的宣传工作基本情况

1942年3月11日,毛泽东说要通过改造党报来改造党,发出了全党整风的信息。应该承认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了解毛泽东发起和组织的这次整风的真正意图。包括博古在内的党的高级新闻工作者也没有真正领悟到毛泽东通过改造党报来改造党的精神所在。

作为革命的领导人,毛泽东需要的是一支可以利用的笔杆子队伍,一支听话的宣传队伍,而不是书生们办的同仁报。毛泽东需要通过报纸来指导实际工作,可他发现他的一些指示并没有在《解放日报》上得到特别的突显。毛泽东指出:“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以推动其他部门的改造。”

可是,从1941年、1942年《解放日报》的版面上安排的内容看,很容易看出当时党报上宣传国际的东西占了相当的比重,而对于根据地的内容报道量相当少。而且,《解放日报》往往“孤立登载着中央的决议指示,领导同志的论文,而没有加以发挥和阐明,对于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形经验检讨则毫无反映”。例如,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著名讲演,标志着整风运动的开始。可是报纸第二天只在三版的右下角发了一个三栏题的简讯。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用陆定一的话说,是因为“抗战以后,参加党的新闻事业的知识分子,乃是来自旧社会的,他们之中,也就有人带来



重庆新华日报旧址

了旧社会的一套思想意识和一套新闻学理论……这套思想意识,这套新闻学理论,是很糊涂的,不大老老实实的,甚至是很不老老实实的,也就是不大科学,甚至是很不科学的。如果不加以改造,不加以教育,就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就无法把党的新闻事业做好”。于是,在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对资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斗争,就此开始了。

### (二)党报理论的形成

延安整风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新闻理论作了一次较为系统的整合,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党所领导的新闻宣传事业作了一次较全面的整顿,对一些书生办报的思想、习惯、情调、作风作了一次深入的清算。

#### 1. 对于党报理论问题研究进一步强化阶级分析的方法

运用此方法的代表性的人物为张友渔。他在1946年发表的《读报也是一门学问》中指出:“决没有一个报纸是没有什么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背景的,决没有一个报纸是不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政治斗争的武器的。”因为“社会本身既是阶级斗争的社会,因而成为社会的一现象的新闻,也不能不是阶级斗争的一表现,故所谓新闻,不外是阶级对立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武器,即压迫阶级,用新闻维持他的支配地位,被压迫阶级,用新闻反抗压迫阶级,还有同一阶级,在分解过程中有时也用新闻互相攻击。”延安整风运动将新

闻传媒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重要的观点，深深地扎进了党报工作人员和党的宣传工作者头脑中。

## 2.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新闻事业

运用此法的代表性的人物为陆定一，他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表示，传统的新闻学必须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因为在陆定一看来，“传统的新闻学”都是不老实的，是唯心论的。因此陆定一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阐述了无产阶级新闻学的一些基本的问题，也批判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新闻学观点。文章对新闻的真实性问题作了具体的探讨，他一方面肯定了资产阶级新闻学必须具备的五要素，即时间、地点、人名、事实的过程与结果的观点，但又指出这是不够的，因为这五要素还不能保证新闻的真实性，还必须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密切联系群众、联系实际，才能写出真实的新闻。但根据这种理论，大量不符合革命利益需要的新闻就失去了见报资格。

## 3. 开始有目的地、系统地建立自己的新闻学体系，即所谓无产阶级的党报理论体系

总括国内学者对于延安整风时期党报理论的研究，可以发现大多数学者认为延安时期的党报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对党报的功能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强调党报是“革命政策和革命工作的宣传者与组织者”。二是梳理了党报的特性，即认为党报具有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三是强调全党办报，认为“党必须动员全党来参加报纸工作”。如中央西北局《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中规定：“各分区党委及县委的宣传部长均应担任《解放日报》通讯员，并与报馆取得直接联系。”而《解放日报》在《本报创刊一千期》的社论中则明确表示：“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全党办报更使得报纸就是党报。四是坚持新闻为党的实际斗争服务，认为党报要正确处理政治性与真实性的关系。客观、公正地报道事物在无产阶级新闻学中失去了尊严。让事实服从立场，在历史上多次产生过很严重的后果。

政治功利主义的新闻观，通过陆定一和胡乔木的解释，最早在延安《解放日报》体现出来。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在陆定一、胡乔木的领导下，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成了一份地地道道、名

副其实的“党报”。在版面安排上，《解放日报》彻底改变了“一国际(突出报道当时的苏德战争和苏联红军抵抗入侵德军的战况完全符合读者的愿望)，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市”的惯例，而变为“一边区，二解放区，三全国，四国际”的报道和版面安排的顺序，将国际和国内新闻降至次要地位。对刊登国际新闻更是从严掌握，所有国际新闻，一律须重新编写，严禁照登外电原文。

为了在组织上保障党的观念的加强，一方面要求用党性的原则改造党报的新闻工作人员，清理整顿党报工作队伍。另一方面还从制度的建立上下工夫，如《解放日报》在内部建立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1)编委会的每一个成员分工联系一个党政军领导机关，使党的观念落实到实处；(2)建立审查稿件制度，规定重要社论、消息、通讯、文章由党中央审定；(3)建立检查报纸制度，实行领导人看大样制度。

在报道内容上，《鲁忠才长征记》(发表于1941年9月14日的《解放日报》)成为当时毛泽东称赞和推荐的新闻报道的样板。这个报道具体地记述了向县城关区运盐的经验，包括牲口数，往返日期，沿途的各站概况，生活情况及问题，经验教训等。后来形成的传统是，只要是宣传党的中心工作和一切为中心工作服务的事物，不管是否读者感兴趣的新闻，都是党报的宣传重点。从40年代《解放日报》刊登的陕甘宁边区某地成立变工队，到六七十年代北京市每年刊登各家入冬储存大白菜，以及各省报催耕催种的报道，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总是上报纸的头版，甚至头条。而国际新闻再大，也成不了头版头条(上世纪50年代苏联的新闻除外)。

## (三)《解放日报》改版的后果分析

### 1. 《解放日报》改版使党报与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拉开了很大距离

向全党宣传苏联共产党的新闻理念，从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第二版刊登的一个专栏可见一斑，在这个专栏中刊登了“列宁论党报”、“真理报介绍”、“联共八次大会关于报纸的决议”等方面的内容，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闻观点从没有提到。实际上，延安整风确立的党报理论遵循的是列宁、斯大林的新闻理念和主张，而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闻思想。从此，党报与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

想拉开了很大距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上鼓吹新闻自由,在本党的报刊上也助长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恩格斯指出新闻要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而不是一种置于两者之外的独立力量,但同时,恩格斯还强调要保证新闻的“形式上的独立”,这样新闻便具有一种抵制错误思想路线和思潮的能力,使之不至于成为某一权力集团为所欲为的工具。

延安整风前,《解放日报》的副刊还能刊登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那样的对延安存在的某些不合理的等级差别与官僚主义有所批评的杂文,但在整风和改版开始以后,王实味和他的杂文就受到猛烈的批判。接着以各种最终都不能成立的理由将王实味逮捕、关押,以致最终将他处决。这样做,对报刊批评和革命队伍中的言论自由造成巨大的威慑和压制。

通过《解放日报》改版,新闻宣传工作者和党的领导人对于党报的认识和理解,可以用如下的一句话来总括,即党报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代表党(实际上是指党的最高领导)。比如,1942年8月8日,陆定一被任命为《解放日报》的总编辑。9月5日他在编委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批评意见,强调报纸对于政策问题的宣传,必须经常向中央请示报告。他指示以后凡是重要新闻,小至消息,大至社论,必须与中央商量。不能闹一字一句的独立性。9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重要社论《党与党报》指出:“报纸是党的喉舌,是这一巨大集体的喉舌。在党报工作的同志,只是整个党组织的一部分。一切要依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动、一字一句,都要顾到党的影响。”这一方面的认识还可以从彭真于1947年在《改造我们的党报》中看得更清楚:“报纸的每一句话,每一篇文章,都应该是代表党讲话的,必须是能够代表党的。”“它的每一个字、每一句都必须是对人民有用的和有利于人民的。”这种限制直到1956年的《人民日报》的改版才暂时有所改变。但1956年的改版后来由于毛泽东的批评而被中止。

## 2. 《解放日报》改版让毛泽东开始了通过党报强化自己在党内话语权的时代

《解放日报》在改版前对毛泽东个人活动的报道保持适度,这与当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有关。从中共组织原则上讲,毛泽东仍是政治局和



王实味

书记处的一名成员,并不是名正言顺的“总书记”,“多宣传集体,少宣传个人”的集体领导原则,毛泽东表面上至少也是赞同的。1942年2月,毛泽东整肃《解放日报》的行动正式开始,他亲自调派陆定一进入《解放日报》社,在暂时维持报社领导班子的情况下,陆定一成了凌驾于博古之上、事实上的《解放日报》最高负责人。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致读者》,宣布“从今天起,报纸的版面加以彻底的改革”,“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至此,《解放日报》完全被纳入毛泽东的直接控制之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开始了。

从以上各方面可以看出,在延安整风时期,中共的党报理论就已基本形成。虽然后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党报理论的讨论有一些新的发展,但其基本内核在这一时期已经定型了。通过整风运动,传统的由戈公振等中国新闻学理论的开拓者们逐渐摸索并发展出来的“新闻本位”的思想(包括李大钊早期的新闻学思想)被打进了冷宫,而党报作为党的组织的意识,或者说“政治本位”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 3. 高华的分析:信息等级制度的形成

高华对于毛泽东“新闻学”的分析值得一读。他说：“毛泽东‘新闻学’最显著的特征是将政治功利性视为新闻学的本质，而否认新闻具有超阶级性属性的观点。”“尽管毛泽东一贯喜好阅读政治倾向性较为中立的《大公报》《申报》等报刊，然而他始终将自己的阅读偏好与出于政治功利而对中共新闻宣传工作的要求划分得一清二楚：毛要了解一切公开的和内幕的新闻，而中共一般干部和普通百姓只需知道党要他们知道的那部分新闻。毛泽东的这种政治功利主义的新闻观正是通过陆定一和胡乔木的解释，最早在延安《解放日报》体现出来，它以五个核心原则为中心，包含了一系列互相联系的概念”。这五个原则是：

一、“党性第一”的原则。……党报“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举凡一切评论、消息、照片都必须以是否符合党的利益为标准而加以取舍和编排，并以党的立场来判断一切。

二、反对“虚假真实性”的原则。陆定一等提出一个有名的口号：“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虽然从字面上，陆定一也强调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然而这个“事实”必须置于“革命立场”的统帅之下。……

三、新闻的快慢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准则。……

四、运用报纸指导运动的原则。……

五、新闻保密和分层次阅读的原则。抗战前，《红色中华》报和以后改名的《新中华报》便开始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一部分在报纸上发表，一部分编印《参考消息》，每天印五十至六十份，供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阅读。《解放日报》改刊后，正式出刊了供领导干部阅读的《参考消息》，阅读范围较前有一些扩大。出版《参考消息》的指导思想在于进一步明确新闻保密和分层次阅读的原则。……中低级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不足以抗御国内外新闻报刊散布的“毒素”的侵袭，因此只有久经考验的少数高级干部才有资格被告知某些重要的新闻消息，干部级别越高，阅读限制就越小，由此逐级而递减。至于一般普通老百姓，为了保证他们思想上和政

治上的纯洁性，就没有必要让他们知道党报以外的其他消息了。

由此可见，“政治本位”下的读者是分级别的，级别越高获得的信息越多，普通老百姓获得的信息最少；而“新闻本位”下的传媒以获得读者越多越好。在一个获得信息的地位都差别如此巨大的社会里，怎么可能实现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呢？

高华认为：“毛泽东与王明、博古一样，师承的都是列宁—斯大林的新闻理论，只是毛泽东比王明、博古更加党化、更加斯大林主义化，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斯大林。”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年的革命队伍及其领导人都明明白白地知道，中国人民是希望共产党建立起新的政权以后会给他们带来真正的民主、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否则，党是不会用民主自由来号召和团结民众的。一个讲究政治伦理的政党在今天必须继续高举民主自由的旗帜，扎扎实实地为建设民主自由的中国而努力。■

（作者为河北大学比较新闻法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原所长）

（责任编辑 黄 钟）

## 本刊启事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 启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往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崔秀岭

手机：13611159388

电话（传真）：010-60342528

汇款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102488信箱3分箱

邮政编码：102488 收款人：崔秀岭

# 我所知道的“章罗同盟”

○ 王 健

1945年初,我在昆明读大学时经李公朴、潘大逵介绍参加民盟昆明支部(潘大逵当时是云南大学教授,和李公朴住邻居),那时就认识了罗隆基,民盟支部还为罗隆基主张实行美国的民主而展开一场争论。我和罗也有过一次不愉快的接触。但我很喜欢听他的演讲,有口才,有煽动性,敢于点名骂蒋介石独裁政府,深受广大学生们欢迎。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三次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毛泽东应邀前往。谈判43天,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决定召开有5个方面的政治协商会议。5个方面是: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共38名代表,民主同盟代表9名,其中有章伯钧和罗隆基。会议期间,民盟和中共曾有协定,在重大问题上事先交换意见达成一致、互相配合。经过22天的激烈斗争,罗隆基和中共王若飞经常接触协商,罗对王极为钦佩,二人成为挚友,会外见人就谈,自己也引以为荣。政治协商最后签署了五项决议。十天后,重庆各界数千人举行庆祝政协会议成立大会,会议开始,国民党特务捣乱会场,打伤大会主席团李公朴、郭沫若等人,造成“较场口血案”。罗作为民盟发言人,向国民党提出严正抗议。

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0月4日,在上海举行各界5000多人的李、闻追悼会。由宋庆龄、孙科领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和各界知名人士组织主席团。上海市长吴国桢为主席,沈钧儒主祭,史良、楚图南分别报告李、闻生平。讲话者有潘公展、郭沫若、邓颖超(代表周恩来读祭文)、罗隆基,最后李公朴夫人张曼筠代表家属致答谢辞。这里,我要特别讲一讲罗隆基的讲话。他放弃原稿,即席有针对性地发言,他说:“民主是由坐牢、流血牺牲而得来的,这也是民主的代价……刚才潘公展先生说我们究竟要英美的抑或苏联的民主,我是研究法律的,这个我可以代表我的同志答复,他们要的是老百姓都能活命,能自力,能过人的生活。老百姓不能活,没有自由的国家是不民主的。”他最后说:“杀死一个人并不就是

杀死他们所追求的信仰。因此,可以杀死他们两位,而不能杀死民主。”会场顿时群众热烈鼓掌,掌声经久不息。会后,在会场外,邓颖超向家属表示慰问,同罗隆基紧紧握手表示敬意。我赶上前去拍照,留影纪念。

是年冬,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民盟声明拒绝参加,我特地去访问民盟中常委沈钧儒老人,他对我谈民盟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他说民盟是“第三方面”、“中间立场”,但是真正的“中”是不存在的,不是偏左就是偏右。例如,罗隆基和张君勱都是国社党的创办人(国社党已改为民社党),罗隆基退出民社党,走向共产党,而张君勱的民社党参加了国大,走向了国民党。这就是很好的例子。我写了一篇访问记寄香港《光明报》发表。

1947年春,民盟在章伯钧家召开一届二中全会。沈老要我去帮助民盟干部作记录整理工作(当时我已在读书出版社工作,校对稿子,可以不坐班)。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章伯钧,给我的印象是庄重沉着,分析问题有理论、有见解,是个大政治家的风度。

与此同时,中共代表团被迫返回延安。中共在南京、重庆、上海的办事处,委托民盟代管。民盟二中全会结束后,又要我去参加上海马思南路周公馆接收工作。接收后成为民盟在上海的办公处,也是罗隆基到上海下榻之处。当时,罗任民盟总部的宣传部部长。因干部缺少,他要我参加宣传部工作,主要是起草反蒋、反美的宣传提纲寄给民盟各地组织。每次他到上海,我就向他请示汇报,也总看到《文汇报》著名记者浦熙修必来看他。二人过从甚密,时有绯闻,罗风流倜傥,无所顾忌。

是年秋,民盟总部被国民党视为“非法团体”强迫宣布自动解散。这时,我已到香港。孙起孟、萨空了要我参加黄炎培创办的《国讯》月刊的编辑工作。年底,沈老和章伯钧先后化妆到达香港,各地中常委也陆续到达,共同筹备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1948年1月,沈老和章伯钧二位常委代表中央举行三中全会,章伯钧作《政治报告》,提出要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联合



1962年章伯钧(左)与罗隆基在一起(王健 摄)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为彻底摧毁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实现建立新中国而奋斗。会议通过了《紧急声明》,否认总部解散,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宣言》。会上还严肃地批判了盟内一些人的中间路线思想,调整和充实民盟总部的领导机构,决定暂由沈、章二常委的名义领导全盟工作。三中全会召开期间,沈、章与上海受国民党监视的张澜主席和罗隆基常委一直保持联系,而且受到他们在精神上和经济上的支持。

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香港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一百余人联合通电响应“5·1”号召。当时,在香港中共负责统一战线工作的是潘汉年和连贯,在他们的安排下,沈老和章伯钧先后乘苏联商船安全到达东北解放区。我也向潘汉年提出想到解放区的要求。当时,李公朴夫人和子女、邹韬奋夫人和女儿、萨空了的两个女儿都想到解放区。潘知道我的家在天津,又是工商业者,所以他安排我们从天津走,和天津地下党接头后,由他们送我们到石家庄。10月底,我们在香港上了海轮,一切按照潘的安排行动,一路遇到一些挫折,也经几道关卡,但有惊无险。12月初就到了石家庄。经交际处安排,青年们去正定华北大学。我被调在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部长是李克农,顶头上司是罗青长。工作不久,我即申请

入党,后经罗青长作为介绍人我被批准入党。1949年3月25日,平津早已解放。中共中央及各机关全部开进北平,东北、华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也都到了北平,分配住进各大饭店和旅社。

沈钧儒老人住北京饭店。他向中央统战部提出要求调一秘书帮他工作,而且点名要我。部长李维汉找到李克农,决定派我作沈老秘书。我在李克农城里办公处住了一夜,他谆谆教导我如何作好民主党派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特别是对沈老跟党合作几十年这样的老人。我回天津两天,换了衣服,取了一些生活用品。4月中旬,我是穿着西装走进北京饭店,开始我的新生活的。

张澜、罗隆基仍在上海,受着国民党的监视、软禁,甚至想迫害他们。地下党千方百计地保护他们安全,直到上海解放,7月才安抵北平。

政治协商会议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于9月21日正式开幕,30日结束。选出国家主席、副主席,也推举出各部部长。沈老被选任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老上任后,我也兼任高院的机要秘书)。章伯钧被选为国务委员兼交通部长,级别三级。罗隆基被推任为政务院政务委员,不兼部长,级别四级,这都是罗隆基最计较的事情。

10月1日开国大典后,民盟即开始筹备11月召开一届四中全会。会议讨论《工作报告》和民盟纲领以及人事问题。民盟本来是个三党三派组成的政团同盟,其中青年党和民社党已投靠国民党,而且“政团”二字早已取消。但与会的中委,有人脑子里政团意识并未完全清除,特别是罗隆基虽然早已退出民社党,但他又聚集一些人组织个小集团。沈钧儒领导的救国会,在会议期间于12月18日宣布自动结束,但仍有人认为“阴魂不散”。所以这次会上充分暴露出宗派情绪,特别罗隆基对章伯钧争权夺利,斤斤计较,互相唇枪舌剑,水火难容。会议开了35天。最后,周恩来讲了话,毛泽东出来邀请全体代表到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并对大家说:“一个党内有许多山头,但是要克服山头主义。没有不团结的理由,都是民主人士、革命同志,只要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就会无往而不胜。”当时,毛泽东对民盟的宗派活动和章罗之间水火不容的情况是一清二楚的。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6年,农业、手工业、工商业三大改造完成,由新民主主义进入了社会主义。1954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了新中国第一

部宪法。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作报告，认为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发生根本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2月9日，民盟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着重讨论知识分子问题，并修改盟章，使民盟的性质由新民主主义政党转变为社会主义政党。总之一句话就是“一切为了社会主义”。最后，选出沈老为民盟主席，章伯钧、罗隆基、马叙伦、史良、高崇民为副主席，胡愈之为秘书长。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在谈到“党与非党关系”时提出中共和各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5月26日，中央宣传部陆定一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9月15日，党中央召开了八大会议，刘少奇作《政治报告》，明确指出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基本上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

这时，中国知识分子确实真感觉到“早春天气”已经到来了（费孝通写了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受到知识分子们的欢迎），但谁也不去想早春天气里还有乍暖还寒的日子。

是年年底民盟中央决定出版《争鸣》，成立编辑部千家驹等19人的编委会，千家驹为主编。我负责编辑部工作。先后曾登出由曾昭抡主持，有钱端升、童第周、钱学森等15人参加座谈“关于科学体制问题”的记录，和有教育部领导同志、大学校长、教授、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参加的，座谈“关于当前学制问题的讨论”的记录（反右斗争中，这都是被视为“章罗同盟”的黑纲领，受到批判）。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阐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方法，就是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5月1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党内整风指示，这是深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是以毛泽东2月27日讲话为指导思想，并集中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从5月8日到6月3日，中央统战部召开了13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要求大家提出批评意见，并把大家的发言及时见报。

章伯钧在鸣放期间的主要言论，发表在5月21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他说：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

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

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样形式主义的会，是可以少开的。党内一决定干什么事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

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却要党组负责，党组既然要负责，就不能不要权。这是党外人士在负责岗位上不能做到有职有权的根本原因……

这就是章伯钧所谓的“政治设计院”。

罗隆基鸣放期间的主要言论，发表在5月22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他说：

为了鼓励大家鸣放，并保证鸣放得好，我觉得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可以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民主党派的成员和其他方面的人士参加的委员会，以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屈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示过，由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成立一个机构来检查肃反偏差。成立这么一个委员会有三大好处：

一、可以鼓励有意见的人向委员会申诉。地方上的一些知识分子都希望有说话的地方，并且希望“条条道路通北京”，认为有意见能够传到北京，就是“下情上达”。因此，有了这个委员会，就可以使有委屈的人不至于没有地方申诉。

二、可以更好地做平反工作。王昆仑先生说，现在有人以为今天的鸣放是三部曲：放、收、整。其实是不外是经验主义者错误的主观主义设想出的公式。过去有许多大运动有了极大的成绩，但的确也有偏差，伤害了一些人。因此造成一些隔阂。过去的运动都有平反工作。不过，过去的平反工作往往是：人民代表大会把意见转给地方，地方又将意见转给有关单位领导的组织去处理。这样就很难做到“有错必纠”了。如果成立了这么一个委员会，那就可以将平反的机构和“三反”、“五反”、肃反的机构分开来。过去的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今天平反有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那就更有利于做平反工作。

三、在鸣放中，就没有有顾虑的人？谁也不敢保证，对“鸣”与“放”绝对不会有人打击报复。有了这个委员会，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可以直接向委员会控诉。这样，有报复思想的人就害怕，真的受到报复的人

也有路可走。

这样的委员会，中央有，地方也应该有，而且中央可以领导地方的这样的委员会。全国有了这么样的有系统的机构，一定能够保证鸣放得好。我这仅是个建议，很不成熟，不知道是否妥当……

这就是罗隆基的所谓的“平反委员会”。

座谈会大家发言踊跃，对党政工作和干部思想工作提出批评意见。在这期间，北京一些大学学生闹事，对校党委有些做法极为不满，甚至有人言词激烈，声称驱逐校党委，使学校秩序发生混乱。民盟中央章伯钧、史良、胡愈之于6月6日邀集曾昭抡、吴景超、黄药眠、钱伟长、陶大镛、费孝通等六人（有的是大学副校长，有的是教授）来了解各校情况，分析形势，并研究民盟如何出面做学生的工作。

我到中央统战部看到党内文件6月8日出版的《零讯》，上面登有民盟六教授的讲话，我认为这是民主人士的讲话，不属于党内机密，故抄录下来。

### “六教授会议”讲话

钱伟长、曾昭抡、费孝通认为几个大学的问题很严重，他们一道向章伯钧报告，要民盟中央注意，要向中共反映。

钱伟长认为现在形势到了波兰八中全会前后的阶段。清华的情况是学生在前，职工在次，老教师在后，学生想找老教师对党整风表示态度。

费孝通说，他不敢在家里蹲，因为北大、清华学生找他，谈的话学生回去就登大字报。

钱认为现在情况，正像我们过去在学校读书闹事的时候一样。

钱说，清华蒋南翔把形势估计得很低，出了几张布告，对可接受的接受下来。但学生们要求人事科档案公开，要求机会平等，要同共产党一样的机会，青年教师和学生感到没出路，小党员也感到没出路。学生感到出去找不到工作。选拔留学生、研究生机会不平等，只重政治条件。三四年级的学生下厂学习，大厂、重工业、国际性质的厂，党员才能去，有的厂虽不是党员才能去，但也要看政治好坏，政治好坏也掌握在人事部门。因此，集中要看档案，要检查档案。

职工、教师不满学校任用私人，党员干部的老婆、兄弟搞进来，职务高、业务水平低，这些事一般容易鼓动起学生的不满情绪来。

钱认为大学不得人心的事：一是人事档案；一是福利基本要求拿账出来，可是拿不出来。

钱说，现在学生变成反党的情绪，搞下去很危险，如何解决，要有足够的估计。他认为高教党委需要把几个学校党委负责人找来，要他们在学校里表明态度，这样民主党派才好作工作，提建设性的意见，替党向学生作解释。钱说，他自己也不敢在家里蹲了，学生推他做领袖，他感觉困难、可怕，怕作纳吉，只好避开。

钱又说，现在变为群众整党运动，假如基层不搞好，会变为国家的大问题，会引到反革命方面去。

他认为形势严重，希望章向中共中央反映，民主党派怎样作才好。

章伯钧说：整风是党的政策，毛主席的政策，是采取主动的精神；但估计不足，没有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

章说：交通部好几个地方单位罢工。共产党内部问题也大，计委差不多都是党员，也贴满了大字报，撤换李富春的大字报贴在李家的门口，这是估计不到的。

章又说：这个时候，民盟有责任要帮助党。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动摇。章强调党估计不足，想不到群众会有这样多的意见，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钱、曾、费都认为党在学校不讲话、不表明态度。他们说，究竟党的态度是什么，摸不到底，可怕，下面摸不到，中央总可以摸到。谈话后，章伯钧当时打电话找李维汉部长，李不在家，他又找习仲勋同志，也没有找到，又想找徐冰同志。费孝通建议，不要一个党派去谈，最好找九三许德珩一道向统战部反映。章表示同意，并将再了解师大、清华的情况后同许一道找统战部谈。

### 费孝通对当前高等学校整风运动的反映

6月6日，费孝通找于毅夫同志谈话，费表示对目前高等学校的整风运动极为担心。

费说：北京的几个大学的学生起来以后，问题很严重，有点像过去搞民主运动的味道。值得注意的是过去每次运动打人的人（指积极分子）现在都翻了，谈起情况就痛哭流涕。北大有两个学生，原在公安部工作，现在北大学习，讲起肃反情况来，连冯至教授都哭了。民主党派的一些积极分子过去起了很多坏作用，现在十分脱离群众。

费说，老教授现在的态度一般是十分惶惑的，不明方向、无所适从，想不出办法来，学生每天去找这些老

教授,这些教授现在是“举足轻重”,如果要和群众结合,马上就会搞起大民主来。这些人内心是和学生站在一起的,但对社会主义并未动摇,愿意帮助党把整风搞好,不忍心去闯乱子。因此,非常怕学生来访,如钱伟长说,如果再这样下去,他就想逃走了避开风浪。这些人对党的态度是失望、悲观,他们突然发现党竟会有这样许多问题,以往估计不足。现在《人民日报》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很不吃香,他们认为这不是自己的东西,而《文汇报》,从江苏的情况看是很受欢迎的。

费认为党造成这样严重的脱离群众的情况,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党领导方法有问题,解放后,党把什么工作都抓在自己手里。什么事情都想要由党员去直接领导,而不运用党外的力量。费说党员是辛苦的,但是,勇气虽大,力量不足,由于人手不够,没有办法,只好扩大党,党扩得太快,质量则差了,所以引出这样许多问题,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使得党不是很精干的核心力量了,会使党灭亡,如果这样下去不改变,社会主义也搞不成了。这样作的另一面,就促使了很多人想入党,因为不入党,就不能有权、有势、就没有前途,在这种形势下,很容易腐化,要保持党的纯洁,必需改变这种形势。

费说:现在不能收,如果一收,人的心就跑了。人是跑不掉的,共产党还有军队。但是人的心就跑掉了,党应该诚恳地检讨、讲清道理,只有讲道理,才能服人心,过去大家拥护党,就是因为党的道理对。费建议中共中央应该抓一下北京几个高等学校,他怀疑市委高校党委掌握情况是否是全面的,为了全面掌握情况,费还建议也需要找民主党派了解情况。费认为,民主党派可以帮助党作些事。党不好讲话,党派出来说说还是可以,如动得不好会出乱子。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社论指出当前政治生活中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少数右派分子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允许的”。同一天,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社论的发表和指示的下达,标志着反右派斗争正式开始了。据胡绩伟回忆,当时中共中央成立了反右斗争五人领导小组,组长是八大选出来的总书记邓小平。

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2月27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当时我亲自听了讲话并作了记录,但报上发表的已增加了辨别“香花”

和“毒草”的“六条标准”,以使用它来检查、批判和揭发右派分子的言论行动。有些人听了心里惶恐不安,说:如果早知有这六条我在座谈会上就不发言了。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这篇社论实际上是向民盟投下一颗重量级的炸弹。我看了报纸赶快读给沈老听。读到“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民盟有人“呼风唤雨,推波作浪,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乌云乱翻,其源尽出于章罗同盟”。“《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反中央、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方针,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我读了这段,沈老闭目静听。他听了以后,以肯定口气说:这一定是毛主席的手笔。这些话除了毛主席谁敢这么讲。沈老对毛泽东是最信任的,我看他不信又不能不信,作为民盟的主席内心是沉重的。

民盟中央成立了由沈钧儒等31人组成的民盟中央整风小组,办公室由胡愈之、李文宜(罗亦农烈士夫人)任正、副主任,开始对章伯钧、罗隆基以及在座谈会发表言论的人进行批判。这时我的党籍公开,中央统战部又调来几位党员同志加增民盟“阶级斗争最前线”反右派斗争的力量。百家争鸣的《争鸣》也转化为反右派舆论阵地。

揭发批判“章罗同盟”向纵深发展,大鸣大放大字报,进一步发动全国民盟组织挖掘“章罗同盟”的分店、军师、谋士、代理人和骨干,范围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揭发批判材料如雪片飞来。办公室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编印了一本40多万字的《章罗联盟资料汇编》。我也参加了汇编的编辑工作。我已进不惑之年,但对当时有些困惑不解。党内同志批评我党性不强,要我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锻炼党性,增强阶级斗争意识,抓住这个好机会。

关于“轮流坐庄”问题,我在编辑汇编时没有看到有人批判章伯钧说过这句话,倒是程潜批评章时说他有“轮流坐庄”的思想。这基本上澄清了这不是章的言论。但在机关干部对这个问题有些议论。有人说:既然是“取而代之”就不会“轮流坐庄”了。也有人说:民盟加上农工民主党加在一起成员不过五六千人,和两

千多万党员,数百万军队的共产党争权,轮流坐庄,章罗都是搞政治的,这不是发疯了吗?也有人说,即使毛泽东把政权交给八个民主党派联盟坐庄,又谁敢去接受。有人说民主党派本来就是花瓶、摆饰。这都是背地说的,而千家驹在他《自撰年谱》里说八个民主党派就是党的八个支部,这是在香港公开发行的。

《7·1社论》发表时,罗隆基是以郭沫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正在科伦坡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会议结束回到昆明第一站,看到了《7·1社论》和章伯钧在农工党扩大会议上作的检讨,承认“章罗联盟”是有事实的,罗立即气愤地给章家里打电话,对章大声叫嚷:“报纸说你我联盟了,你居然也承认了。现在你跟我说清楚,你什么时候和我联盟的,又是怎样联的?”章听罗的质问,一时说不出话来,最后说了一句:“电话里说不清楚,等你回来再谈。”罗回北京后,罗去了章家,大闹一场,并把自己的手杖当场折断,表示决裂。

1958年11月,民盟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沈钧儒作工作报告公开承认民盟仍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盟员多数还没有完全抛弃资产阶级立场,盟员仍须加强政治思想改造。最后,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为了保留几个反面教员,章罗“大右派”仍被选出。从此他们很少来民盟机关,即使来开会或参加学习,他们也找后排角落座位。在社会各项政治活动中,他们的身影几乎消失了。

我从民盟内部得悉,香港报界有人想约罗隆基去香港办报,并可担任“主笔”。此事民盟向党中央反映,周恩来总理得知后,曾约见罗,并告以此事说:你如想去香港随时可去,即使你去美国,也随你便。当时罗肯定的表示:我什么地方都不想去,要死我也死在国内。

民盟大会后,12月我和何鲁陶(沈老生活女秘书,另有一位警卫秘书)陪沈老去广东从化休养。一位沈老的老朋友来看望沈老,他是一位心直口快的老人,也认识章伯钧和罗隆基。他见到沈老就问起章罗的近况。他认为,章罗都是人才,性格不同,不可能有联盟,对章、罗的遭遇表示惋惜。他了解他们过去一些历史。他说:“30年代罗在天津《益世报》做主笔,很出名。蒋介石想收买他。他拒绝,又派特务枪杀他,未成功。他很有口才,又是个大手笔。”他知道章伯钧是德国留学,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后和邓演达组织了第三党。说他们都是雄才大略,人才啊!沈老在谈话中间只插了几句话:“罗还是个法律专家”,“章这个人醇厚,早先中央统战部把他看成是个左派”。其他还谈了一些话与章罗无关。

我写这篇文章时,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的著作《往事并不如烟》已经出版。我从书里才了解章、罗划为右派后的生活情况。

章、罗戴上右派帽子后又作了撤职、降级、降薪处理,撤了部长职和一切兼职。章从行政三级降到七级,仍有专车。罗从四级降到九级,车也撤了。他们大吵一次以后,罗还给章通话,并提出想去看他,章表示欢迎。罗到章家,章以大中华香烟、龙井清茶接待。章知道罗是要政协车来的,章表示回去用他的车送他。罗深为感动,并摇头叹息:“我们简直是做了一场噩梦,噩梦一场呀!”从此,来往密切,什么都谈,谈的都是心里话。谈久了留下共餐,有时约一些朋友出外聚餐。罗不但和章谈,对章的夫人、女儿也很亲热,给章诒和讲故事。章诒和陪罗去看戏。罗坐在章的客厅叹气说:“到了你们这里,觉得是在家,自己的家倒像个客棧了。”章总是劝慰他,罗精神得到安慰,二人已成知己之交了。

1962年4月的一天,民盟机关干部组织去碧云寺春游,我也参加了。我单独找景点去拍照,突然听到有人在叫我,转身一看,原来是章伯钧和罗隆基在路边的小树林里,坐在两块并排的大石头上喜笑颜开地在聊天。章伯钧叫我:“给我们章罗联盟照一张。”我立刻给他们照了一张,并答应洗出来,送他们每人一张。我站着和他们寒暄几句就离开了。当时我很得意,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两人单独一起的相片,这是我独家拍摄的,可能是唯一的。走在路上我在想,是不是可以放大一张送给毛泽东对他“这不是你给他们结成联盟的铁证吗?”但是,我不敢这么做,怕引火烧身,随便想想而已。

1965年11月,我从农村参加“四清”回到北京。3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20天前的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点名批评吴晗所写的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措辞严厉,上纲上线,视为一棵毒草。吴晗是民盟中央副主席,北京副市长,民盟的同志认为这篇批判文章必有来头,大家担心是不是阶级斗争有了新情况,又抓住吴晗这个“源头”,大家议论纷纷,人心惶惶。

12月初,民盟领导同志都参加了政协组织的外地视察。8日一早,我接到统战部的电话,告诉我罗隆基于昨夜突然死亡,要我八时到迺兹府罗的寓所开会。我准时到达,得知公安部、统战部早已来过全部搜查,运走了几个箱子,遗体已送医院。当时,统战部召集一个小会,研究治丧问题。决定:一、立即通知其河南弟弟来北京;二、遗体解剖检查;三、联系殡仪馆火化;四、

组织一个以民盟全体干部为主的小型追悼会。指定一、四两项由我负责,要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

我回到机关,电报通知家属,尽量做民盟干部工作。终于开成了有家属、有不请自来的罗的女朋友,有半数的民盟干部,形式上是一个不多不少的、没有悼词的追悼会。我算是完成了一项政治任务。统战部把罗的衣服、字画和无关紧要的书籍、信件交给民盟。罗的弟弟选了一些衣服、字画和纪念物品带走,其余皆由民盟保管。罗的骨灰,家属未去认领,最后遗失了。罗的死因,据统战部说:7日晚,罗在刘王立明家几个人吃涮羊肉,夜里心脏病突然发作,来不及吃药就猝死了。医院解剖后,胃里还有大量未消化的羊肉。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心里在想,罗的猝死是不幸中的万幸,否则也逃不过这场“文革”的大劫。章伯钧是不幸的,就连我也被批判为“大右派的孝子贤孙”。

1966年“文化大革命”是以揪出民盟副主席吴晗拉开序幕的。全国学生组织红卫兵停课闹革命,并接受毛泽东的检阅。8月下旬,民盟中央接某中学红卫兵的通告,勒令民盟组织在72小时内自动解散。第二天民盟接受了红卫兵的意见,从即日起停止办公。是日下午,红卫兵70余人闯进民盟,召开批斗吴晗大会。陪斗者有章伯钧、千家驹、张毕来等数人。他们都跪在地上,颈上挂一大木牌,写上他们罪名,接受批斗。当晚,红卫兵到民盟进行封查,并拿走两枚公章。从此,民盟中央全部陷于停顿,各地组织也相继停止活动。民盟青年也组织了造反团体——“燎原造反派”。1967年春,造反派即把章伯钧抓到民盟,囚禁在一间长期空闲的小屋,地上铺上稻草作为睡床,另有看管人员监视。

据一位同志后来告诉我:有一天中央刘少奇专案组有人来找章伯钧调查有关刘少奇的问题,实际是诱供章伯钧过去谈过主张我国实行两院制是受刘少奇的影响。来说这样对你是有好处的。章伯钧听出他们是在诱供,他不愿加害刘少奇,他对来说:我是外国留学多年,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两院制,比刘少奇知道的又多又早,这个问题我早就讲过。要说刘少奇受我的影响还有可能,至于他什么时候讲的,怎么讲的,我根本不知道。来说听他一说毫无所获悻悻而去。

章伯钧身处逆境,受尽折磨,于1969年5月病逝。当时,我们互相隔离,对章的情况一无所知。

1980年6月27日,民盟举行中常会,传达《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文件中说,民盟所谓“六教授”等右派问题

均予改正,恢复名誉。对章伯钧、罗隆基未予改正。文件中说明:“章罗联盟”在组织上并不存在;民盟中央在1957年提出的《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的建议》的基本内容是可取的,不是所谓“章罗联盟”的反动纲领。会后,与会同志议论纷纷,认为“章罗联盟在组织上并不存在,所谓反动纲领也被平反,而章伯钧、罗隆基为何不予平反?”

1981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文,对反右派问题仍认为是“必要的”而且“正确的”,问题就是“扩大化”了。大家看了又有不少议论。有人说,反右划了55万右派分子,现在改正的99%以上,只留几个中央级所谓“大右派不予平反(除章罗二人外,还有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共五人)”。他们除了发言提出批评意见外,究竟有什么罪行?难道就以他们五个人为“扩大化”垫背吗?如果有真正想推翻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反革命分子,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至于在言论上的批评意见,为什么不可本着毛泽东说过的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针来解决?据胡绩伟回忆,胡耀邦进行右派平反工作时,受到汪东兴、华国锋等人的阻力,反右的直接领导人也在所难免。

1982年11月15日,全国政协、民盟中央、农工民主党中央联合举行了章伯钧的骨灰移放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仪式。我也去参加了,并拍照留念。1985年11月11日,民盟中央和农工民主党中央在政协礼堂举行章伯钧诞辰90周年纪念座谈会。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杨静仁出席并讲了话,肯定了章伯钧一生是爱国的、进步的,做了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国家的好事,对民主革命、新中国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1986年10月24日,民盟中央在政协礼堂举行罗隆基90周年诞辰纪念座谈会,新上任的统战部副部长阎明复参加并讲了话,肯定罗的一生是爱国的、进步的,为人民、为国家做了好事,为民主革命,为新中国建立,为社会主义事业和世界和平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会上千家驹发言,他认为“章罗同盟”是千古奇冤。他提出中央对他们既然有了公正的评价,现在是应该到了改正平反的时候了。会议上有人说,《决议》里肯定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现在已有99%平反了,只留几个“大右派”,而扩大了55万人,这种说法何以自圆其说,何以取信于民?为什么不给他们改正呢? ■

(作者曾任沈钧儒秘书)

(责任编辑 黄 钟)

# 回忆渡江南下和进军大西南

○ 田纪云



胜利到达贵阳市的田纪云(1950年)

1948年秋,在辽沈、平津、淮海战役取得伟大胜利,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大部被歼灭之后,蒋介石妄图凭借长江这一天堑扼守江南,形成南北分治局面。毛主席、党中央及时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并很快部署大军渡江南下,消灭国民党的残余势力,解放全中国。同时决定从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中原各老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到新解放区建立人民政权,开辟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根据中央的决定,华北局决定从冀鲁豫边区抽调一个区党委的干部架子,包括6个地委、30个县委、210个区委的干部和勤杂人员。

## 率先报名南下

遵照中央和华北局的决定,冀鲁豫区党委迅即进行部署,组织南下队伍,办法是个人报名、组织批准。条件是:第一年轻,第二有一定文化知识,第三最好是共产党员。女同志如果是干部,没有孩子拖累也可以报名。很快从8个地委、专署、军分区和57个县市抽调3960名干部和2027名勤杂人员,共5987人,组成南下支队,随二野五兵团渡江南下。南下支队司令员傅家选(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兼参谋长),政治委员徐运北(冀鲁豫区党委副书记),参谋长万里(冀鲁豫行署秘书长),政治部主任申云浦(冀鲁豫六地委书记)、副主任郭超(冀鲁豫四地委书记),供给部长陆耀海(二野五兵团供给部长)。冀鲁豫南下支队的任务是接收江西省的赣东北地区,组织赣东北区党委和行署及其5个地市、27个县市以及区乡的党组织和政权。

当时我在冀鲁豫战勤总指挥部供给部任总会计,刚刚结束淮海战役带担架营的任务回到工作岗位不久,听了号召南下的动员报告后立即报名并被批准南下,成为南下支队的一员。当时我刚满十九岁,已有四年党龄,是南下支队中最年轻的营职干部之一。

1949年3月,南下干部组成南下支队,我作为二野五兵团供给部的会计,被编入南下支队供给部任总会计,我的爱人听说我报名南下,怕我把她丢下,迅速从范县赶来菏泽要求与我一起南下。在我的请求下,组织上批准我爱人李英华也调入南下支队供给部当出纳,一起南下。

南下支队在距今菏泽市三华里的晁八寨集中进行了一个月的军事训练。3月下旬,全支队同志发了军衣、被褥、雨布、米袋和老区人民慰问

的鞋子等生活用品。

3月26日,冀鲁豫区党委在晁八寨举行热烈欢送全体随军南下同志的大会。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在会上作动员报告。令我难忘的是支队政治部主任申云浦同志的动员讲话。他的讲话生动而幽默。他说,我们决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胜利,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有的同志觉得现在解放区生活已经不错了,有地种了,有饭吃了,日子已经很好过了,何必还要打仗。他说,不彻底打倒国民党,不解放全中国,这些胜利果实是保不住的。他诙谐地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就不是现在吃的窝窝头,喝的‘黄金油’(玉米糊),晚上搂的剪发头(解放区的妇女兴剪短发了),而是大米美人鱼了,有大米吃,有鱼吃,可以找漂亮老婆。”大家哈哈大笑,不少人以为可能要我们去江苏或浙江了。

3月31日起南下支队走上征途。南下干部的行李非常简单:一床被子(两斤重)、一双鞋子、一个茶缸、一条毛巾、一个布制挎包,还有一块两尺见方的油布,下雨当雨伞,不下雨用来打背包。

在今江苏蚌埠至合肥的途中,记不起是什么原因了,我掉队了,一个人追赶大部队,走到深夜也未追上,夜间一个人在二郎庙里蹲了一晚,第二天才追上。

南下途中,当时的战争气氛和迹象处处可见,上级命令只准沿公路前进,因公路两侧国民党埋设的地雷尚未扫除。在长江两岸,被人民解放军炮火击毙的国民党军的尸体、战马和残存的弹壳以及三五成群、身着旧棉衣一瘸一拐的国民党残兵败将,举目可见。南下支队的全体干勤人员,在南下征途上,精神振奋,纪律严明,高唱着革命歌曲,雄赳赳、气昂昂地前进,时常受到当地群众的夹道欢迎。

4月10日南下支队来到安徽合肥市。在合肥等待渡江期间,接到总前委命令,调万里带一个大队的干部去南京参加接管工作。万里是山东东平人,抗日战争时期我一直在东平、梁山、聊城一带活动,加之又听过万里的报告,所以对万里的名字那时就熟悉,听说他要与我们分开了,心里挺舍不得他离开。

南下支队4月21日到达渡江地点安庆等待渡

江,4月26日黎明乘木船渡江。渡江前,支队领导作了渡江动员,号召会游泳的同志报名成立救生队,就是说,渡江时如有人落水了要跳下去救人。我不会游泳,是个“旱鸭子”,但我也报名参加了救生队。我找了块木板,如有人落水,我就抱着木板跳下去救他。好在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南下途中,组织上交给我和李英华的任务是押运两马车准备在敌占区用的银元。渡江后南方已进入雨季,行军路上,阴雨连绵,道路泥泞,逢沟过坎,马车过不去,我们就同押车战士一起,把银元一箱一箱扛过去,然后再装车前进。晚上宿营后,我和李英华轮流睡在马车上,以确保银元的安全。历尽千辛万苦,5月初我们终于胜利到达江西上饶,我和爱人也圆满完成了任务。

## 进军大西南

赣东北是指江西省鄱阳湖、军山湖以东,与安徽、浙江、福建接壤的广大地区。这里气候宜人,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江西著名的鱼米之乡。赣江则是赣东北的母亲河。我们



田纪云1948年冬于菏泽(右为大哥)



胜利到达赣东北上饶合影(后排右3为田纪云,左2女同志为田纪云爱人李英华)

很快爱上了这片热土。赣东北解放后任务十分艰巨。剿匪、反霸、土改、征粮供给前线,还要培训干部建立基层政权,等等。但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南下至赣东北不到四个月,脚跟尚未完全站稳中央就决定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1949年9月,华东局决定冀鲁豫南下支队接管赣东北地区的原班人马,加上江西地下党的部分同志、赣东北区党委各级干校的学员,以及江西解放后参加工作自愿西进的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共9331人,组成西进支队,随二野五兵团西进接管贵州。西进支队很快组成,其领导成员是:司令员傅家选,政委徐运北,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申云浦,政治部副主任郭超。

决定做出后,我作为赣东北行署财政处的总会计迅速与赣南行署财政处进行交接,一天就完成了交接任务。交接完成后才想起来为财政处印刷账簿的印刷厂还剩了几令纸张,会计科长王心广(当时的科长是正团级干部)叫我去处理。工厂作价退了3元6角钱,我交给科长。王科长说,小田,咋办?账已经交了,让会计科的同志一块吃顿饭把它花了吧?我说,行。但心里也打鼓,是否违反纪律呢?

西进支队9月中旬分批由上饶出发。西进途中,10月1日那天在湖南长沙听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消息,大家欢欣鼓舞,一路高唱“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前进……”等革命歌曲。

从江西上饶到贵阳,除武汉至九江坐一段木船外,一路步行,早起晚睡,爬山越岭,个个精神抖擞。湖南境内的雪峰山真是够高的,一上一下40多公里,地势陡峭,云雾弥漫。爬一段就得停下来喘口气。经过千辛万苦,千里跋涉,我们于11月26日到达贵阳市。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山高路险,但地上地下资源十分丰富,汞矿、铅锌

矿位居世界前列,煤矿、铁矿储量十分丰富,足够开采300年。从贵州解放那天起,我在贵州工作、生活了16年之久,直到1966年初调中共西南局工作。

贵州解放初期,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万金油”干部,哪里需要就派我到哪里去。解放初期,我先是任军管会财政接管部机要秘书,但土匪四起,截断了贵阳市粮食、布匹、盐巴、日用百货等供应渠道,军管会领导就调我到军管会办公室负责物资调运工作。随着各级政权的建立,需要大批干部,1952年组织上又调我到革命大学和财经学校培养干部。“三反、五反”开始后又调我去省政府印刷厂领导“三反、五反”运动。“三反、五反”结束后又让我去处理赃物。直到1953年下半年才回到省财政厅。在财政厅我先是任秘书科长,继而任计划科长、预算处长、办公室主任、直到副厅长。我在贵州省整整工作了16年,这16年是我从21岁到35岁的青春年华。回顾这16年,我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全身心地投入贵州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从不谋取个人私利,曾两次获得全省财贸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在贵州工作期间,我的足迹走遍贵州的78个县市,对贵州的山山水水,对贵州各族人民的勤劳、朴实、诚恳、和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且终生难以忘怀。■

(责任编辑 黄 钟)

# 对“民主”的三个认识误区

○ 尹保云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民主建设的任务已迫在眉睫。无论是政界、知识界还是社会公众,关心民主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但总体看来,国内目前的认识还是初步的,尤其是在现代民主的起源、民主的“形式”与“实质”、“共性”与“特色”等三个方面还存在很大的认识误区。

## 一、现代民主的起源

关于现代民主的起源,学术界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是历史文化的观点,它认为现代民主起源于西方的历史与文化传统。英国剑桥学派政治学家约翰·邓恩认为,民主制度是古希腊人创造的,在中断两千多年之后又第二次来到世界,由美国人率先继承起来。这派观点还强调其他西方因素的作用,比如,中世纪宪政思想、中世纪自治城市的民主、基督教文化等等,从而把现代民主解释为纯粹西方历史与文化传统的产物。第二种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阶级论观点。马克思受到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影响,认为现代民主源于“市民社会”即城市资产阶级社会,是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战后,也有一些西方主流学者持这种观点,比如巴林顿·摩尔就把资产阶级看作是现代民主制度的载体。第三种是冲突论的观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查尔斯·蒂利教授一生研究社会运动,他认为西欧现代的民主国家是国王、贵族以及各社会集团之间的相互斗争运动的产物。

以上第一种是主流观点,后两种观点虽有所不同,但也是从西欧自身历史来揭示现代民主的起源。三种观点都把现代民主解释为西欧从传统到现代的自身演化,是西方的特产。这种认识迄今仍统治着整个世界,从来没有人对此提出过质疑。然而,这却是一个片面的认识。

要搞清现代民主的起源,首先要理解现代化的性质。人类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迈进,从一开始就不是某局部地区单独进行的过程,而是一个世界性的运动。13世纪蒙古人入侵西欧、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一系列的突发事件把当时世界各地的文明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全球各地区的文明在西欧交汇的格局。西欧开始在世界范围里聚集“理性化因素”或曰“现代性因素”。这些因素原来分散于世界各地。由于分散而力量微弱,不足以在各自的地区启动现代化,而汇聚一起才能带来人类社会大转型。西方在构建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不仅吸收了来自伊斯兰地区、中华帝国、印度地区、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等地的物质资源、科学、技术,也包括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中的理性因素。可以说,现代文明是在世界范围内聚集以往各文明所积累的有益因素的基础上孕育而成的。

同样,作为现代文明最高体现的民主制度,也是在世界范围聚集有用因素的基础上而形成的,是西欧本土因素与外来因素相结合的产物。最重要的外来因素恰恰是由中华文明提供的,即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制、科层官僚制和文官考试制(科举考试)。

西欧与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与制度上的交往最早可追溯到拜占庭帝国(公元395-1453年)初期,13世纪蒙古人入侵西欧使双方交流突然扩大。随之,《马可波罗游记》开始在欧洲流传。从此时到18世纪中期的几百年时间,是西方人崇拜中华文明的时期。尤其是在16世纪到18世纪中期的二百多年期间,西欧人对中国的崇尚达到顶峰,甚至可能远远高于我们今天对美国的推崇。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泰斗伏尔泰(1694-1778年)是中国热的后期代表。他在著作中有大量赞扬中华制度文明的言论。这还引起



伏尔泰

了孟德斯鸠(1689-1755年)对他的不满和批评,孟德斯鸠是第一个严厉批评中国制度的启蒙思想家。但推崇中国的思潮并没到此结束,直到后来的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1856-1950年)还在他的作品不断赞扬中国的文明。

西方推崇中华文明的时期,正值它的“绝对王权”(或称“绝对主义”)运动时期。所谓“绝对王权运动”也就是为克服原来的封建主义分裂状态而进行的中央集权化运动。这个运动一方面通过战争而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地理雏形,一方面形成以加强王权而削弱贵族为标志的中央集权趋势。这是一个学习和借鉴中国的中央集权制的运动。英国1215年通过的大宪章限制了国王的权力,保障教会、领主、骑士以及市民的权利。这虽然是一次反集权行动,但现实中集权的需要却始终是一个社会驱动力。从亨利七世1485年登基到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去世的“都铎王朝”时期,既是英国资本主义转变的重要时期,也是其绝对主义的高峰。这个集权运动直到克伦威尔的“护国公”时期(1653-1658年),尽管克伦威尔代表贵族议会打败了专权的查理一世并把后者送上断头台,但他也是一个搞集权运动

的独裁者。法国在黎塞留(1585-1642年)宰相时期是其绝对主义的一个高潮,但此后中央集权运动可以说断断续续搞了至少二百年以上。德国的中央集权化运动开始得较晚,从1660年普鲁士公国开始,一直搞到俾斯麦任宰相时期(1862-1890年)。

在迄今的民主研究文献中,人们只研究民主和民权的发展,早期的如英国大宪章、1688年光荣革命,后期的如工人罢工、游行、争取选举权等斗争,却忘记了研究与这些运动紧密伴随的中央集权化运动。然而,民主(民权)运动则始终是与中央集权化运动相伴随的。二者此消彼长、交互运动,从而组成现代政治文明建构的完整历史画卷。

来自中国的中央集权制、科层官僚制、文官考试制(科举考试)等要素就在这个过程中与西方原有的民主(民权)因素发生融合,并经历变化和升华而嵌入现代民主制度之中。这一文明融合的进程难免出现激烈的冲突。因为,两类因素不可能原样地掺合在一起,它们不仅需要自身的变化和升华,而且还要找到一个有机的整合结构。法国大革命是这一冲突的集中表现。从中国引进的传统集权方式和贵族特权引起以第三等级为代表的民众反抗,而民众的传统式民主方式又导致集权体系崩溃,并进一步造成社会混乱和大众暴政。罗伯斯庇尔曾在演讲中大声疾呼:民主不是民众自己管理所有公共事务、不断地集会游行、成千上万的人民派别相互冲突的那种状况,民主是受法律指导的并由代表来处理人民不能自己办好的事情。罗伯斯庇尔这些话表达了一个重要的认识,即他认为“民主”应该是一种在法律指导下的代表制度。但是他没有建立起这个制度,他自己也在“热月政变”中被送上断头台。

具有罗伯斯庇尔这种认识的人在当时很多,比如法国著名的政治理论家西哀士,美国的众多联邦党人。美国的联邦党主要存在于法国大革命到1815年之间,它奠定了美国宪政的基本框架。联邦党人一边受到法国大革命的鼓舞而推崇自由民主,一边警惕法国大革命的暴力与混乱。他们在设立美国民主制度时,除了强调民权的民主理想外,又突出了“法律”和“中央集权制”

这两个概念。这样的思想也渗透在塞缪尔·亚当斯(1722-1803)、邦雅曼·贡斯当(1767-1803)等著名政治思想家的著作中。

现代民主最先在美国和英国成型。1863年,美国总统林肯公布了《废奴宣言》,十多年之后英国的工人阶级获得了选举权。这可以被看作现代民主成型的大致时间标志。西方因素与中国因素的汇合,经历了从英国大宪章到美国南北战争的几百年的民主(民权)与中央集权的无数次冲突与协调,终于在美国和英国最先完成结晶,即“宪政民主”或“代议制民主”。自此,“民主”一词也常被用来指一种制度即宪政体制,而不只是用来指民权的方面。

上述历史过程说明,现代民主制度是西方传统的“民主”与中国传统的“集权”两个系列的因素相互结合的产物。它不是沉睡了两千年的古希腊城邦民主的苏醒,也不是中世纪城市民主的直接发展。古希腊人常被认为是不懂政治的,他们的城邦民主制的结局也是很糟糕的。中世纪自治城市的民主也是同样,它仅是欧洲封建主义的附属物,并在后来与自治城市一起衰落。这些直接民主属于“原始民主”,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可以找到,比如在满清八旗、在一些帮会团伙里,都能找到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形式的存在。当然,古希腊民主和中世纪自治城市民主发展得更加高级,所以能够成为现代民主制度的构成要素。同样,中国的集权官僚制在传统各集权制(如罗马帝国与中世纪教会系统的集权制等)中也是发展程度最高的,从而成为现代民主制度的构成要素。但无论是西方的民主因素还是中国的集权官僚制因素,均不能单独地发展到现代的宪政制度。在单独状态下,它们只能是原始的、低级的,只能不断地进行“兴起—灭亡—一再兴起—再灭亡”的无休止的历史循环。只有“民主”和“集权”的有机结合,才能构建现代政治文明。

马克思·韦伯很重视集权官僚制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意义。他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还对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和科举考试大加赞扬。但马克思·韦伯不承认西方现代的集权官僚制是从中国引进的,而认为它是从罗马帝国传统中继承的。他的这个观点在二战后被国际学术界否定。包括费正清在内的许多西方学者指出:西方

在现代化进程中,不仅从中国引进了无数的科学和技术成果,也引进了集权官僚体制和文官考试制度。不过,这样的论述多是零散的,也没有与现代民主的形成联系起来。

澄清对民主起源问题的认识有什么意义呢?这能够使我们正确地认识现代民主的性质:它不是西方历史文化单独发展的产物,而是东西方文明交汇融合的结晶,因此它不是“西方民主”,而是世界性的。传统文明如中华文明、印度文明、罗马帝国文明等都是区域性的,它们的中心地带只能影响其有限的周边地区。而现代文明则由于是世界性的,它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强制性的传播力量。只有全部吸收它,才有可能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甚至转变成为世界中心,否则,就只能永远处在世界的落后与边缘位置。

## 二、民主的“形式”与“实质”

任何文明都是一套形式系统,它由一系列的原则、规定、程序、仪式等组成。原始部落文明、萨满教文化、大型宗教、国家制度,等等,无论是低级还是高级,均是由形式所组成的,只是复杂程度不同而已。

同样,宪政民主制度也是一套形式。其形式要素可分为两半:一半属于“民主”(民权方面)要素,如三权分立、选举投票、政党竞争、言论出版与结社自由、地方自治等等;另一半属于“集权”(国家方面)要素,如中央集权、法律体系、科层官僚制、文官考试等等。这两半要素在现实中相互渗透、相辅相成,从而组成一个庞大的形式系统。现代社会中自由与权利的扩大、道德与文化的进步、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公平与正义的实现,等等,都来自于这个形式系统的运转。没有这个形式系统,一切目标都无从谈起。因此,这个“形式”也就是“实质”。

国内对民主的认识至今没有完全脱离教条主义框框的束缚。基本倾向与教科书哲学体系一致,即,抬高“物质”而贬低“精神”、抬高“实质”而贬低“形式”。这种哲学体系是在苏联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其基本思想来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民主问题上,马克思受到黑格尔的国家与

市民社会的理论的某些影响。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承认宪政民主的历史进步性，认为民主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但他的肯定到此为止，他的主要倾向则是否定宪政民主的。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直到马克思去世的时候，虽说宪政民主的形式系统的结晶体已基本形成，但具体细节却远未完善，当时英国工人还没有获得选举权。这样，马克思目睹的民主还是很初步的，有很多毛病和问题，他对之加以批评和否定也很正常。

其二，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历史图式有关。马克思认为代议制民主将会很快随着资本主义制度一起消亡，而人类社会将过渡到共产主义。在《哲学的贫困》《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共产主义原理》等著作中，他和恩格斯都把代议制民主看作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而加以否定。归纳起来，他们有关民主的论述贯穿了两个思想：一是不断地揭露代议制民主的“阶级性”、“虚伪性”和“欺骗性”的本质，指出它仅仅是一种表面“形式”；一是通过巴黎公社的经验来肯定无产阶级民主，他们认为这种民主具有经济平等和直接民主的特点，因此是实质性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他和恩格斯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为实质民主提供了现实条件，因为到那时没有国家、没有警察和军队，只有“自由人联合体”。

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后来为列宁和斯大林所继承。在马克思去世以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出现了一个新概念叫“民主集中制”。它既是列宁—斯大林实践的产物，也是马克思的实质民主的思想的形式化。

“民主集中制”是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来的。它的思想来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恩格斯曾参与起草共产主义同盟的新章程，这个新章程规定了共产主义同盟的组织原则：同盟由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构成，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执行权属于中央委员会，各级委员会都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等。共产主义同盟的这些组织原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列宁继承了，他称之为“民主集中制”。1905年9月，列宁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一文中说：“实行彻底的集中制

和坚决扩大党组织内的民主。”一战期间，列宁还在其他场合多次提到“民主集中制”，仍然是上面这句话的内容。从此以后，“民主集中制”成为俄国共产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它又进一步扩大为俄国的国家行政管理原则。这样，马克思的实质民主的思想，最终通过列宁的实践而变成了一种政治制度。

但是，“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政治制度并不符合建立者原来的期望。1918年在“十月革命”之后不久，马克斯·韦伯在几次讲演中都尖锐地指出：“十月革命”建立的不是无产阶级国家，也不是人民国家，而是一个典型的“官僚国家”。列宁也看到自己所创立的政治体制不仅没有超越它一贯否定的资产阶级民主，反而导致整个国家的严重官僚主义化。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不断地痛斥俄国的“官僚主义”，抱恨而终。

“民主集中制”这个口号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从列宁的话看，它既强调“集中”又强调“民主”，这与代议制民主的目标没什么差别。但是，为什么它却结出一个极端官僚主义的果实呢？原因很简单：列宁的“民主集中制”仅仅是一个原则，它并没有相应的复杂形式系统来支撑。上面转述的共产主义同盟的新章程的内容说明，它没有什么新内容，仅是从宪政民主的庞大形式系统中抽取了个别要素而已（一层一层地集权以及选举和罢免党内干部）。它在形式上是极其简单化的。这样简单的形式，用来管理政党组织尚且不行，用来管理一个国家就更成问题了。

由于去掉了宪政民主的复杂形式而变成空洞的原则，“民主集中制”的实践难免导致朝着某种原始状态倒退。实际上，马克思的实质民主（直接民主、经济平等）思想本身就是对原始状态的向往。他过分地夸大了巴黎公社的价值，把它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然而巴黎公社仅是一种原始民主形态，是法国中世纪晚期以来城市中无数的“公社运动”中的一个。它的产生与马克思的阶级学说毫无关系，是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惨败激起了巴黎工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不是什么阶级斗争的结果。巴黎公社的直接民主是短暂的而且混乱的。

假如巴黎公社不被镇压，仍凭它自由发展，那么，它的前途将会如何呢？可以预计，它搞得

好也顶多是中世纪自治城市民主那样的一种原始形态。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即走向寡头政治。对于这个趋势,罗伯特·米歇尔斯作了很深刻的揭示。米歇尔斯是列宁的同代人,并且是19世纪后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要成员。他根据多年的观察和研究在1911年写了《寡头政治的铁律》一书,仔细地描述和分析了德国、俄国、美国等国家的工人组织和社会主义政党,用大量事实指出:工人阶级的各个组织与政党,并非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具有什么天然美德和好品质,它们与其他组织和政党一样,不可避免地要变成官僚化的、精英主义的、利己主义的寡头政治的,这就是“寡头政治的铁律”。

这两种情况都被列宁遇到了。“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先是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而废除国家机器,让工人阶级领导工厂、组织生产和销售,结果工人组织各自为政,或者盲目生产,或者自行定价,搞得全国进入原始状态一般的混乱。作家高尔基立即在报纸上发文痛斥“列宁是一个化学家”,“正在用活人搞实验”。面对这种局面,列宁又陷入另一个困境,他不得不恢复官僚管理体系,对全国采取军警控制,并创立了高度集权化的“党国”体制。而在他去世之后,斯大林推行的全面国有化不仅消灭了所有的私营企业,也把所有的新闻媒体变为党与政府的下属机构和喉舌,毫不费力地把俄国变成一个“极权主义”国家。

在苏联模式国家的意识形态宣传中,“民主集中制”一直是从实质民主(直接民主、财产平等)方面来阐释的。但由于丢掉了代议制民主的形式,对“实质”的追求也成了泡影。“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成了社会赤贫,而“人民民主”、“人民监督”、“人民做主”等政治目标也仅是口号而已。

历史证明,丢掉民主的“形式”就不会有民主的“实质”。列宁的“民主集中制”试验,结果是沒有“民主”而只有“集中”,国家管理不断地迈向全面的官僚主义控制。苏联模式的政治体系很像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集权官僚制。它也的确是片面地发展了国家“集权”与“官僚制”的因素。而且,借助于政党组织这个新的形式要素的加入,借助于现代交通、通讯等技术手段的帮助,它搞得更加极端。



《德国思想家论中国》的封面

### 三、民主的“共性”与“特色”

世界各国的民主都是不一样的,西方各成熟民主国家之间也有很大差别,可谓各有自己的特色。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没有共性,相反,共性比个性特色更加重要。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会陷入另一个认识误区。

现代民主有其“一般形式”(“抽象形式”)和“具体形式”。所谓一般形式,是指从各个成熟的民主国家抽取的共性特点,如三权分立、选举投票、政党竞争、言论出版与结社自由、地方与社会自治、法律体系、中央集权制,等等,这些是所有民主都必须具有的共性特点。所谓具体形式,是指这些共性特点在每个国家的具体表现或落实,亦即个性特色。比如三权分立,美国、韩国等总统制国家就比较明显,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基本是鼎立的,总统的权力也比较大。而英国、日本等内阁制国家,三权并不是鼎立的,议会的权力比较大,首相(总理)的权力则远不能与美国的总统相比;再如选举投票,国会议员选举有小选区制(1个选区选1名议员)与中选区制(1个选区选

2名议员)等区别,而总统选举有的是选民直选,有的是由议会选举,美国总统则是以一种类似直选但也很大不同的“选举人团”方式产生;再如政党竞争,有一大党制(如日本自民党时期)、两党制(如美国)、两大党制(如韩国)、多党制(如德国)等不同的形态。总之,每个国家的民主的具体形式都是具有各自特色的。

自己特色的形成往往由政治精英们的博弈所决定。他们在选择具体民主形式时,一方面从本国的历史文化等国情出发,另一方面也加入了自己党派的利益。由于有了美国总统制和英国内阁制的样板,后来的很多国家就经常发生是搞总统制还是搞内阁制的争论。比如韩国在1948年建国之时,李承晚觉得自己能够当上总统所以就主张搞总统制,而反对党派领袖却坚决主张内阁制。因为李承晚的势力强大,所以最后选择了总统制。同样,国会议员的具体选举方法也是政治精英们的博弈结果。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真正是由人民选择的。人民的力量可以发动起来来推翻一个政府,但新政府的形式最终还是要由政治精英来选择和决定。

然而,政治精英们并非可以随心所欲,他们必须首先遵循民主“一般形式”的要求。他们可以选择总统制,可以选择内阁制,也可以把二者混在一起而搞成法国的那种“半总统制”,但前提是必须贯彻“三权分立”的原则。英国和日本尽管首相权力较小,但也同样贯穿了这个原则。并且,这两个国家还有“女王”和“天皇”,虽无实际权力,却形成另一个重要监督、制约力量,可以说是“四权分立”。国内有些学者批评美国的三权分立,其实,美国总统的集权程度很高。就像亨廷顿曾指出的:“英国只留下一个王冠,而美国却保留一个国王。”

这就是说,在民主制度建设上搞自己特色的余地可以说很大,也可以说很小。“特色”这个口号无论喊不喊,都会有个性特色,即使想完全模仿别人也不可能。不过,从世界近现代史看,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在发展民主时不喊“特色”。

最早喊着要搞自己“特色”民主的是美国。美国在酝酿民主制度时遇上了法国大革命,它的血腥的多数暴政给美国人带来心理阴影。美国人一边传播法国大革命的自由民主思想,一边希

望汲取法国大革命的教训,试图建设一个能够防止法国大革命那种民众暴政的民主制度。同时,美国政治家和思想家还不停地批评英国的宪政制度,因为这种制度维护了贵族特权而限制了普通民众的自由权利。可见,美国在建设民主制度时力求搞自己的特色。当然,这里有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即,从法国大革命到19世纪中期属于宪政民主的形式系统的结晶期,与英国、法国相比,美国并不落后,而且由于移民国家没有旧社会结构等优越条件,美国的民主实际上领先于英国和法国。这样,尽管美国不断地喊着搞自己特色的民主制度,却不意味着逃避学习先进。

当现代政治文明形成结晶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后来的国家如果再搞自己特色,就难免带上抵制先进文明的色彩。世界上首先举起这个“特色”大旗的是德国。德国虽然也是西欧国家,但其现代化起步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在17、18世纪,德国人一方面崇尚它的“西方”(英、法)的文明进步,甚至说法语和模仿法国宫廷生活方式成为时尚,另一方面,德国人的民族自卑情绪不断增长,以至于德国人拒绝使用当时流行的“文明”一词,因为这个词代表现代化的工业、城市、政治和外交等等。德国人创造了“文化”一词来代替“文明”。据考证,“文化”这个词在西欧最早出现于1793年的德文词典。德国人用它来概括自己的高级的东西,以表示对“文明”的蔑视。德国人发明的这种抵制现代化的词语更替法,直到今天仍被很多国家所仿效。但这里却包含着巨大危险:由于强调自己特色,德国的现代思想中融入了浓厚的浪漫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传统。甚至连比较开明的思想家如黑格尔和马克斯·韦伯对现代文明的理解也是有问题的,前者把“国家”强调在“市民社会”之上,后者过分强调官僚制的现代意义,都潜藏着贬低个人自由权利的味道。至于德国整个国家的人文精神,则一直是远远落后于英美的。它出了赫德、穆涉、费希特、尼采、海德格尔等这样一大批反现代性的思想家,法西斯主义也是在这种落后的人文环境中孕育的。

在这种背景下,所谓的德国特色无非是维护落后观念和制度并大打折扣地引进先进文明而已。1871年俾斯麦倡导制定的德意志帝国宪法表面上称为代议制,实际上违反了宪政民主的一般形式的要求,如,赋予皇帝和宰相以极大权力,

各邦不平等,联邦议会议长由宰相担任,议员由君主任命,等等。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制定的魏玛宪法虽然较充分地规定了代议制民主的形式,但却加进了限制私有财产、限制经济自由、规定国家干预经济各项措施的内容。这些因素,为后来纳粹党的“国家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

德国毕竟是一个西欧国家,它的现代文明与英美差距并不很大。尽管如此,它的“特色”道路最后害了自己。在民族主义和自己编织的“文化”光环的蒙蔽下,德国缺乏自知之明,一直在挑战现代文明的高峰,却不断遭受沉重的打击。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它总是在开始时跳得很高,结果却败得很惨。在二战结束后,美英占领西德而对其动了大的“外科手术”,自由民主思想才在这里真正扎根。

同样的例子还有日本。日本在1880年代的自由民权运动中建立宪政体制时,派使团到落后的德国去取经,结果,明治宪法成了1850年普鲁士宪法和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的综合,天皇和贵族被赋予巨大权力和众多特权,民众自由虽说提倡却受到各种限制。这样,民主的一般形式在日本并没得到落实,“共性”微弱而“特色”突出。直到1920年的普选,日本有投票资格的人占总人口不到5%。自由民主精神迟迟不能生根,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就这样,日本还以为自己发展出了新的文明,在取得“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胜利之后更是忘乎所以,呼喊要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不知高低地挑战世界文明的高峰,结果在二战后被美军占领而动了“外科手术”。自由民主在日本的实质性进步也是在“外科手术”后才开始的。

拉丁美洲地区、东南亚、西亚等地区的众多国家,绝大多数都在谋求走自己的特色道路并呼喊这类口号。包括1970年代的韩国,朴正熙总统为了推行他的“维新体制”,多次发表“搞韩国式民主”、“不搞美式民主”一类观点。朴正熙总统喊这个口号,是为了给自己采取措施控制住大学生运动而提供合法借口。其他国家喊这个口号,也各有自己的具体目的:有的是要寻找一条稳妥的政治变革道路,有的是出于维护自己的民族主义面子或文化尊严,有的是统治者把它作为维护现状的借口,等等。

无论怎样,“特色”民主的道路并不宽广。由于宪政民主是从世界范围积聚理性因素结晶而成,落后国家必须引进它的一般形式系统,否则,就只能处在落后状态。印度的民主即使从独立后算起也搞了六十多年了,却一直没有搞好。原因是民主的一般形式要素没有在印度很好落实。比如选举,至今在印度广大的落后农村和城市的某些角落,仍由乡村地主和权贵们控制着投票,而村民和下人则由于在经济上的依附地位,心甘情愿地把选票交给他们的主人办理。其他形式比如三权分立、政党竞争等也都在印度打了各种折扣。这些“特色”决定了印度民主的落后。不过,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搞的两年一次的世界各国民主指数排名中,印度属于“初步民主”,在近170个国家中排在第35~40位之间。这说明印度在世界范围看还属比较好的,多数国家要比印度更加远离民主的一般形式。

民主进程总是很缓慢的。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经济落后而传统文化力量强大,民主的一般形式难免被扭曲。但这不说明它们能够走出另一条道路,而只说明它们的落后将是长久的,将长期受到不好的“特色”的困扰。新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会不断地打破现有的平衡和稳定,最终搞不下去而陷入社会崩溃或国家分裂。自从苏东解体之后,矛盾与冲突多发地是伊斯兰教地区。这里的一些国家在搞“特色”民主过程中,一方面引进了宪政民主的部分形式,另一方面却在努力保持自己的传统政治要素,尤其是宗教原则广泛地渗透到宪法和法律之中。很多国家形成了一种混合政治体制,因而不能适应社会不断变化发展的需要。弥漫的特权、垄断与腐败、巨大的贫富差距、日益升级的部族冲突、地区冲突,等等,或者转化为内部屠杀和战争,或转化为国际恐怖主义与对外侵略,从而招致西方国家的武力干涉。阿富汗、伊拉克等国,没有像当年的德国、日本、苏联那样高调地挑战文明的高峰,却同样遭到被施行“外科手术”的命运。

以上展开的历史画卷说明,抵制现代民主的一般形式是一条危险的道路。■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黄 钟)

# 审判独立的60年纷争

○ 崔 敏

“审判独立”又称“司法独立”，它是人类法治文明的普世价值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如何对待审判独立以及执政党如何领导司法工作，始终是一个严肃而又十分敏感的话题。下面，按照时间的顺序，把若干不同的提法、做法和相关的纷争，作简要的梳理。

## （一）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

我国的法制建设从1954年步入正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标志着法制建设开始起步，也为后来其他法律、法规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1954年宪法第78条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这是迄今为止有关司法独立的最简洁、最明确的表述。

## （二）董必武主张依法办事，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又是新中国成立后一度主管政法工作的元老。建国初期，董老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1954年宪法颁布后，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举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一再强调要健全法制，严格依法办事，要求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大家公认董必武是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奠基人。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国家的法制”。董必武在八大的发言，强调“依法办事是加强法制的中心环节”，成为大会的一大亮点。

1957年3月18日，董必武在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军事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着重强调了审判独立的问题，他说：“党是我们国家的领导核

心，我们一切工作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但党的领导不是每个具体案件都要党委管，如果这样，那还设法院这些机构干什么。”

他还进一步指出：“法院是唯一的审判机关，别的机关不能审判。为什么呢？因为国家的审判权没给他们，只给了法院。有审判权的机关是特定的机关，国家任命一些人代表国家进行审判。别的机关不能作判决，因之法院和别的机关处理问题不一样。法院主要的工作就是审判活动。”

董必武的上述讲话，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它揭示了人民法院在国家机构设置中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作用，对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

## （三）“反右派”斗争否定了审判独立

1957年夏季，风云突变，一场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在中华大地猛烈展开，大批司法工作者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帽子，许多正确的法制原则和法学思想遭到猛烈批判。当时法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被批判的“右派观点”，主要有“审判独立”、“有利被告”、“无罪推定”和“自由心证”等。宪法规定的“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也被当成反动观点加以鞭挞，主张审判独立被说成是“以法抗党”。那种严厉的政治审视和简单粗暴的文字批判，使法学研究的活跃气氛顿时消失。

## （四）第四届全国司法会议强调“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

“反右派”之后，紧接着在1958年6月至8月召开了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把司法部党组打成“反党集团”，随即将司法部撤销（此案直到1978年12月才由中共中央宣布平反，接着恢复司法部）。会议认为：主张审判独立就是“反对党的领导，以法抗党，是资产阶级旧法观点借尸还



董必武

魂”，强调“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法院工作服从党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党对审判具体案件以及其他一切方面的指示和监督。”

第四届司法工作会议实际上是批判了以董必武为代表的注重法制建设、强调依法办事的观点，在政法干部中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导致法律虚无主义广为传播，宁“左”勿右的思想普遍盛行，法制建设遭到破坏。

#### （五）毛泽东决断：“要人治，不要法治”

第四届司法工作会议结束后，1958的8月21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借评论公安、司法会议发表谈话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成。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有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我们每次的决议都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最高领袖的这番谈话，对建国以来有关治国方略的探索作了总结，结论是：“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个社论，全国执行，何必有什么

法律？”这样一来，“八大”关于加强法制建设的决议被推翻了，董必武提出的“依法办事”主张被抛弃，整个国家处于以领导人意志为中心，不断发动政治运动的紧张局面之中。

#### （六）1960年11月，中央决定公检法三机关合署办公

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中，最初是推广将公检法三机关混为一体的“一长代三长，一员顶三员，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1960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政法机关精简机构和改变管理体制的批复》，宣布中央书记处做出两项决定：

（一）中央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合署办公。对外，三机关名称不变，保留三块牌子，三个大门出入；对内，由公安部党组统率，两院各出一人参加公安部党组，以加强工作联系。

（二）三机关合署办公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保留二三十人，最高人民法院保留五十人左右，各设一个办公室，分别处理检察、法院的必要业务工作。

根据这一决定，中央公检法三机关合并为一个机关，并且是采取了把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并入公安部的方式，创立了由公安统领法院和检察院的体制。从此确立了公安的“老大”地位，对后来三机关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央公检法三机关合并后，上行下效，全国各地普遍将公检法三机关合并为“政法部”或“政法公安部”。有些地方的党政领导人率领政法部门的干警，带上空白逮捕证和空白判决书，下乡下厂为“打开局面”随意捕人。对抓起来的人，有的甚至不开庭审判，在空白判决书上填一个名字，加上几个罪名就判处了刑罚——这便是最彻底的人治，使政法工作整个乱了套。

#### （七）总结经验，刘少奇强调“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的领导”

“大跃进”中提出了各种根本不可能完成的高指标（例如钢产量和粮食产量在一年内都要翻一番，等等），各地竞相攀比放“高产卫星”（事后发现全是自欺欺人，没有一个真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和强迫命令风等“五风”泛滥的结果，是图虚名而招实祸，造成工农业

生产大幅下降,粮食严重短缺,继而发生了大饥荒和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形势极度紧张。中央遂于1962年1月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这一时期的经验教训,共度难关。时为党和国家第二号人物的刘少奇对造成困难的原因作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分析,随即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努力克服困难,恢复国民经济。

同年5月,刘少奇又主持对1958年以来的政法工作进行总结,明确指出:“这几年政法工作总的经验教训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要是误我为敌,打击面过宽。用对付敌人的专政办法来处理自己人的问题,处理劳动人民的问题,这是个根本错误。”他还进一步指出:“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是宪法规定的,党委和政府不应干涉他们判案子。……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的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如果地方党委的决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从哪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

刘少奇的上述讲话,话虽不多,但极端重要,触及了最要害的问题。这是对政法工作是否应当服从党委绝对领导的第一次认真反思。

众所周知,所谓“驯服工具论”最早是由刘少奇提出的。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就是贯彻刘少奇的指示,特别强调了“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但是到1962年5月,由他主持对1958年以来的政法工作进行总结时,他便公开否定了“驯服工具论”,明确指出:“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是宪法规定的,党委和政府不应干涉他们判案子。……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的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

### (八)“文革”中鼓吹“三忠于、四无限”,滥施专政带来无穷苦难

可惜,刘少奇的上述忠告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仅仅三个月后,毛泽东在北戴河重提阶级斗争,强调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遂使对政法工作总结经验陷于停滞。其后,“左”的指导思想愈演愈烈,导致1966年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的显著特点是以人画线,将个人崇拜

推向了极端,鼓吹“三忠于、四无限”,即“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敬仰、无限崇拜”,对稍有不敬者即滥施专政。林彪有一句名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张春桥则要“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实行全面专政”。最能体现这种镇压和“全面专政”的,就是1967年1月发布的“公安六条”。其中第2条规定:“凡是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在实际的执行中,这一条又被扩展为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稍有不满的,都以“现行反革命”论处。例如,张志新只因对“文革”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就被定为“反革命”判处了死刑。临刑前怕她呼喊口号,竟将其喉管切断,惨绝人寰!“公安六条”的第4条将地、富、反、坏、右等21种人及其家属都列为专政对象,广泛实行株连,类似于封建时代的“夷三族”,致使冤假错案遍于国中,亿万人民身受其害,使党和国家遭遇了一场空前的浩劫。

### (九)痛定思痛,邓小平提出“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1976年10月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随后,邓小平再次复出。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针对这种现象,邓小平着重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邓小平的这一席话,振聋发聩。尽管当时还没有概括出“依法治国”四个字,但它已经包含了这样的意思。

### (十)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

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和新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的下述一段话,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检

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这一段话,可以说是饱蘸着血和泪写出来的。它突出强调了“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而不再是以往所说的“忠于领袖、忠于领袖的思想、忠于领袖的路线”和“做党的驯服工具”,这是一个显著的变化,集中表达了对以往践踏法制的深刻反思和对健全法制的殷切期待。

#### (十一)“64号文件”正式宣布取消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

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1979年7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就制定颁布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初步实现了有法可依。中共中央于1979年9月9日发布《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即著名的[1979]64号文件)。这个文件极其重要,可以看作是迈向法治社会的宣言书。

文件一开始就严肃指出:“我们党内,由于建国以来对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长期没有重视,否定法律,轻视法制,以党代政,以言代法,有法不依,在很多同志身上已经成为习惯;认为法律可有可无,法律束手束脚,政策就是法律,有了政策可以不要法律等思想,在党员干部中相当流行。……如果我们不下决心解决这些问题,国家制定的法律就难以贯彻执行,我们党就会失信于民。”

基于上述认识,中央对“两法”的实施做出五项指示,其中特别强调:“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切实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党委和司法机关各有专责,不能互相代替,不应互相混淆。”为此,郑重宣告:“中央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进而指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坚决改变过去那种以党代政、以言代法,不按法律规定办事,包揽司法行政事务的习惯和作法。”

经历过“文革”内乱的许多同志,看到这份文

件都激动得热泪盈眶,普遍认为,这是建国以来甚至是建党以来,关于政法工作的第一个最重要、最深刻、最好的文件,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 (十二)1982年宪法部分恢复“审判独立”,但加了一个限制语

司法独立是现代民主法治的一项重要原则,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并成为联合国确立的司法准则之一,因而具有普世价值。我国1954年宪法规定:“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取消了“独立审判”的规定;1982年宪法部分恢复了“审判独立”,但却加了一个限制语,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组织 and 个人的干涉。”这种表述方式颇为微妙,言外之意,来自党委的指示不能视为干涉,它为后来又强调“人民法院必须服从党委绝对领导”埋下了伏笔。

#### (十三)党章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在总纲中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

其后,十三大、十四大……直至十七大通过的党章,在“总纲”中都保留了同样的内容。这表明:在新的形势下,必须理顺党法关系,执政党更应带头模范地遵守宪法,维护宪法与法律的尊严,切实保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无论职务多高,权力多大,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更不能提出和推行与党章和宪法的规定不一致的口号和做法。

#### (十四)十三大决定党政分开,随即取消中央政法委员会

1986年,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强调“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

1987年召开党的十三大决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时任总书记的赵紫阳在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和

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

十三大之后,中央决定搞机构改革,强调党政分开、政企分开。1988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宣布撤销中央政法委员会(不过,大多数省级以下的政法委员会并未随之撤销)。

### (十五)1990年恢复政法委员会,并逐步强化

1989年发生了“政治风波”,“维稳”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1990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政法工作的通知》,宣布恢复中央政法委员会。199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加强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工作的通知》,将政法委提升为“党委的职能部门”,并规定各级政法委员会有十项职责任务,成为统管政法各部门的领导机关。其后,政法委的权力不断扩张,经常召集“三长会议”协调定案,事实上成为公检法(以及司法、国家安全等机关)之上的最有权威的强力机关。

### (十六)十五大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方略

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正式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国的基本方略。全国人大随即将“依法治国”写进了宪法。修改后的宪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依法治国”方略由执政党的代表大会正式确立并由全国人大写入了宪法,标志着我国打算迈向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值得注意的是,“依法治国”正式提出后,似乎又觉得“依法治国”的口号讲冒了,认为光靠法律难以治理好国家,于是很快又提出“以德治国”作为补充,要求“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在事实上又冲淡了“依法治国”。

### (十七)十六大和十七大要求“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十六大报告的表述是:“必须毫不放松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十七大报告的表述是:“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



毛泽东

理国家”,“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这两次党代会,反复强调“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进一步具体化。

### (十八)一些文件和领导讲话重新强调“绝对领导”

大约从2004年起,在有些文件和领导讲话中,又出现了“坚持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绝对领导”的提法,乃至把司法独立批判为“实际上是否定党的领导”。

“绝对领导”的提法有片面性,至少有几点不妥:

1. 从词源本意上来说,“绝对领导”的提法本身不科学,很容易被理解为“无条件地服从”和“让你怎么判你就怎么判”,如同林彪所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已被实践证明行不通。

2. 与“绝对”对应的是“相对”,如果说党对人民法院实行“绝对领导”,那么,按照逻辑的推论,对其他部门岂非只是“相对领导”?这是说不通的。

3. 司法工作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它具有中立性、被动性、公正性、公开性、程序性等特点,人民法院审理任何案件,只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如果

司法工作不能保持应有的独立性,听任某些并不真正懂法的长官随意摆布,那就不可能有什么司法公正。近些年来,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利益已成为尾大不掉的赘瘤,就是明证。

4. 党章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依照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的规定,上下级法院之间也不是直接领导关系,而是审判监督关系,各级人民法院都应当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上级法院不能指令下级法院对某一案件如何下判,而只能对提出上(抗)诉的案件依法重新审理,通过维持原判,或者改判、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等对下级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如果上级法院预先就某一案件应当如何判决向下级法院作指示,就会使法定的“两审终审制”成为虚设——这是最基本的诉讼原理。既然人民法院上下级之间都不能实行“绝对领导”,在论述执政党如何领导法院和审判工作的问题上,就更应当谨慎,必须遵循诉讼规律,要讲究科学性。

总之,“绝对领导”的提法与理不通,不宜提倡。

#### (十九)半个世纪的曲折反复,走出了“之”字

建国以后,我党由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执政党,成为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毫无疑问应当担负起对于政法工作的领导责任。但是,执政党究竟应该如何领导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并不是一句话就能够说清楚的问题。六十多年来,在这个问题上作了不断的探索,中间有过各种不同的提法和做法,伴随着不断的纷争(有时争论和批判异常激烈,把主张依法办事的同志打成“反党分子”或“右派分子”,给予各种处分)。中国的法制建设就是在这种纷争中迂回曲折地向前迈进。在此期间,1958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不点名地批判了董必武强调依法办事的主张,强调“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随即毛泽东决断“要人治,不要法治”,走上了毁弃法制的不归路。正是这些提法和做法造成党权无限膨胀,以致发展到“三忠于、四无限”、“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和“在一切领域实行全面专政”,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吃够了苦头。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强调“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

和“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1979]64号文件正式宣布取消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方略,表明我党汲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将引导我国迈向法治社会。然而,事物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近年又重新强调“始终坚持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并把司法独立批判为“否定党的领导”,又回到了50多年前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提法。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反复,竟然走出了“之”字。

#### (二十)“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的辩证关系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如何对待审判独立以及执政党如何领导司法工作,始终是一个严肃而又十分敏感的话题。”说来说去,最终归结为如何认识“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的辩证关系。

众所周知,邓小平对“坚持党的领导”与“改善党的领导”的辩证关系讲得最多,最为实在,道理也讲得最为充分。他指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为了强调改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邓小平还反复强调:“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

但愿我们能够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切实解决好“坚持党的领导”与“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诚如是,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我国迈向法治社会便大有希望。■

(作者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黄 钟)

### 炎黄春秋网上书城

网上购书 方便快捷

网址: <http://yh100.taobao.com>

本刊唯一授权网上书店

联系电话: 18611911105 15801313168

联系人: 关小姐 淘宝旺旺: zssy8888

# 毛主席怎样培育 8341 部队

○ 武健华

## 一、8341 部队的由来

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共中央警卫团的代号 8341, 社会上的议论很多, 涉及的方面也很广, 传说纷纭。

种种传说, 除个别如活到 83 岁, 执政 41 年属于巧合外, 都不是事实, 因为这件具体事与毛泽东主席根本没有关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每一支部队, 为了简便或保密而用来代替正式名称的都有一个代号, 同时还有一个正式名称的番号。而代号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对全军统一下达的。如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共中央警卫团这是正式番号, 而 8341 部队这个代号, 是总参谋部下达的。而且代号用过一个时期后, 是要更换的, 像中共中央警卫团现在已有新领的代号, 8341 已经不再使用了。

据军史有关辞书记载: 中共中央警卫团的前身, 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1928 年 5 月, 为保证红军军部和首长的安全, 毛泽东在井冈山组建了军部特务连。特务连先后经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 不断发展壮大。1942 年 10 月 20 日正式组建中共中央警备团, 对外称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警备团, 团长吴烈、政治委员肖前, 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警卫部队。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需要, 建制屡有变化。1949 年 5 月进驻北平后, 中央警备团扩编为中央警卫师, 中央军委 1950 年 10 月 20 日决定从 4 个野战军中, 各抽组一个营, 集中到北京编成。师长刘辉山, 政治委员张廷楨。1953 年 5 月, 因中央警卫机构的变动, 在中央警卫师一团(前身是延安中央警备团)的基础上, 调整充实组成新的中共中央警卫

团(实际是师的建制)。该团番号全称: 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警卫团, 担负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警卫任务, 团长张耀祠, 政治委员杨德中。中央警卫团的建制归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领导, 按编制序列, 总参谋部下达给中央警卫团的代号为 8341 部队。

1976 年粉碎“四人帮”后,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 中共中央警卫团又恢复中央警卫师的番号, 总参下达的代号是 57001。师长张随之, 政治委员武健华, 任务和隶属关系依旧不变。

这支部队在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成长壮大。几十年来, 这支部队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做到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职守, 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政治事故。

## 二、谦虚就可以调查出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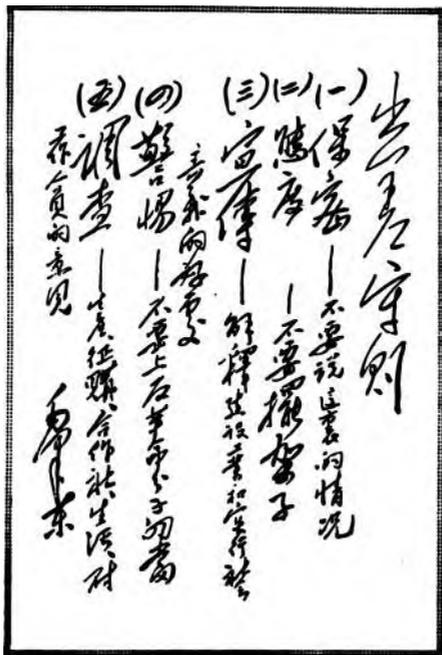
毛主席为了更多地直接掌握农村工作的动向和真实情况, 1955 年春交代中央办公厅和军委总参, 从全国每个专区选调一名优秀的排级干部, 补充到他身边的警卫部队(中央警卫团一中队), 任务之一就是轮流返乡做农村调查, 作为他联系农村、



1955 年 5 月 14 日, 毛主席对 8341 部队下乡调研的同志作指示

了解农民的一种方法。

人员调齐以后,为了使警卫队员明白调查有什么好处,调查什么,怎样调查,毛主席于1955年5月14日下午,在颐年堂前院,给中央警卫局和8341部队领导以及警卫中队的全体同志作长时间的重要讲话。毛主席坐在藤椅上,就像拉家常一样,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一直讲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壮丽图景,又讲到每个人应该怎样工作。毛主席说,你们都是做警卫工作的,我现在给你们加一项,就是调查工作。你们



毛主席为警卫战士制订的《出差守则》手迹

要有三个任务:一个是保卫工作,一个是学习,再加一项调查工作。为什么要做调查?就是要多为人民服务。我们各人的工作不同,有站哨,有做别的工作的,但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你们的调查,对我对中央都有帮助。

毛主席对将要返乡做调查的同志们说:“我们拟个章程,对人要谦虚,对父母,对乡村老百姓要尊重;要尊重区乡干部,别摆架子。谦虚就可以调查出东西。”毛主席要同志们调查中注意宣传党的政策。

在回乡调查的同志们出发之前,毛主席又亲笔写了《出差守则》:(一)保密——不要谈这里的情况。(二)态度——不要摆架子。(三)宣传——解释建设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的好处。(四)警惕——不要上反革命分子的当。(五)调查——生产、征购、合作社、生活、对工作人员的意见。

毛主席的讲话,使同志们提高了认识,明确了任务,学习了调查的方法。回乡的同志怀着必须完成任务的决心,从自己父母、亲朋好友、老师同学、左邻右舍、乡村干部等多方面,通过劳动、交谈、访问,了解到许多翔实生动的情况,回部队后将调查的材料写成书面报告。

毛主席亲自听取汇报,批阅调查报告。1955年7月19日、25日、26日,他一连三天,用了10多个小时,听取回队同志的汇报。为了节省时间,毛主席还把汇报的同志留在家里一起吃饭,边吃

边谈。在汇报中,他仔细地询问每个同志自己家里的人,能不能吃饱,还有多少余粮,家里有几个劳力,收入有多少,有没有生病受灾的,进而问到村里乡里生产、生活等情况。在听汇报的过程中,毛主席时而沉思,时而做笔记,时而插话,时而长长地叹气。

毛主席一字一句地看同志们写的调查报告,遇有错别字和用错了的标点符号,都一一改正过来。他一手拿着材料,一手拿着红笔,讲道:“你过来,你们都过来。你们看,这是报酬的‘酬’字,这是仇恨的‘仇’字。”“这是‘总’字,这是‘怎’

字。”见到文字畅通,内容又比较好的报告,主席就马上肯定。毛主席看到队员叶遥反映他的家乡广东省南雄县第三区新田乡溯水村的贫下中农,依靠合作化的力量战胜了自然灾害,连声称赞说,你们那里的老百姓真能干,农业合作社就应该起到这样的作用。说着主席随手拿起笔,在报告上批示“合作社很好”。队员高碧岑,反映了他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第六区南竹乡的情况,毛主席看后也比较满意,在他的调查报告上批写:“此份报告写得不错,有分析,有例证。”

队员胡全德,在他写的河南省兰考县第六区小胡庄乡北孙庄村的调查报告中说,由于连年水灾,该村大多数群众,尤其是贫农没有余粮,缺粮户达到百分之五十。今春没有东西吃,只好吃树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发放购粮证太少,困难户太多,定产过高,实际产量达不到。群众普遍反映村干部传达政策不及时,因此不满意。有的农户甚至拔麦子吃,影响了明年的粮食生产。毛主席在此件上批注:“此乡缺粮,农民不满,值得注意。”

队员王文礼,在河南省延津县第五区阎屯乡五连屯村的调查报告中说,该村农民对粮食统购政策反映不一,有好有坏。统购时,有三分之二的农户要购粮证,实际上现在没有吃的是少数。该村去冬组织了一个生产合作社,贫农占三分之二,中农占

三分之一。开始建社时,由于速度过快,又没有采取自愿互利原则,使部分人思想不通,准备退社。由于不注意喂养,社里的牲口死了一些。社员不断吵架,生产情绪不高。社领导力量薄弱,缺乏经验,影响了生产。毛主席看后批注:“此乡粮食有些问题,不大。合作社问题较大。”

队员李好学,在他写的《关于河南省新蔡县第八区新化乡的调查报告》中说,该乡连年受灾,粮食收成不好,缺粮户增多,私商从中牟利,粮价上涨,有些人为了买粮食把农具、日用品都卖光了,农民的思想波动很大。在统购时,由于收成不好和部分干部工作中的偏差,使许多农户把口粮都卖了,而有些乡村干部的余粮则未卖,农民有意见。毛主席在此件上批写:“据说这个乡有些问题。乡主席有320斤余粮,只卖出70斤,春季又向政府购进20斤,人民有意见。”同时,毛主席在上述三件材料上都批示:“送交吴芝圃同志一阅,阅后退毛泽东。”

吴芝圃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河南省省长。他看过调查报告后,于1955年7月22日给中央办公厅写信说:“主席批交我阅的河南三个乡的调查材料,我已经阅过。感到有些情况很值得注意。”“为了便于回去进一步作调查研究和改正工作中的错误,已把这三个材料抄写了,兹把原件送回,请查收。”

我们记忆犹新的还有,毛主席还把李宝森、王立勤、段明玉三人写的反映山东省一些地区缺粮情况严重的材料批交中央全会各同志。1958年5月24日,毛主席给当时主管农业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写了一封信:

震林同志:此件请你一阅,山东有那么多的缺粮户,值得研究一下。如你有时间,请找李宝森等三人(都是干部队队员,给我们守卫的,排长级干部)问一下情况。因我忙,不暇找他们谈。

毛泽东

五月廿四日

谭震林于5月26日向毛主席作了报告:“已遵示,找了李宝森等三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他们反映的问题基本上是对的。山东省

每人平均口粮360斤,少数山区是200多斤,一般说是够吃的。去冬以来,劳动强度增加,有一部分人不够吃,这是全国的现象。”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解决好粮食问题的要求和办法。毛主席当即在谭震林的报告上(附有李宝森等三人写的调查材料)批送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

即送小平同志,即刻印发到会各同志。粮食问题,请各同志注意。

毛泽东

五月廿七日上午二时

批示中说的“到会各同志”,是指正在参加中共中央八届五中全会的同志。

### 三、学好文化,毛主席担任名誉校长

毛主席从多名警卫队员的汇报中,发现他们的文化程度比较低,为完成好当前的任务,并为这些年轻人长远着想,急需采取切实措施提高这些同志的文化程度。毛主席在同他们交谈时,不断提到要加强文化学习的问题。

1955年7月26日,警卫队长韩庆余带领第三批队员汇报探家调查情况。韩队长把六个队员写的材料交给毛主席,主席先看曾文的材料说:“写得好,写得好,你调查得很好。”毛主席拿着材料,指点着问:“这个材料是你自己写的?”曾文说:“别人帮我抄了一下。”主席把头往后一靠,笑道:“我不是看表面文章的,字再漂亮,内容空空,虚有一手好字。你们是给我提供真实情况的,通过你们进行社会调查,要学的是社会学,解决的也是社会问题。以后不要叫别人抄了,别人抄的就不新鲜了,你们自己调查的东西自己写,就给人一种很原始的感觉。”主席进而问道:“你们学不学文化?”

大家回答:“一周一天。”

主席问:“还学什么?”

“星期六党日活动和整理卫生,其余五天除一天文化课外,军政各一半。”

主席听得很认真,问道:“政治学什么?”



毛主席为警卫战士的学习题词

“当前是全国党代会四个决议等文件。”

主席又问：“那么什么是军事？”

“制式教练。”

毛主席回忆着：“在辛亥革命时期，我当过半年兵，那时不像你们现在，严格得很，也学不到什么东西，但靠自己订报，看书也学到了不少政治上的学问。”主席又把话题拉回来：“长时期学这些怎么行呢！我们不打仗，又不是战斗部队，少学一点制式教练，要学一些文化科学。”主席指着张耀祠和韩庆余说：“不能让他们当一辈子兵，出去还干一点事。”主席扳着指头说：“要多学一些地理、历史、数学、物理和化学，五年中学毕业还是问题不大的。”

毛主席还常常提一些最普通的科学知识问题，启发队员们求知的欲望。从北方到南方，从渤海湾到珠江，主席走到哪里问到哪里；从天上的星星到地上的水，从空中的飞鸟到院子里的花木，主席是见到什么就问什么。主席在深夜散步的时候，问过哨兵：“你说天上有多少星座？为什么星星会发光？”有几次主席在游泳的时候就问道：“曾文，你知道水的成分是什么？”“王惠，人在水上为什么会漂起来？”“高碧岑，你说海水为什么是咸的？”这些曾经陪同主席横渡长江、同游大海的游泳猛将，一时被主席问住了。这时候，主席便会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只学语文、算术两门课？要多学一点文化科学知识嘛！”

一次散步的时候，主席问孙连忠：“广州为什么这样热？你说天热有什么好处？”孙连忠也是个扛活的出身，在家没有读过书，只好含糊地说：“天热就好呗。”主席笑着说：“你学过地理没有？”孙连忠回答：“没有。”主席便告诉他：“广州这地方是中国最好的地方，庄稼一年三收。你学学地理吧，我们的国家大得很！”

北京的秋天是凉爽的。有一天，高碧岑正陪着主席游泳，蓝蓝的天空里忽然飞来一团团乌云，顿时风吹浪起，成群的乌鸦乱飞，眼看就要下雨了。这时候，只见几只雄健的大鹰，身不摇，翅不动，穿过乌云，在天空平稳高飞。主席仰着身子问高碧岑：“你说老鹰在空中为什么翅膀不动可以飞？”高碧岑张口结舌说不上来。主席接着说：“你们以后可要好好学习物理啊！”

1956年9月15日早上，曾文刚起床就遇到主

席。主席喊了声他的名字，便和他谈起了警卫队的文化学习。

“……以后你们就不要叫什么队，就叫文化学校吧，你们都是学员。”主席停了一下问：“我当你们的校长好吗？”曾文高兴得连声说：“好！太好了！”主席笑了笑说：“我当名誉校长，再请一个副校长。你们在这里学习七八年，达到高中毕业或者大学毕业程度，你说成不成？”

“成！”曾文信心十足地回答主席。

主席又说：“你们还很年轻，才二十多岁，我看是可以的。”

曾文告诉主席：“现在同志们学习文化的劲头都很大。”主席点了点头，说：“你们在这个学校学习七八年，就成了工农出身的大学生，现在工农的大学生还很少，将来就多了。”

遵循着毛主席的指示，部队党委很快为警卫队制订了一个初中阶段的教育计划，送请主席批示。第二天主席就批准了这个计划。经过一番教学准备工作和组织工作，1957年1月21日，警卫队的文化学校正式开学了。

开学后，主席总是关注着他们的学习。对一些随他外出执勤的同志，主席常问他们：“你们工作累不累？你们把学习的东西都带上了吗？”主席还问随行的同志：“数理化好学不好学？”他们回答：“物理好学，讲的都是亲身做的和眼睛看到的，也好记，就是代数不好学。”主席温和地说：“代数一定得学好！物理、化学好多计算都是用代数计算的，要是学不好代数，物理、化学也学不好。不要怕难！”大家笑着答道：“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我们！”

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警卫队的队员们不仅是在主席的直接教诲和亲切关怀下，同时也是在主席忘我的工作精神和不倦的学习精神的鼓舞下，顽强刻苦地坚持着文化学习。他们亲眼看到，主席年纪那样大，知识那样渊博，但是工作起来，学习起来，常常是废寝忘食。从炎炎的夏夜，到风雪飘落的寒冬，主席屋里的那盏台灯，整夜整夜都是那样明亮。主席经常是这样无眠无休地操劳着国家大事。除了紧张的工作，还抓紧点滴时间读报刊，读古今中外的各类书籍。特别使队员们深受感动的是，主席每天坚持学习外文，夏夜12点还在路灯下大声朗读外语。主席每年都要抽出许多时间外出视察工

## 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首长接见八三四一援越抗美部队指战员



1968年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首长接见8341部队援越抗美部队指战员

作。他的行李随行的队员一手就可以轻轻提起,而他带的书籍文件,却是一箱又一箱。无论在轮船上、在火车上,甚至在飞机上,主席的座位上,总是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报。

毛主席的卫士张宝金在中南海机关业余学校学习4年(这个学校原是党中央机关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为广大工农干部举办的文化补习学校,后随党中央机关迁驻中南海,更名为“中南海机关业余学校”,归中央办公厅警卫局领导),非常刻苦,1955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后成绩优异,在班上名列前茅。主席十分高兴,对身边工作人员和警卫队员说:“张宝金是个很有上进心的人,他学习后有知识了,社会经验也多了,我就高看他一眼。”每次张宝金回中南海机关,主席都挤时间接见他,勉励他为建设好我们的国家要更加努力地学习。毛主席的另外两个卫士李连成和田云玉,经过努力,也于1956年一起考上大学预科班,结业时,主席请他们吃饭,还向他们敬酒。这对中南海业余学校的青年学员和警卫队员的学习热情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1960年1月,当主席知道警卫队员的文化学习已经取得显著成绩时,笑着向队员们说:“你们现在都成文人了。”

主席的这句话是对全体队员的最高奖励。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工农子弟,在主席的亲

切教导下,在工农群众知识化的道路上大大地迈进了一步。1959年8月,他们已经学完了初中课程。初中学习结业后,他们有的在警卫部队当了指导员、排长和教员,有的被送到党校和军事学校去深造。1960年10月,仍然在警卫队工作的队员进入高等教育课程的学习。

### 四、从实战中锻炼培养干部

1968年1月6日下午3时许,毛主席批阅完一批文件,稍事休息,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向他汇报8341部队“三支”“两军”的情况,毛主席表示满意。谈话中,毛主席对8341部队下达了新的任务。他说“这支部队任务太单纯,你们应该派些人到越南战场去经风雨见世面,从实战中锻炼培养干部。”

主席指示的主旨之一是“从实战中锻炼培养干部”,以进一步提高8341部队的军政素质。党委决定从机关、部队抽调具有培养前途的优秀干部100人,从各大队选拔机警灵活军政素质较好、接受能力较快的班长200人,组成指战员共300人的赴越参战部队,由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抽调干部组成领导班子,由8341部队政治部主任周广益带队。

参战部队于1968年2月15日集中在北京养蜂

夹道集训,学习毛主席对赴越参战的指示,听取部队首长的动员报告和各项政治要求。队员情绪极高,一致表示,决不辜负毛主席对我们的希望。

1968年2月19日下午3时许,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援越抗美的300名干部战士,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局、8341部队大队以上干部近千人,接受毛主席、周总理及在京的中央首长、中央军委首长的接见并合影留念。此时此刻,大家心情激动得简直像澎湃的大海,不能平静。

接见之后,参战部队又汇集到中南海团部会议室举行向毛主席表决心仪式:在一块长3米余、宽2.5米的红绸布上,援越抗美的每个指战员,签上自己的名字,悬挂在中央警卫局大礼堂,以表达参战部队忠诚的誓言和决心。参加这一庄严活动的王永海说,这种激动的心情我们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就是在硝烟弥漫的越南战场,天天都被那种激动的场所所鼓舞。

1968年2月20日上午,赴越部队从北京永定门火车站坐闷罐车出发,直达广西凭祥。部队在凭祥进行了战斗编组和入越前的各项物质准备。8341参战部队,对外代号是:总参谋部直属队。国内援越指挥部将它配属于已经在越战场的北京军区炮兵68师(代号4777部队),分散编入炮师的师部、营部、炮连、侦察班、通讯兵等作战单位。部队着装一律换穿与越南人民军一样的制式服装。部队出关、入关都必须遵守夜间行驶的规定,否则就会遭遇美机的轰炸。

1968年3月4日夜,总参谋部直属队进入越南。西南边境凭祥市至友谊关的大路上,停着经过严密伪装的长长车队和各种火炮。车上端坐着一排排头戴盔形帽、怀抱新式冲锋枪、高平两用机枪的士兵,一条薄被和一套换洗军装打成小背包垫在屁股底下。这支部队越过友谊关,跨进越南国境,按指定路线向各战区开进。

到达战区后,部队首先要搭个草棚作为战地住所,还要在离炮位不远的地方挖几个合乎标准的掩体。战地住所和战斗岗位不允许相隔太远,因此营部侦察班的住所就在一个不太高的山包脚下挖了一个长10米、宽4.5米的大坑,一面靠山垂直下切5米多深;顶上用树枝搭篷,铺上防水的油毡,再上面就是许多不断轮换的伪装草。山包顶上就是营指挥所,分别挖有1.8米深的战

斗掩体:有营指挥位置,有手持800倍望远镜的侦察兵的观察岗位,有有线值班员,有无线报话员等。部队根据防空作战任务和美机不同机型的活动规律,进行不间断的军事训练和演习。

美国的轰炸机、侦察机不断到战区上空骚扰,战斗警报不时响起,每天平均要进入阵地3至5次,最多一夜进入阵地8次。

1968年3月31日,美国政府迫于国内和国际压力,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开始逐步降级,而高空侦察机和无人侦察机则依然不少。4月16日上午9点多钟,观察哨发出战斗警报,指挥员下达“各就各位”的命令,炮手进入一等状态。原8341部队现侦察班的王永海,向指挥员报告美无人驾驶侦察机在大象山以南低空侦察,并不断变化着的方向、高度。当敌机进入我火力网时,指挥员一声令下,群炮齐射,第一次火力攻击就命中目标,这架美机拖着浓烟,喷着熊熊大火,从阵地上空滑过,“轰”的一声坠落在阵地西南方。

6月30日下午,部队在听纪念“七一”党的生日报告时,突然警报器拉响了。大家闪电般地进入战斗岗位。刹那间,阵地高空掠过一个小小的“影子”,美军RF-101侦察机又来捣乱了。RF-101机身细小,航速异常,像燕子似的,能快能慢,狡猾难打。机声过后,营长根据平时对RF-101的长期观察,判断它一定还会返航,一般需要20分钟。他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15分钟过去了,营长提前下达了“授弹”命令。20分钟、23分钟过去,仍不见一丝动静。烈日灼灼,令人喘不过气来,每个人都是大汗淋漓,汗水一直流进解放鞋,再从鞋里往外溢,大家仍站在那里,一步不移。下午4时45分,突然远处传来轻微的“嗡嗡”声,声音很快由远而近,由小而大,果真是RF-101返航了。敌机以每秒240米的速度,在飞行侦察,它做梦也想不到,刚飞进火力网,一阵猛烈的炮火,RF-101就翻滚着一头栽在阵地前的山谷中,轰隆一声爆炸了。

打掉这架敌机,还有一段有意思的小故事。原8341部队班长张本良虚心好学,想多学点高炮打敌机的技术,在做好他分内的工作后,一有空他就主动到炮位上向行家学压炮弹的技术。压炮弹这是一炮手的任务,要求炮弹要压得迅速准确,一不小心,可能手指就会被挤掉,在这方面

老炮手也是有教训的。由于张本良练得不错,其他炮手很愿意和他合作搞战备训练。这天当指挥员发出各炮手做好射击准备时,站在炮台上的一炮手是个尚未参加过战斗的新兵,被指挥员的命令声惊呆了,木讷地站在那里不动。就在这时指挥员发出“放!”的命令,张本良眼疾手快,咔嚓一声把几发炮弹一下子压到定位,这才使一连与相邻炮阵地一齐开火。张本良机智果敢,遇事不慌,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的事迹,在炮兵68师反响很大,本应立功受奖,但因8341部队带队同志对所属部队要求严格,把受奖的名额主动让给了68师有关单位和个人。

1968年5月31日,越美两国政府在巴黎开始和平谈判。11月1日起,美军停止轰炸和炮击越南北方。经中、越两国政府商定,中国援越高炮部队于1969年3月中旬全部回国。8341援越部队按期于1969年2月10日回到北京。

中国援越部队和各工程支队,在越南3年零9个月的时间里,共对敌作战2153次。击落美机1707架,击伤1608架,俘虏美军飞行员42名。

1969年2月21日午后,汪东兴向毛主席汇报了8341部队援越抗美的情况,主席听了微笑着说:“你们也对中越友谊做了点贡献嘛!”

(作者附记:赴越参战这一段的素材,由王永海同志提供,该同志后转业到山东省荣成市公安局任副局长。)

## 五、开展小整风改进作风

毛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很严格,特别不允许搞特殊化、以权谋私等违法违纪的事发生,一经发现,必亲自过问,从不姑息。

1960年以前的一段时间,与我们一起工作的某些工作人员(有几人属8341部队编制),在北京和随毛主席外出期间,违反纪律,从多吃多占到无偿索取当时市场上供应紧张的各种生活日用品,个别人还有贪污、渎职行为,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毛主席发觉后,立即指示,要在身边工作人员中开展小整风。

1960年9月下旬,毛主席把1958年3月派到江西省任副省长的汪东兴调回北京,仍任公安部副部长兼中央警卫局局长。9月28日上午,毛主

席对当日回京的汪东兴说,我发觉身边有“老鼠”,工作人员中,有些人思想作风不正,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清除“老鼠”,整顿思想作风。他要汪东兴抓好这件事。

10月3日下午,汪东兴就工作人员小整风的意见向主席作了汇报。他说,进行小整风,首先要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学习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文件。在学习的基础上,互相谈心,互相启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每天搞半天,争取50天完成小整风。毛主席说,办法对头。

10月6日上午,汪东兴召开毛主席办公室党支部扩大会议,宣布开展小整风计划,传达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说:“你们没有犯什么路线错误,只不过是生活作风、思想意识上的缺点,只要认真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一下就完了嘛。如果有人对你批评尖锐一些,也没有什么不好,就是让你不舒服几天、几十天,将来你会感觉到对自己是有帮助的。”毛主席还以他自身经历中的一些感觉来教诲大家。大家听了毛主席的讲话,都积极地参加了小整风。

在整风中,绝大多数人严格要求自己,自觉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不足之处,思想认识都有明显提高。整风中也揭发个别人有严重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作风,并且有贪污、渎职行为。还有人在随毛主席去外地视察工作时,曾向一些地方无偿索取物品,这一次也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和帮助,本人也写了检讨。

毛主席不能容忍和姑息贪污、渎职行为。当他知道群众揭露的事实后,虽然这个人是一位老同志,在他身边工作多年,仍果断决定将这样的人调离中南海。毛主席还要求大家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制订工作人员守则:“买东西一定要给人家钱,一张纸、一支笔也如此,千万不要向地方要东西。”“过去向各省、市要的东西,要照价付款,钱由我稿费内开支。”遵照毛主席的要求,从稿费中支取了那时不是一笔小数的三万多元,派人到出事各地,一一退赔并道歉,以挽回不良影响。■

(作者为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现已离休)

(责任编辑 黄 钟)

# 天安门城楼秘密翻建始末

○ 陈徒手

—

天安门城楼的建筑隐患一直是中央和北京市委多年暗地里操心不已的重点难题，“文革”爆发后毛泽东及高层领导频频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小将，号称“雄伟壮丽”却危机四伏的顶部楼高悬在领袖人物的头上，让知道内情的高官们担忧后怕。1968年3月24日天安门管理处向市委紧急报告说：“天安门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广大革命群众的地方，是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向往中心。为了保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绝对安全，向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负责，我们意见，要下定决心，采取治本办法。”

早在1952年，就有技术人员就天安门城楼的损毁情况提议大修。1956年市道路工程局草拟书面报告，反映“天安门木结构早已变形严重”，要求全面修缮。1957年后北京市即以“天安门城楼安全检查组”名义，多次以口头或书面报告要求翻修天安门，但高层屡屡没有明确回复，以致1968年有人愤愤不平地表态：

那些在中央和地方的走资派，宁可花钱修庙宇（如智化寺等）及其他城门楼（如前门、端门、午门），就是不顾天安门安全问题的重要，不予翻修。现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了，面对天安门当前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我们的心情更是抑制不住了。为此，我们再次建议翻修天安门。（见1968年3月24日天安门城楼安全检查小组《关于天安门城楼木结构构架安全检查报告》）

1968年3月初北京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为了保证当年五一节天安门城楼的建筑安全，特意召集市建委、房管局、房修一公司、房修二公司、建工局建筑一公司、规划局、建筑设计院等单位负责人专题研究，会上决定调集技术干部、老工人14人组成检查小组，于3月11日至23日对城楼的主要承重构架进行全面检查。行前所有工



重建前后的天安门城楼

作人员都表达了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忠心，宣誓要进行解放以来最认真、最详细的一次大检查。

检查人员在城楼内部近半个月攀爬查验，发现木结构的恶劣程度大大超过预先的想象。大厅内金柱已有两根糟朽，其中一根柱心通朽，另一根朽空过半，1963年时曾经林业研究所化验，已认定情况比较严重。八根五架梁，是承受屋顶荷重最大的梁，已有六根断裂；其上三架梁，也有一根断裂；十六根双步梁，通裂八根，有的梁头已被压酥，有的梁头或梁身糟朽。八根角梁，也有七根脚丫子榫出位。令人没想到的是，作为皇家门面城楼，当年建造时偷工减料，竟使用了不少诸如杨木之类的劣等木材。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时，大都会在这些木梁构建的大厅里休息、与人交谈，糟朽的大金柱已经直接威胁毛的人身安全。

检查人员还发现，所有的檩、枋绝大部分脱榫，有的榫头被切断，有的歪闪出位，有的跨间下垂或糟朽、断裂。四周二十四根承檐枋及两山采

步金,普遍外扭,一般都扭出十公分左右。屋面四角及明间屋檐亦显著下垂,普遍达十多公分。东西两山草架柱和踏脚木,普遍外张,尤以西山最大,达十九公分。

经过几次会商,检查小组酌量再三,最后给出的结论是:“城楼结构本身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合理和用材不当,加之,三百多年来历史上曾多次遭受较强烈地震的冲击,在屋面渗漏,长期缺乏维护和长期失修的情况下,整个木构架的变形越来越大,梁、柱等脱榫、走闪、弯垂、断折、糟朽等情况越趋严重。”(见1968年4月1日《市革命委员会工交城建组致吴德同志并报谢副总理》)

这实际上已把天安门城楼定为严重危楼了,只不过用语上略显委婉、内敛,没把话说得过于震惊、骇人。

## 二

从保存下来的《天安门屋顶结构平面上架检查示意图》中可以看到,平面图上大都密集标有“枋下垂榫裂”、“枋朽”、“枋裂”、“枋出榫”等字样,足以令审阅者惊慌不已。在另外一件名为《天安门关键结构危险情况示意图》中,明确标出了斗拱、礅斗、童柱、角梁等破坏性图示,并给领导加以简易的专业说明:“斗拱压扁压酥上面所有的力量通过很小的斗拱传给柱子。”“下面合力大于上面的合力所以破坏。”

最有政治意味的是,这些示意图的上方都印有毛泽东一条较不为人知的语录:“不要等问题成了堆,闹出许多乱子,然后才去解决。领导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后面。”像“不要等问题成了堆”、“闹出许多乱子”这样有特殊意味的句子,对各级负责的官员是颇有警示、提醒作用的。

约有十几张城楼现场拍摄的图片被送到高层,其中一张据说是遭到当年八国联军炮击、在西采步金柱上留有20公分炮弹洞的照片最引人注目,可以明显看到扭动和断裂的情况。其他照片都标有诸如“三架梁断朽”、“明间爬梁下垂13公分”、“承重结点脱榫断榫酥裂”等文字说明。在这组照片中,工程技术人员在梁柱上用粉笔手写的“朽”、“脱榫”、“酥朽”字样也格外醒目,较为

严重的局部区域甚至都被保护性的铁片架层层包住,完全看不清内部的状况。

从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杜春永1968年3月24日在一份文件上钢笔批示来看,在送上报告和照片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已口头答应翻修了。但高层之间在探讨是否使用年限2000年?这样投资是否太多,费料过多?高层负责人士只能笼统地提出,还应该本着“好、快、省”原则来办事。

为了保证1968年五一节和国庆节的安全使用,天安门城楼安全检查小组提出几项技术上可行的应急措施,比如,明间朽空过半的大柱,在其南北两面各附一根10米长的大型槽钢,直顶大梁下皮,防止柱身及屋架坍塌;西山通朽的大柱已有下塌迹象,将山墙拆开一段,南北两侧各抱一根附柱,以防大额枋及簷头下塌;对断裂的七根大梁(即五架梁)及一根梁,分别加柱子顶住;明间顶棚内,两根爬梁下垂十多公分,已超过允许垂度,分别用两块大夹板予以加固;所有的断榫,或出位较大的梁和檩、枋,一律给予支顶或拉结,等等。但是,检查小组坦率地表示,这些技术手段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不发生较大地震情况下,仅能暂时维持现状。一旦遇到较大地震,那就难测安全了。

据此,北京市委、市革委会1968年5月15日向周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报送了《关于翻修天安门城楼的请示报告》,同时抄报了国家计委和建委。请示报告明确了“拟采用木结构进行翻修”的方案,并称:“根据北京市建筑队伍的技术水平和施工力量,是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原稿中有一句这样的话:“这是有根据、有经验、有把握的。”市委某位领导人为稳妥起见,发文前用铅笔删去这句话。报告送上后,在周恩来尚未正式批示前,李富春首先提出“确保安全抓紧施工准备工作”的意见,北京市接报后立即开始翻修筹建工作。

## 三

出于焦虑和担待,北京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提出马上进行材料和技术的准备,在1968年国庆节后立即开工,在第二年五一节前挂完瓦,拆除外面的施工架子,在国庆20年大庆前(即1969年10月)全部竣工。市委上报的请示报告也是据此提出施工计划设想,里面写有“国庆节后立

即动工,挑顶拆架,拆除旧门楼和清理场地;在今年十一月到明年四月,苦背挂瓦;明年五月至九月,做好内部及两山后簷的油漆彩画”的详细步骤。从后来的实践效果来看,限制于诸多技术条件,当年根本不可能顺利开工翻建,这完全是不顾实情、盲目应答的一厢情愿之事。

天安门城楼安全检查小组当即提出了三种天安门翻修方案,检查组全体人员明确表示集体倾向于第一种方案,于是这个方案自然就倾注不少论证的文墨。这个改良性的木结构方案可概括为:“保持原有古建体形,对原有建造不合理的地方,全部使用一等木材和干材进行彻底翻修”。具体策划为,将屋顶挑开后,对所有脱榫、走闪的大木,如梁和檩、枋的脱榫,柱和梁的歪闪等一一给予拨正;对所有断裂、糟朽、压酥、压扁的大木的斗拱全部更换。

检查组专家举证说,木结构比钢筋混凝土、钢结构的优点多,木结构建筑如蓟县独乐寺(九百多年历史)、文化宫太庙(五百多年历史)至今仍然坚固安全,完整无缺。专家们称,此方案的优点是耐久,耐震,工期短,花钱少,局部出问题,容易加固或局部翻修。缺点只有一条,防火性能差。

鉴于北京基本地震裂度为八级,专家小组认为新修的天安门城楼抗震应按九级考虑,为此详细铺陈一系列的抗震措施,比如取消围金柱的柱头斗拱,加固梁柱结合,使之形成抗震框架;上部结构童柱间加支撑,瓜柱加叉手加强稳定性;加长角檩椽与角梁形成三角桁架,防止滑动,防止扭曲变形;适当加大明间檩子、五架梁和端部挑尖梁的断面尺寸,并采取组合梁形式;明间单额枋改用钢梁(外包木枋);改善局部应力过大的现象。如斗拱加大坐斗面积,加大上层簷斗拱尺寸,榫接加大榫头断面,对承受剪力特大的雀替改作钢牛腿等等。

专家们还共同确定了一条合理选用树种的原则,就是要坚决废弃劣质木材,在承载应力较大的部位,使用柚木、楠木、黄柏等坚硬树种,像柱、梁枋等主要受力构件,一定要使用物理力学性能较好的树种,需进口木料色皮、满桑尼亚、卡壳洛达等,而像扶脊木、檩则可使用变形小重量轻的杉园木。(见1968年3月24日天安门城楼安全检查小组《关于天安门城楼木结构构架安全检查报告》)

请示报告中对第二、三种方案只是简要介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绍,这两种方案都是要大体保持天安门原有体形,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重建,只不过第二种方案是在保留红墙座不动的条件下拆掉现有门楼,由于混凝土重量大,需在红墙座上截做个满堂红的钢筋混凝土加固层。而第三种方案就是彻底将现有门楼及红墙座拆掉,全部采取钢筋混凝土结构旧地重建,是完全意义的新建筑物。两种方案的缺点均是“工期长,花钱多,费模板”,但让领导动心的是,在第三种方案中可以在重建城楼红墙座中预设人防工程,这对于未来保障毛泽东的安全又是至关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

高层主政者最后采用的就是第三种方案,干脆利落。

#### 四

1968年8月2日,北京市革委会计划组、工交城建组正式向国家计委、国家建委递交《关于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列入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的报告》,内中称:“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面铺开,为了按期施工,保证六九年‘五一’、‘十一’节的使用,请将天安门城楼修建工程,作为中央项目列入国家计划,并作为国务院重点工程,由国家建委直接掌握。”8月20日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军管会批复同意作为重点项目列入计划,复函大多是老套、虚饰的政治性文字,诸如有“怀着无比深厚阶级感情”、“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但有两句话最为深重:“天安门城楼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检阅无产阶级革命大军

的庄严场所。因此,建筑结构必须确保安全,翻修工程必须按期完成。”

设计者在早期参与设计时,首先想到的是城楼上领袖人物们使用方便的问题,如要利用现有人防设施,增设备用电梯一座(原有电梯一次只能容纳三个人);在西端休息室增设了卫生间,适当增加城台上的厕所,将西配房后的厕所改作永久性的;在城楼上要建五个休息室、三个服务室。最引人注目的是,考虑到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时,要从城楼前廊下三步台阶才能走到正中的检阅位置,就准备将前廊台明地面坡度适当加大,同时把廊前城台地面适当提高,使这三步台阶变为一步台阶。后来觉得留下这一步台阶也不便,干脆建议前廊台明向前推至女儿墙的扶手处,取消台阶,栏板移至扶手位置,不顾及后排人能否观礼。(见1968年2月18日市建委革命领导小组天安门检查组《关于天安门城楼翻建设计方案的报告》)

专家小组测算天安门翻建需要琉璃瓦十多万件,四十六种规格,烧制需时七个月。为了保证预定的转年五一节扣上瓦顶,天安门检查小组已在1968年5月31日与门头沟琉璃瓦厂订了生产协议,除四吨半纯铅由国家建委供应外,还有劈柴550吨、大同块煤500吨、一等红松规格料四立米半,白布200市尺,需由市里解决,尤其白布和红松是作模具用的,急于使用,希望能在一周内及时提供。(见1968年6月3日天安门检查小组《关于天安门琉璃瓦制作需要材料的报告》)但到了8月,由于“文革”运动的影响,琉璃瓦厂两派群众组织尚未联合,相争剧烈,导致琉璃瓦件的生产受阻。经过多次呼吁,门头沟区总算派了一支军宣队进驻督促,但由于队员多是一般战士,又不断调换,生产问题仍得不到有效解决。(见1968年8月12日天安门检查组《天安门城楼翻修准备工作情况汇报》)涉及天安门翻建,基层单位派别组织可以不顾其重要性,照样纷争不止,市革委会直接出面调解效果也不佳,可见出“文革”造成的部分失控和政府部门执行的无奈。需指出的是,这两份有关琉璃瓦的报告,均以“天安门检查小组”的名义上报,但前一份盖的是“天安门管理处”代章,后一份却是“市建设委员会革命领导小组”代章,由此看出申报、经手单位的级别正在不断调高,到了最后阶段不少报告都以“市委、市革委会”联合署名。

技术上的准备还算顺利,翻修任务确定由市房

管局古建队施工,结构、建筑改进设计方案于1968年7月下旬报市革命委员会审批,整个天安门各部尺寸的实测工作已于7月底结束,水暖、电气、摄影、广播、电话等设备的设计工作,确定由广播局、供电局、新华社、新影、电话39局等单位自行设计,并组成综合设计组解决各专业间的矛盾。

由于以往天安门城楼照明灯具条件差,光亮度不足,致使电影、电视拍摄时只能拍近景,不能反映毛主席接见革命群众、外宾的全景。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提出,为了在电影、电视中表现出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要适当增加碘钨灯,电气回路增加至12个,容量增加近4千瓦。天安门城楼长期未建有功能齐全的播音设施,每逢重大节日实况录音带都要运至广播大厦延迟播放,由于距离远,交通不便,影响播音的及时。因此广播局也希望,现有广播机房向西扩建两间或向南伸展2米,作为播音室和电视设施、电缆充气之用。

天安门城台前檐女儿墙距检阅扶手仅有50公分,摄影记者在此空当进行拍照,由于距离太近,拍摄领袖人物的照片比例不合适。同时空间窄狭,记者转身行走很困难。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图像完美,拟将50公分厚的女儿墙减为30公分,以增大女儿墙与扶手间的宽度,改善摄影条件。

还有人提出,当毛主席由城楼走向前廊城台时,由于通往城台的台阶窄小,两墙栏板又高,记者不能从两侧拍照,都挤堵在正面,影响主席和广场革命群众间的视线。因此建议拟将靠台阶两端栏板的长度适当改小,台阶内移20公分。(见1968年9月20日天安门翻修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天安门城楼翻修中各项设施设计方案的报告》)

天安门城楼正脊两端的制高点,上面有龙兽等属于“四旧”的雕饰。这时候高层已排除了“工农兵”、“万年青”、“井冈山”等预备图形,明确定为“延安”图案。

这个方案的敲定是一个处处为最高领袖着想、竭力周全的漫长过程,在当时的条件下技术人员凭据己力已达到近乎完美的地步。譬如毛泽东常用的休息室,原来安装日光灯,就因为担心日光灯容易发生毛病,届时影响毛泽东的安全和使用,技术人员衡量再三,决定采用更稳妥的小花灯。原来大厅内纵横交错的明设电线全部改为暗装,易渗水结冻的水暖管道变成暗沟,电热开水炉由后廊移到槛

墙内……这些不起眼的小措施都是从根子上消除不安全的隐患,显现当时人们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唯恐闪失的紧张心态。

## 五

1968年8月上旬,检查组已大致确定天安门翻修工程需土建各工种工人四百多人,加上各项设备施工,高峰时工人约有五百多人。房管局准备了进场施工人员的名单,上报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审批。(见1968年8月12日《天安门城楼翻修准备工作情况汇报》)

8月20日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确定了参加天安门工程审查小组人选,主要负责所有施工人员的政审。市里强调,天安门是具有伟大世界政治意义的建筑物,必须确保此项翻建工程绝对安全和保密。参与人员必须是本人历史清楚,没有较大的政治历史问题,个别有一般历史问题,但已查清并作了结论的专业人员可以放宽参加。经查本人确实没有反动言行,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中没有被杀、关、管分子,没有海外关系和反动嫌疑分子。(见1968年8月20日天安门工程人员审查小组《关于天安门城楼翻建工程人员审查条件的报告》)原稿中尚有“阶级斗争觉悟较高,有较好的集体观念,有较高的革命警惕性,政治责任心好,无自由主义表现”的典型性字句,这些标准化言辞被市领导删除,并用电话告诉审查小组:“这几个条件内部掌握,不批文字,不公布。”

房管局革委会领导在行文中一直持谨慎、惶恐的态度,连续几个文件的第一段话就时常使用这样句式:“这次翻建工程是直接关系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安全的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必须有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以确保施工的顺利进行。”房管局请求北京卫戍区最少也要抽调四名解放军同志担任政治思想方面的领导骨干,施工队伍准备按部队建制,组成一个营,下设三个连。(见1968年8月26日《市房地产管理局革命领导小组致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

8月27日工交城建组即向市委领导谢富治、吴德报送《关于组织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领导机构的报告》,以“加强政治思想和施工中的绝对安全”为由,建议对天安门工地实行军管。吴

德在报告上方用铅笔写道:“如经批准翻修,首先应把领导小组和工程指挥部建立起来,以便着手工作,此事请富治同志阅批。”谢富治铅笔大字批示:“必要时讨论一次。”

未等谢富治他们讨论,房管局革命领导小组两天后又匆忙地向上报告说,当前的壮工大多数是预约工,都没有人事档案,不便政治审查。经过暗中安排,左挑右看,从现有180名壮工中只能凭以往的政治经验挑选出稍微可靠的60来人,剩下的120人不敢贸然使用,因为谁也无法保证这120人会不会出事。他们紧急请求领导派出解放军工兵一连,参加天安门工地的施工,一方面既解决壮工的不足,另一方面增强保卫力量,也有利于工程的安全。(见1968年8月29日《关于请求解放军工兵支援天安门城楼翻修的报告》)

不到一周时间,房管局又以“天安门城楼翻修技术小组”名义,再次提出工人档案比较简单,有的还没档案,政治审查十分困难,为保证天安门的绝对安全,要求调派解放军一至二连战士加入工人队伍,参与施工,防止坏人破坏。(见1968年9月6日《关于天安门城楼翻修准备情况的报告》)

面临无法预测的政治危险,房管局革委会领导慌乱中自有主意,不嫌麻烦,十天内四次上报,坚持提出调派军人渗入施工队伍,其心思的缜密与稳妥可见一斑。

## 六

城楼翻修所需的梁、枋、檩等木材于1968年7月中旬由上海陆续运至北京,天安门安全检查小组已迅速添置特殊设备,准备8月10日开锯加工大木。新设立的施工组要求木料全部要求为一等材,部分特等木材需楠木、柏木,且为干料。他们估算木材需1650立方米,全部翻修投资为125万元。(见1968年4月22日天安门城楼安全检查小组《天安门城楼木结构翻修概算主要指标及施工计划设想》)过了不到一个月,在市革委会致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的正式请示报告中,木材需要量已升至2000立方米,投资增加到150万。(见1968年5月15日《关于翻修天安门城楼的请示报告》)

木构件用材的干燥问题开始显现出来,从加纳进口的木材尤其显著。加纳木材含水率高达

百分之四十,湿度大,易劈裂、变形、闷腐,影响胶结,虽然在技术上可以采取加速脱水,但处理周期长,缺乏实践经验,不能绝对保证质量。

施工组曾提出,阜成门和安定门两个城楼已决定拆除,应及时安排力量,从旧城楼中搜集好料重新利用。但领导方面也预想两城楼已是破旧不堪,估计也难于找出整块上好木料。

1968年9月底、10月初,临近做出施工决定的关键时刻,因国内找不到合适的特大规格木料,国外当年进口无望,整个指挥部陷入困境之中,焦虑万分。在9月22日天安门翻修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天安门城楼翻修的紧急报告》手写稿上,市工交城建组杜春永担忧地写道:“时间的确很紧。如抓紧还可施工,如再抓不紧,只好推迟到20大庆以后干了。”直接负责人杨寿山用毛笔批:“问题是材料准备如何是关键问题,如大木头烘干等问题。”

有人提出能否拆用长陵大殿的柱子,因为在明十三陵建制中长陵规模最大,柱子长度适宜。于是一队人马快速前往查看,大家发觉大殿建筑庞大,拆殿会得不偿失。也许使用皇家阴宅的旧物,也会给主事者落下心理的阴影。这样一犹豫,也使长陵大殿逃脱一次毁灭的厄运。

做出推迟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的决定是在10月11日,促使这样决定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十三根高12米、直径大头93公分、直径小头84公分的立柱,本来还寄希望外贸部与国外的联系通道,但此刻外贸部已回复今年不能解决,这就彻底断绝了1968年开工翻建的期待,让中央高层颇感无奈。市革委会致周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的专题报告中,建议将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推迟到1969年国庆节以后,对于1969年五一、十一两大节日的使用,可采取临时加固措施以保证安全。(见1968年10月11日《关于推迟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的报告》)吴德在修改报告时酌定再三,最后力求言语简洁,删去了原稿中“(推迟)比较有利,这样可以充分的做好准备工作,使用干燥木材,在翻修进度和工程质量上都有可靠的保证”这样解释性的句子。

吴德在报告中刻意想突出的主要一点是:“(推迟一年)这样可以充分作好各项准备工作,承重柱子也有条件选用整料,木构件可以作到基本干燥,在结构安全上会得到更可靠的保证。”中

央高层领导接报后,只能同意翻修工程延至转年国庆节后开工,并做了如下几句指示:“准备工作不能削弱,而是要调整加强,以便充分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确保质量和工期。”这多多少少带有一点批评和恼怒的意味,北京市革委会不得不加大了执行的力度,也有了一些自我检讨的意味:“应提前作出有关建筑方案,以便对一些特殊要求、特殊规格的材料及早着手准备,避免临时造成被动。”(见1968年11月19日天安门翻修工程指挥部办公室致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关于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准备工作计划的报告》)

从1968年5月开始翻修筹备,截至10月份,在材料、加工订货、运输等工程费用已支付97万元,主要为55万元的木材、18万元的琉璃瓦制品、9万元的木材加工、9万元的铁活加工、3万元的运输等等,都由北京市财政局暂时垫付。很快,财政部军管会致市革委会财贸组,通知说,增加北京市1968年基本建设预算97.7万元。由此,天安门翻修预付款由中央财政解决。

## 七

1969年国庆节后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如期展开,10月下旬搭好脚手架木,11月下旬旧城楼拆完,1970年1月中旬做完大木安装,3月中旬扣上瓦顶及有关设施、油漆彩画,3月底以前落架清理。

整个工程没有什么很大的技术难题,只是为了解决冬季施工的不便,建设者们搭建一个宏大的暖棚,把整个城楼围得严实,临时建造锅炉取暖。所有建设者口风极严,没有丝毫外露消息。外面来往群众看不到里面施工的任何情形,只是在1970年五一节后突然见到焕然一新、金碧辉煌的城楼,欣喜万分,流连忘返,哪能想到它已是一个功能先进、装备现代的全新建筑。

只是在十多年前一则公开报道中有意无意披露其中拆除翻建的建设秘密,惊奇的读者们才能对天安门城楼“刮目相看”。此时离建设时期已相隔三十多年,当年“文革”的语境、氛围随风荡去,当事人想完整叙述情景也变得不易,只有暗黄的档案旧纸留存着历史现场的点滴信息。■

(作者为《北京青年报》编辑)

(责任编辑 黄 钟)

# 贵州“文革”触及“贵州事件”

○ 邓振新

## “贵州事件”的发生和发现

由于“大跃进”造成了大饥荒，贵州省农村发生饿死大量农民的严重事件，被称为“贵州事件”。

1960年2月6日，贵州省副省长、老红军吴实到当时在建的川黔铁路沿线慰问修路民工，到息烽县就发现饿死人现象。次日，在遵义地区副专员何林陪同下，吴实到遵义县的板桥、泗渡后，发现一个大队死了六七十人，有的全家躺在床上不能动。到桐梓县后，又发现类似现象，意识到事件是全省性的、带普遍性的。他在桐梓县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吴实同志骂开了：“先不要说党的原则，你们多少有点良心没有？人都饿死了，你们还不安排生活，还在反瞒产。”各县根据吴实同志的指示，先后开仓发粮，停止了事态的发展。吴实打电话向省委第一书记周林汇报，何林也挂电话给地委书记李苏波。因周林在息烽温泉疗养院养病，遵义派人去那里向正在打牌的周林汇报，汇报的人都等得不耐烦了，周林还说要打完这一圈后再说。听过吴实电话汇报以后，周说：“血淋淋的事，还提它干什么。”

## 贵工师生针对“贵州事件”兴师问罪

贵州工学院机械系65级学生张再兴，贵州省湄潭县人。“湄潭事件”发生时，他还是个中学生，父母亲和侄儿都被活活饿死。他们村民组（当时叫生产队）总人口75人，死亡近半，其中死绝两家。他家所在的村（当时的大队），穆和清家老小五六个，饿死后埋在一个堆肥坑里，杨银清家四口饿死后，抛在猪圈粪水池内。那时，沟死沟埋、路死路掩随处可见，因为活着的人也没有力气挖坑埋死人了。

在“文革”初期，1966年12月15日前后，张再兴率先在贵阳市大十字中山西路路口南侧一堵山墙上，针对“贵州事件”贴出街头大字报，列举他家所在的村民组饿死人的数据和名单，认为省委第一书记周林等是贵州饿死人的罪魁祸首，必须把这些走资派揪出来，为贵州数以百万计的饥魂亡灵申冤。看这张大字报的人很多。

这张大字报也张贴在贵州工学院校园内一份。工学院半数以上学生来自农村，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在广大师生中很快引起共鸣，冶金系教师童志权、学生袁昌新、李永复和其他许多师生积极拥护。于是诞生了“遵义事件调查团”，由张再兴任团长，童志权、李永复、袁昌新任副团长。调查团的活动宗旨是“弄清事件真相，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揪出‘事件’责任人以谢贵州1700万人民，挽回党和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调查团铅印了《告全省人民书》，历数了周林、苗春亭不执行毛主席1959年4月29日《党内通信》六条，搞高估产、高指标、高征购、反“瞒产”、“捉鬼拿粮”、征购农民的过头粮和兴办农村公共食堂，造成全省饿死大量农民的罪行。

“遵义事件调查团”所到之处，民众欢迎，各级文革领导小组及相关单位也大力支持。“遵义事件”的调查工作进展顺利。当时觉得“调查团”这个名称还不够“火药味”，又改名称为“贵州事件造反团”。

## 省地县当事人积极“说清楚”

在饿死人的“五九事件”中，李苏波是遵义地委书记、行署专员。调查团一开始就拿他是问。当时遵义地区共360余万人，死亡60万人左右，是贵州省的重灾区之一，因此认为他的罪恶最大。故要他先来谈“遵义事件”的情况。“文革”时李苏波任贵州省水电厅厅长，听说要他谈“遵义



张再兴编撰的《“贵州事件”资料集》封面

事件”，他二话没说，就坐吉普车跟调查团到了工学院。1966年12月19日晚上7点，贵州工学院一两百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念了毛主席语录之后，李苏波就“遵义事件”的情况作了一个小时的详尽介绍。为调查团留下了《“遵义事件”访谈录》第一份资料。后来，李苏波又亲笔写过一次稿，与记录稿相互补充印证。

何林在“五九事件”中是遵义行署副专员，1966年12月24日，何林第二位被调查团请到贵州工学院阶梯教室“说清楚”。同李苏波一样，他说的更多、更为详尽、更具条理性。这份访谈录是所有的《“遵义事件”访谈录》中最具价值的文章。以后，何林还先后三次给调查团提供了亲笔资料。

第三位是苗春亭。苗春亭在1959年时任副省长，实质上的二把手。“文化大革命”时，他还在这个位置上。对于调查“贵州事件”，省财办主任李庭桂特别支持。由他牵线，1967年1月1日，张再兴到花溪碧云窝宾馆找到了苗春亭。次日早餐后，有一辆伏尔加小轿车进城，顺便把苗、张二人带到太慈桥。下车后，从太慈桥到工学院还有4公里泥石混筑的乡村马路，又不通公共汽

车，但苗愿意步行，他人矮、腿短，走起来很吃力。走到一半处，就有探矿机械厂的“红卫军”正打着造反旗帜迎面走来，高呼着“打倒贾启允、活捉苗春亭”的口号。好在他们并不认识苗春亭，也就擦肩而过，就这样到了工学院“说清楚”。这就有了苗春亭为调查团留下的一篇《“遵义事件”访谈录》。这以后，1967年6月27日，苗又一次来到工学院，再次谈起了“遵义事件”的情况。他说，发生这样的事，责任不完全在省里，还有更高层次的原因。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够胆大的了。

除上述三人外，被采访者还有：

第四位，张玉环，时任中共贵州省委常委，省农林办公室主任，“贵州事件”时任黔东南自治州党委第一书记，时间：1966年12月21日，地点：贵州省农林办公室。

第五位，李庭桂，时任贵州省财办主任。1959年被打成“常、夏、李反党集团”成员。时间：12月24日上午，地点：贵州工学院第二教学楼阶梯教室，参加者：“321111”尖刀兵团、红卫造反团、“九一五”红卫兵战斗团爆破筒战斗队等共20余人。

第六位，杨用信，时任贵州省监委副书记。时间：1967年元月3日21:30~23:30，地点：贵州省委一楼接待室，采访人：贵州工学院教师赵安国、陈昭琼、廖昌明。

第七位，叶谷霖，时任中共贵州省委委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贵州工学院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时间：1967年元月3日，地点：贵州工学院5902学生宿舍三楼5号，采访人：“遵义事件调查团”团员童志权、张再兴等十人。

第八位，谢兆生，时任贵州省粮食厅计统处长。时间：1967年元月7日，地点：省粮食厅计统处，采访人：赵安国、陈昭群、廖昌明、华国庆。

第九位，杨绍荣，时任贵州省供销社副主任，“遵义事件”时任遵义地委副书记。时间：1967年元月7日，地点：贵州省供销社二楼办公室。采访人：赵安国等四人。

第十位，鸣跃忠，时任贵州省人民银行行长，“遵义事件”时任遵义地委财贸部长。时间：1967年元月11日下午，地点：省人民银行办公室，采访人：赵安国等三人。

第十一位，欧阳元，时任贵州省人委秘书处

工作人员。时间：1967年元月13日下午，地点：省人委值班室，采访人：赵安国、华国庆。

第十二位，张一樵，时任贵阳市市长。时间：1967年6月29日，地点：贵州工学院学生宿舍5902-325室，采访人：矿业学院东方红、人民大学三红等3人，贵州工学院“九一五”等数人。

1967年1月5日左右，调查团分为金沙分团、湄潭分团、遵义分团及遵义总部，各赴其地。这些地方都是“五九事件”的重灾区。到这些地方去的目的就是向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宣传，饿死人的事件主要由周林、苗春亭、徐健生等人负责，不要记在党和毛主席的身上。这对挽救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对共产党的信任危机，确实是有作用的。当时，不少干部、群众为调查团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遵义分团还在三合公社逐家统计了死人的情况。

“遵义事件”调查团总部，由遵义市文革领导小组安排在丁字口遵义饭店215号等四五个房间，又给了一套广播喇叭，安放在丁字口百货大楼三楼，天天广播《“事件”真相》和《告全省人民书》。

1967年1月22日，原湄潭县委书记王卿臣，一大早就来到遵义饭店215房间。与调查团总部人员见面后，第一句话还未说完，他就哭了。他说，我亲自砍死了当汉奸的堂叔干革命，而到头来在我手上死了那么多人，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结果吗？当时，张再兴和何传训做记录，王卿臣的动情，也使他们眼泪汪汪。王卿臣说，来之前曾到过地委，地委不同意他同调查团见面。然而，他还是找上门来了，看来他是冒了点风险的，一定是心中有话要说而且是不吐不快，故而也就不顾风险了。

袁昌新率领的分团到金沙以后，去找1959年时在金沙任县委书记的赵广玉算账。赵这时候还在黔西农场。不想此举正合他的意。自“五九事件”发生以后，赵广玉受到开除党籍、判刑劳改的处分。他觉得处分他是应该的，但各账应各清。饿死人的事情是全省性的，省里一个人也没有处分，到底是谁的责任，在贵州省还是一笔糊涂账。旧省委以牺牲车马、保存将帅的手法，让下面的人全部把责任担了起来，而省委主要负责人一个也没有处理，逍遥法外，于理不公。因此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申诉。周林见他不听话，又是

打、又是诬，手法使尽了，赵广玉还是不听话，非要省委说个所以然、分清是非不可。1964年“四清”以后，周林到西南局任书记处书记，就没有人管他的事了。贾启允任省委第一书记后，又顾不上跟他扯这些，所以赵广玉是有话没处说，心情十分烦躁。“遵义事件调查团”的同学找到他以后，其实是为他安排了一次说话的机会，也就一吐为快。他先后两次写了10多万字的资料，又把1965年给党中央的《申诉信》也给了调查团。

1967年1月，原开阳县委办公室主任尹震环张贴“大字报”申述他在“贵州事件”中的遭遇。尹震环先后给中央写的两封信被转到省、市委以后，周林在省三千会上点他的名：“开阳有个办公室主任，来了没有？你胆子不小，写信到中央告市委！”贵阳市委夏页文书记说：“朱庚申、尹震环你们串通起来和市委作对，哼，我倒要看看你们是啥子了不起的人物。”真是如临大敌。尹震环等在省三千会期间被斗了一二十天。回开阳县后又被斗了一二十天，最后给戴上“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开除党籍，劳动锻炼。

尹震环给中央写信不仅为自己惹了麻烦，也给原开阳县委闯了大祸，也给区、社、队的干部都闯了祸。县委书记朱庚申因此调离开阳，开阳县委改组。全县被斗被处理的各级干部不下1000人。



张再兴

尹震环给中央写信虽然挨了整,但还是起到了好的作用,促成了干部们随后少犯错误,其结果是开阳县饿死人的情况不算很严重。

### 中央文革、省委和省文革先后打招呼叫停

“贵州事件”是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但在“文革”中过问这件事颇有干扰大方向之嫌,因斗争矛头对准的是“死老虎”,而不是正在走的“走资派”。人们后来发现,“文革”中为大大小小走资派罗织的罪名中,都不见有饿死人这条罪名。

因此,遵义市(现在的红花岗区)夺权,就没有让当时驻遵义的“贵州事件”调查团总部的代表参加,说他们是中间派组织。因为中央文革认为他们造反过头了。

中央文革对“贵州事件”调查团的活动非常关注,除了由中央文革办公室办事员打电话“打招呼”外,1966年12月25日,中共贵州省委给“贵州事件”调查团写信,叫“不要去翻作了结论的老案”。1967年元月19日下午2时在省长李立住地,贵州省文革小组组长李立又接见了“贵州事件”调查团联络员刘福一、廖昌明,当面“打招呼”,说是做了结论的历史,不要翻了。再翻就要犯错误了。1959年李立在河南洛阳任专员,他以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为例,说吴也是在出了这事后调离工作的。李立还希望“贵州事件”调查团能改个名字叫“农村文化革命造反团”。

上面一再打招呼之后,“贵州事件”调查团的工作随后也就终止了。

### 贵州饥魂亡灵有《墓碑》

针对“贵州事件”,贵工师生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做了大量调研工作,采访了数十位当事人,积累了大量原始资料,记录了人祸、黑暗和罪恶,由张再兴编撰,昆明陈安民先生印刷,形成了一本包括《“遵义事件”访谈录》在内的《贵州事件调查资料集》,51万字。这是凝固的记忆,可称之为贵州饥魂亡灵的《墓碑》。

《墓碑》是杨继绳先生写的一本书,其副题是

“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杨继绳2002年12月也到贵州省档案馆查过贵州“大跃进”大饥荒资料,并开列出一张30份资料的目录清单,拟带出但未获准许,他把这张单子也列入了《墓碑》书中。此书以“黑色的贵州”为题介绍了贵州。

### 花溪新建“601工程”的不解之谜

1964年贵阳市“四清”运动中,贵州大学组织学生就近参观了“四清”中停建的“601工程”,包括301宾馆(现花溪迎宾馆)、302别墅和万人大礼堂(现贵州省青少年活动中心)。这些项目的主体工程已完工,装饰工程已在进行中,302别墅小歌舞厅水磨石地坪伸缩缝中已嵌入铜条。没有谁告知学生们,这些坐落在风景秀丽的花溪的豪华建筑物是为谁而建的。当时花溪景区已经有了西舍宾馆和碧云窝宾馆,在饿饭之年为什么还要修这么豪华的楼堂馆所,同学们看后心中充满疑问。参观时有规定,不准照相,不准记录,不要议论,成为不解之谜。但放眼全国,看看下面这段文字,就知原来如此。

1962年,在北戴河为毛泽东专修了新的别墅,把原来的别墅让给江青专用了。几乎与此同时,在紧挨老人家故宅湖南省韶山的滴水洞,也修了一座客厅、卧室、办公室、运动室、防原子弹洞等应有尽有的别墅。此前此后,北京、上海、杭州、武汉、广州、南宁、成都、郑州、长沙、南昌、济南、大连、青岛、庐山等地,也都建有他的别墅;有的一地还不止一座别墅。在人烟稀少、经济落后的青海、新疆等地,也有人给他砌了别墅。昆明别墅的图样也设计好了,派专人送请他过目是否合适,他认为设计得很好,那又是个四季如春的美好所在,但海拔较高,不去,省下了一笔银两。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田家英奉命带了一些人去湖南农村调查人民公社的生产和“共产主义大食堂”等生活情况,首先看到了几乎与滴水洞别墅同时落成的省委宾馆大楼,十分惊讶,他避开省里的陪同者在调查组的同志们面前撇撇嘴悄声说:“也不看老百姓吃的是什么、住的是什么,共产党比国民党更爱享受了!”■

(作者为贵州省科学技术协会退休干部)

(责任编辑 黄 钟)

# 中苏团结旗号下的强迫失忆

○ 姜万里

—

1956年10月下旬,领导派我和另一名同志下基层检查工作。当时我从军队转业地方已经两年,工作单位在湖北省江陵县。和我同行的吴克武,比我大几岁,约二十七八,湖北当地人。我们去的单位在长江南岸的弥市镇,小镇坐落在长江支流虎渡河畔。

一天晚饭后,我二人到河边散步,边走边唠,天南地北。

解放初期的湖北农村,比较闭塞。当地人对我这个外来的东北汉一切都好奇,有些人时常问我:东北人是不是一生只洗三次澡?那里的人们传说东北人一生只有出生、结婚、死亡各洗一次澡。还问我:腊月小年是阴历二十三还是二十四?湖北当地小年是在阴历二十四,东北是二十三日。等等,问个没完没了。

唠着唠着,吴克武忽然问:“听说1945年苏联红军在东北有强奸妇女、抢劫财物的行为,是真的吗?”我脱口而出:“有啊!”

1945年我14岁,当年秋天苏联红军进入沈阳。我家住在沈阳方城大南门外、大南街中段药王庙附近,距张作霖大帅府二里多地。沿大南街有许多商铺,日本投降后,这里一时涌出很多游商摊贩。大约8月末、9月初,我们这里出现了许多苏联红军。

一天,就在我家附近的大南街我目睹一个苏联红军抢冥币。当时情景是:那年9月2日是农历七月十五,佛教的“盂兰盆节”,民间叫“鬼节”。这天佛庙要举行仪式,焚香礼拜,超度众生;民间百姓也家家烧冥币遥祭亡灵。接下来10月1日是农历中秋节,也有祭祀先人的。所以这期间满街到处有售卖冥品冥币的。

这天,从大南门方向走来一个苏联兵,走到我家附近的一个售卖冥品的小摊前,看见花花绿绿的冥币,以为是能流通的货币,上前抢了一捆就走,来到另一个售卖食品的小摊前拿了食品扔下几张冥币就要走。小贩不干,比比划划拒收。这个苏联兵眼睛一瞪,抡起转盘枪逼着小贩,吓得小贩再不敢吱声。许多中国老百姓背后咒骂、当笑话。

有的还从仓库里偷盗出各种物资叫卖,或跟中国老百姓换物。

一个苏联兵弄来一瓶海洛因,站在大南门附近要跟中国人交换贵重物品。有一个吸毒老头,拿了一块银壳怀表去换。那个苏联兵接过怀表揣起来,却不肯给海洛因。这老头不干,他就端起转盘枪,吓得老头只得认倒霉。

最招老百姓痛恨的是强奸妇女。一天,院里的大人们传说大东门附近一女子被从电车上拽走,又某处妇女被强奸,等等。我虽然没亲见,但满城惊慌,我们大院的各家妇女都不敢出门,互相转告往脸上抹锅底灰。

除了一些士兵单独或结伙施暴,当时苏军还有组织地拆卸日本遗留下来的工厂的机器设备,我们沈阳东关的兵工厂、飞机制造厂、铁西区的重工业厂等等,夜以继日地把机器拆下来,装火车运往苏联。这些事,我们沈阳的老百姓都气愤,说:“老毛子简直就是红胡子。”

后来,苏联部队上级开始管束,单独士兵的暴行才逐渐稳定。不过拆运机器设备的活动还继续了一段时间。

这些事,经吴克武一问,我就回想起来,大概地对他讲了。讲过之后我也就把此事抛在脑后。

谁知第二年兴起“反右派”运动,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列出识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其中第六条写明:“有利

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吴克武写大字报揭发我对他讲苏联红军恶行的事,这成了我右派罪状之一。其他还有“攻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丑化老干部”两条。

说我“诬蔑苏联红军”,我总也想不通。一是二人闲聊,而且是他发问,而非我主动散布,二是我所说都是事实,而非捏造。坏事不许说,说了事实就算诬蔑,是何道理?

## 二

22年后,我右派改正,走出监狱回归社会,接触了一些朋友,才发现:为了苏联红军在东北暴行这件事,还有很多蒙冤者。

一位姓栾,原是沈阳市政府车队的司机,鸣放期间他说了苏联红军暴行,被打成坏分子,投入劳动教养数年。

一位陈树祥,沈阳市无线电机厂技术员,当年22岁。鸣放初期他一直没发言,后来因为本单位一位同事讲了苏联红军抢劫和强奸妇女的事,批判者说他“破坏社会主义国际团结”,主持人说那些犯下暴行的分子是十月革命俘虏过来的白匪兵。而陈认为这是强词夺理,忍不住打抱不平,反驳主持人。

他对笔者说:1945年他家住在南塔村,此村距离大南门约五六华里,当年是个城郊村。1945年10月间,南塔村闯进来一名骑着洋马的苏联红军,这个老毛子兵挨户捋摸,最后闯进王升老两口的家,要强奸女主人。王升保护妻子,这个老毛子就抄起一个大洋酒瓶子把老头打死,继而侮辱老太太。老太太叽哇喊叫,惊动了四邻。村里有一家姓蔡,有九弟兄。大家闻声扒窗户往里看,见鬼子正在干坏事,蔡家兄弟就破门冲入,一顿棍棒把作恶的鬼子打死,解救了老太太,可是老头已无力回天。

大家怕苏联军队来找人,经商量,把鬼子尸体掩埋,洋马杀了分肉给各户。

那年陈10岁,也跟着看热闹。忽然回头看见埋着鬼子尸体的土堆还在拱动,就喊鬼子没死。大家就重新把鬼子彻底打死。

大家分得马肉,各回各家,这事也就平息。

1948年沈阳解放,建立了新政权。1952年搞“三反”运动,有人检举老蔡家几弟兄打死苏联兵这档事,政府就把蔡家兄弟抓起来,枪毙一名,另判管制几名。罪名是“杀死红军,破坏中苏团结”。这件事在当地村民中引起极大不满,大家议论:杀了我们的人、还要强奸女主人,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村民自发地惩办匪徒,是完全正义的。你若不整死他,他必然还要杀更多的咱们人。凡是有良心、有民族正义感的人,都不会答应。陈强调,那位同志说的是事实,不该说是右派。

他这一番发言,“反右”领导小组就说他帮助右派分子,帮助右派分子的人也就是右派,于是,一顶右派铁帽也扣到他头上。

另一位,艾新山,沈阳西北郊区下坎子村人,今年78岁。1952年进入沈阳某厂当工人。因讲了对苏联红军暴行,表示不满,而被判徒刑。

艾向笔者讲述了当年他在下坎子村所见,他说:

下坎子是一个小自然村,在沈阳市西北郊,有100多户人家。苏军到我们村,王××的妻子被苏军军官抓住,拽到砖厂空房内强奸,苏联士兵在外面站岗。高家12岁小女孩也被苏军强奸了。

距离下坎子村几里地外,在沈阳西北郊有一个日本军用仓库叫“581仓库”,日本投降,社会秩序大乱,有些人从581仓库抢军用品,如皮鞋、毛衣、被褥等物资扛回来卖,有时苏军也开汽车拉些军用物资来卖。我们村的徐树吉住在村东头,一天早晨,他怀揣着钱想买点便宜货,他来到村西头两棵柳树下守候。这时来了一个苏联兵,见着徐树吉就搜身,把他怀里揣的钱翻着了,徐树吉哪肯舍得,就往回夺,但钱还是被抢走了。他十分心疼,站在柳树下生闷气。不多时,那个苏联兵又找来一个苏联兵,先前那个兵用手指徐树吉,意思说就是他往回夺钱,不老实顺从。两个苏联兵走上前,抡起枪托搂头盖顶就砸徐树吉,把徐树吉打得惨叫声整个村子都听到。那年我10岁,那恐怖的哀嚎声吓得我心都要跳出来。全村子没有一人敢上前搭救的,连他家人也不敢。大约过了半小时渐渐没有声音了,村里人才敢出来,见两个大鼻子兵已扬长而去,围过去再看徐树吉,已被打得血肉模糊,早就死了。

沈阳北郊有一条从东向西横穿的运河,现在沈阳市的人管它叫北运河,那时都管它叫二道

沟,我们下坎子村人管它叫沙河沿,冬天枯水期河面结冰,人车为了抄近都从冰上走。1945年冬,远屯有一辆胶皮轱辘大车路过我们村附近的二道沟,老汉赶车,车上坐着老汉的姑娘。这时来了一个苏联军官,把姑娘强奸了,完事还要扒大车的胶皮轮胎。赶车的老汉连哭带诉:“把我们的姑娘给糟蹋了,还扒车轮胎,这车还能走吗?怎么回家啊?我们受了小日本14年的气,这又受老毛子的,连强奸姑娘带扒车带……”正好有两个中国警察路过,本来也不敢管,但听老汉的一番哭诉,其中一个叫徐敬一的警察激起义愤,就豁出去了,照那苏联军官腿上就打了一枪。这个苏联军官挨了枪,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嚣张气焰立刻没了,坐在地上,双手举过头顶,不住地拍巴掌。另一个警察张玉清说:“你那能耐哪去了?真是太可恨了!”说着又给补了一枪,这也是他罪有应得,大快人心。可是,解放后1952年,把徐敬一、张玉清二人揪出来,五花大绑,拉到我们村外的大台上,跪着,脖颈上挂着写有“杀人犯”三字的大牌子,批判斗争,这两人以后再也没回来。

现居住沈阳的董洪志先生,1930年生,1945年他居住在当时的北陵区保合堡,小地名叫“五十一间房”的一间(今沈阳市皇姑区长江南街1号一带)。这是土房贫民聚居区。8月底苏联红军进入沈阳,他亲眼目睹两名(约二十五六岁)苏联红军强奸一位中国妇女。他们捉住这名妇女拖入一间土房,一人持轮盘枪把门,另一人实施强奸。先是听着那妇女尖声号叫,渐渐就没声了。过一阵,屋内的兵出来,再换守门的兵进去。他说,当时到处妇女都吓得用锅底灰抹黑脸。他家的土房正对着从沈阳开往北去的铁路,目睹每天有火车载运拆下来的机器设备,由苏军士兵押解,经过他家开往北方。

另一位历史见证人,某先生,今年80岁,上世纪50年代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

做过共青团干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夫人是同校同学,也是共产党员。1957年因他讲了1945年苏军的暴行,被开除党籍,他的夫人也受到牵连。这位先生的老伴至今心有余悸,一经提起这段遭冤屈的历史,就坚决不准老先生再公开说,怕因自己重提这段犯忌讳的历史事实而给儿女带来麻烦,因为其子女都是国家公务员、共产党员。

最典型、知名的是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的龙云。龙云因为质疑苏联红军1945年在东北拆运机器设备、在抗美援朝战争后向我国催逼军火款项等不义行为,就被加上“反苏”罪名,扣上右派帽子。

当年“反右派”运动中有许多人因说了苏军的暴行而被陷入“阳谋”之网,但我们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因此蒙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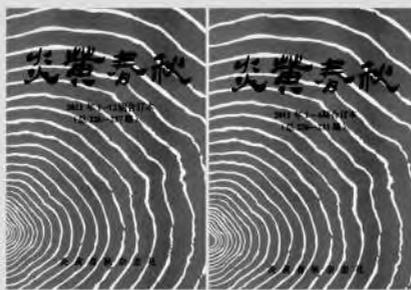
### 三

面对整个民族一代人目睹、亲历的事实,却封杀见证人的嘴巴,使给整个民族造成耻辱和伤痛的事实随着历史见证人的消亡而抹杀,这是对整个民族实行的强迫失忆。■

(作者为离休干部,曾任原第四野战军《后勤》报见习编辑)

(责任编辑 黄 钟)

## 炎黄春秋2011年合订本



### 欢迎订阅

简装一册本 110元  
简装上下两册本 120元

本社发行部是《炎黄春秋》杂志合订本惟一正式发行渠道

合订本邮购免收邮费,订购者请通过邮局直接将款项邮寄本刊发行部。

务必在汇款单上填写清楚收件人详细地址、姓名、邮编、要求以及联系电话。

2009年、2010年合订本(均为上下两册,每年105元)存量稀少,如需要,请直接汇款购买。

# 斯大林为何在党内大开杀戒

○ 马龙闪

在从古至今的世界历史上,像斯大林这样的当权者,将刀剑指向统治集团内部,大开杀戒,实属罕见。他不仅对执政党大加清洗,清除掉全体中央委员的64%,十七大代表的56%,还在战云密布的年代除掉了5位元帅当中的3位,90%的集团军将领,总计80名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中的75位,造成统治集团上层的自残和瘫痪,实际上在战争临近时刻让自己的军队变成一条无首巨龙。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导致苏德战争初期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斯大林为什么剑指上层,造成统治集团自残如此?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制,是何种指导思想造成的?笔者以为,斯大林当权后,在一连串的党内斗争中,在持续不断的清党运动,包括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和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的大清洗中,之所以造成执政党和统治集团的自残,是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深刻的思想理论原因的:这既有俄罗斯民族宗教传统中的因素,也有俄国解放运动传统中的因素;既有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庸俗化的歪曲,又有对斯大林个人、对党本身的神化;既是斯大林个人权力体制极权化过程的结果,也是专制主义的权力观在作祟并发挥作用。

## 1. 浓厚的宗教思想和教派厮杀的传统

俄罗斯自公元10世纪接受洗礼后,经过东正教的千年传播,俄罗斯人的宗教思想相当浓厚,可以说东正教作为一种信仰已经深深地融进了俄罗斯人的血液中,渗透到了他们的灵魂里。而教会分裂,长期的教派斗争、新旧教派的对立、厮杀、互不相容,又在人们头脑中潜移默化,长久地扎根于人们的历史意识,形成了教派的不宽容性。

东正教新旧两派的分裂,源于17世纪中期尼康牧首的宗教改革。尼康邀请希腊和基辅的一些

神职人员前来莫斯科,推行东正教的礼仪改革。他实行用三个手指划十字,以取代自百章公会以来用两个手指划十字的做法;还采取在教堂按顺时针行走以代替原来的逆时针行走;祈祷时祭坛上不再按以前的式样摆7块圣饼,而改变为摆5块。还有其他一些关涉细枝末节的礼仪改革。因为这些方面的分歧,分成新旧两个教派。由于信徒们对教义、教条的恪守极其严格,把这些礼仪上的坚持看做是对东正教信仰忠诚与否的问题,这样就产生了尖锐的对立和斗争,一直发展到新教派在政权当局的支持下,对旧教派进行残酷迫害,甚至施行大规模驱赶,把他们赶往荒野、森林,驱往草原,采取了赶尽杀绝的方针,手段极其残忍。这种教派的对立、恶斗和厮杀,源自教派双方对宗教礼仪和教义的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无论教条、教义和礼仪上的什么规则,只要一经形成,变为成规,就以极端偏执的态度固守之。这样,就形成了新旧两派的残杀和恶斗。

这种教派斗争的传统,对俄罗斯民族影响至深,不仅深入到各阶层信众的意识中,甚至也影响到以改造俄罗斯为己任的俄国革命者的队伍中,渗透到整个俄国解放运动中。

## 2. 俄国解放运动的各派也毫无宽容性

宗教情绪在俄罗斯底层民众中更为浓重一些,东正教文化深深渗透在俄罗斯思想的传统中。俄国解放运动中的民粹主义,从其思想渊源和产生过程来看,它同根植在东正教传统和俄罗斯国粹中的斯拉夫派,关系更为密切,这就使它把俄罗斯教派文化、教派恶斗的传统,相当多地继承了下来。

俄国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一登上政治舞台,其激进的一翼就表现出了一种激进主义的偏执和不惜流血好斗的狂热性。这在一篇取名《青年俄罗斯》的传单中充分表露了出来。这个“青年俄罗斯派”,对革命运动中的其他

派别都不屑一顾,认为赫尔岑已“开始走向反动”,“大俄罗斯人”也“错误”多多,其他一些人的传单和言论也“不值得多谈”,只不过是一些“没有一定原则”、“没有任何意义”的“自由主义高谈阔论”;唯独他们自己最革命,公开鼓吹“极端措施”,声称“要做成点事是非采取极端的措施不可的”;还宣布,“我们将做得更彻底,不仅要赛过1848年的那些可怜的革命家,而且要赛过1792年的那些伟大的恐怖主义者。如果我们看到,为了推翻现存制度必须比90年代雅各宾派所流的血多一倍,我们也不会害怕。”他们高调宣称:“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予以消灭。”这样的调门,我们何其耳熟,因为它曾渗透在苏联时期的书刊中,特别是唱响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的苏联舞台上。

这种在19世纪俄国解放运动时期就公开宣扬的党同伐异和派别斗争的偏执,随着民粹主义运动的发展,在其极端主义一翼中更有所发展。在19世纪60年代下半期出现的涅恰耶夫及其一派身上,这种偏执性得到了突出的表现。一个姓伊万诺夫的大学生,曾同涅恰耶夫一起参加学生运动,仅仅就是因为对后者有所怀疑,不同意他的极端观点,涅恰耶夫就把此人视为“仇敌”,将其诱骗到郊外杀害了。此案很快被揭露出来,并被沙皇当局加以利用,闹得满城风雨,给革命运动带来了巨大打击。

类乎这种宗派主义的偏执,在俄国革命民粹主义三大派别之一的“夺权派”那里,也同样表现了出来。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特卡乔夫,他主张采取“直接革命行动”,就是号召立即起义,向专制国家发起冲击,马上进行夺权。另一个“宣传派”的代表人物拉甫罗夫,不同意这种策略,主张应先做宣传动员和教育工作,有了一定准备之后才能发动起义。这一主张原本并没有什么错,但特卡乔夫却对他大肆挞伐,将其斥之为比敌人还可怕的“叛徒”,倡导与之进行坚决斗争。

俄国民粹主义激进派的党同伐异和毫无宽容性,同俄罗斯东正教教派恶斗的宗教传统,实际上是紧密相连的,应该说,民粹派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吸收了俄罗斯的教派斗争传统:斯拉夫派的东正教情结是非常浓厚的,而俄国民粹主义同斯拉夫派在思想上的传承关系又相当明显。

正是这种俄罗斯教派恶斗的“大传统”与俄国解放运动中党同伐异的“小传统”,交织在一起,影响着日后的俄国革命,也影响着布尔什维克的党内斗争。

### 3. 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庸俗化

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原本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闪耀着光辉的革命真理,是认识社会、指导革命的锐利武器。但在俄国国情的条件下,在俄罗斯大小传统所具有的教派恶斗和党同伐异的社会历史土壤上,在斯大林这个青少年时代呼吸着宗教神学校空气长大的革命家手中,却渐渐变了味道,变成了党内斗争的利器,变成了党同伐异、狠斗反对派的工具。

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进行庸俗化的歪曲,这并不完全是从斯大林开始;早在斯大林以前,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史上,就存在一种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庸俗化、公式化、绝对化、教条化的思潮和派别,这就是所谓的庸俗社会学派。他们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学相对立,不是站在反映论的立场上,从经济基础,从所



苏伦·加扎良著《悲剧不应重演》一书的封面

有的社会阶级斗争条件,从其整个联系中引出思想现象,而是把这些现象的内容仅仅归结为“阶级利益”的表现,归结为“阶级”的心理和“阶级”的思想意识。坚持狭隘的、教条主义的、无所不包的、绝对化的阶级论,所以它把阶级制约性的原则无限夸大,使其外延性无所不包、无所不至,把一切社会意识都解释成阶级性的产物。在苏联早期,这种庸俗社会学是“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手中的武器,是指导他们思想理论的基础。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接过这一理论,把它改造成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其表现形态就是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把什么都说成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反映,无限扩大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向农民无限制地挖粮征购,农民为了生计而表现出不满和抵制,就被说成是“阶级斗争”;党内正常的反映情况,或表示不同意见,也被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甚至在农村把农民挖得仓光家净,日无下锅之粮,而农民一闹粮荒,就说是“地富捣乱”,上纲为“阶级斗争”。实际上,这是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无限外延,无限扩大,进行庸俗化,将“阶级斗争”当成了钳制不同意见的借口,甚至变成了对反对派和民众进行整肃、压制、迫害和镇压的有力工具。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本义的,是一种十足的庸俗化歪曲现象。

特别恶劣的表现,是把这一理论用于党内斗争。为了压制不同意见,打击反对派,把不同意的任何观点、任何意见,都说成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敌人的进攻”。这种庸俗社会学理论,给俄罗斯传统的教派恶斗和民粹主义的党同伐异,涂上了一层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油彩,变成了一套俄国模式的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这样,斯大林就有了一套剑指党内,整肃政敌的有效理论武器。

#### 4. 权力的个人化和独裁化过程

仅有整肃、打击政敌的庸俗社会学理论,没有一套权力独裁化、极权化的体制机制,整肃政敌,打击反对派,还不可能获得制度的合法性而落到实处。斯大林取得总书记职位后,在把这一职务转变为实际的“无限权力”时,有一个权力个

人化、独裁化和极权化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同他以阶级斗争尖锐化为标榜、以庸俗社会学为掩盖的这套整肃理论的产生、发展,几乎是同步的。

斯大林权力个人化、独裁化的过程,是从1923年秋反对托洛茨基的党内斗争开始的。此前,列宁已经失语不能视事;斯大林利用总书记的权力,把原来书记处这个政治局的实际办事机构、秘书班子,变成了可以掌控全党人事权力和情报信息的核心权力机构。当时在中央存在着分别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和布哈林为代表的四个政治派别;靠着职权、地位完全变化了的书记处,和由自己掌控的中央组织局,斯大林对这些派别采取了又打又拉、分化瓦解的策略:最初是拉拢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结成“三驾马车”,中立并稳住布哈林派,集中打击托洛茨基派。待打垮托洛茨基之后,又转过来拉拢布哈林派,打击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把他们同托洛茨基捆绑在一起,作为“托季联盟”来加以打击。将“托季联盟”反对派打垮并开除出党后,从1928年春夏起,又开始了以布哈林、李可夫为主要斗争目标的所谓“反右倾斗争”。经过一年时间,打倒布哈林“右倾集团”后,从1929年开始,由斯大林一派完全掌控了中央权力;但这时,斯大林个人还没有取得对权力的完全垄断和独裁。

1929年后,工业“大跃进”和农业集体化的后果突出显现出来:经济持续紧张,1932—1933年发生大范围的严重饥荒。这期间,斯大林的权力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起起伏伏,涨涨落落。1934年1月召开的联共(布)十七大,是斯大林实现个人对权力完全垄断、完全独裁的标志性会议。首先,十七大赋予党以直接管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的万能职权,这给党的最高领导人以真正的无限权力。其具体措施是,从中央到地方,党的各级委员会设置了与政府部门完全平行的、名称相同的生产—业务部,而把相应的同一政府部门置于党的同名称部的领导之下,这样,党就完全包揽了对生产—业务的全权领导。其次是,十七大决议取消了由列宁奠基的党和政府的监督机制。这次代表大会不仅撤销了政府中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还把原先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改组为在党中央委员会隶属

下、由一位书记主管的监察委员会,这就大大降低了这一机构的监督监察职权。一方面是,取消了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有全权对党的总书记和中央委员进行监督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另一方面,却又无限扩大了党对国家和经济事务的管理权限,这样就为斯大林个人控制一切、独裁一切,提供了完全合法的、得心应手的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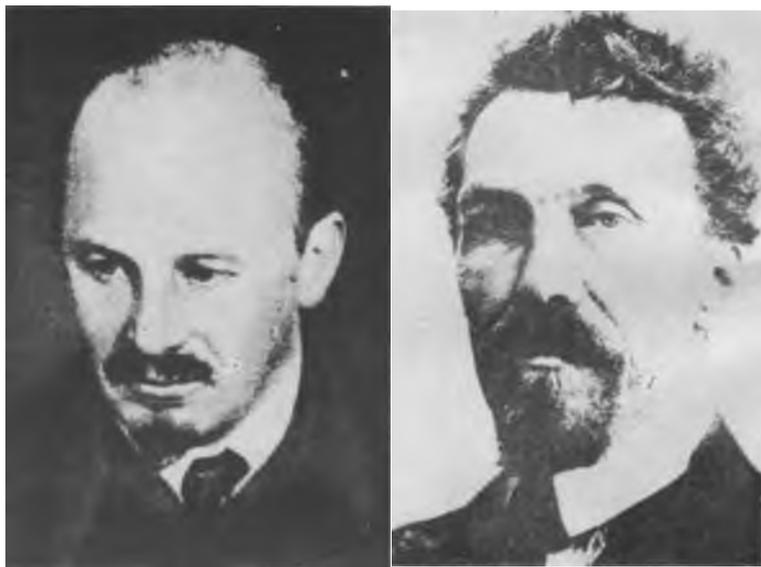
这样,从联共(布)十七大以后,斯大林便开始了真正的独裁极权时期。

### 5. 由对党、对领袖的神化,发展到对斯大林个人的神化

获得一种无限的绝对权力,既要有体制机制的保障,也要有理论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保障,二者缺一不可。斯大林是深谙其道的。事实上,他在建立自己无限权力的体制机制时,早已在理论观念和意识形态方面为自己的无限权力准备了条件。这就是对党的神化,对领袖的神化。斯大林在其出任总书记的早期,主要是着眼于神化党、神化领袖,给全党、全民造成党永远正确、列宁永远正确,列宁和党永远不会犯错误的印象和观念;而他本人是“列宁的学生”、党的领袖,依此逻辑推演,他自然也永远正确,永远不会犯错误。正是在此基础上,他利用1929年12月21日自己50寿诞之机,在整整一周的祝寿活动中,《真理报》连发《斯大林与党》、《斯大林与军队》等文章,再加上全国各地,包括工厂和集体农庄发给他的如雪片似的致敬信与贺电,开始树立对他的个人崇拜:斯大林就是党,党就是斯大林,斯大林像神一样,是永远正确,永不犯错误的。这样,就从神化党、神化列宁、神化领袖开始,到斯大林即等于党,等于列宁,进一步完成了对斯大林个人的神化。

有了理论观念和意识形态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神化,加上党和政府机构设置上的无限权力机制,二者两相结合,斯大林的一言九鼎、极权独裁地位就完完全全确立了下来。

然而,仅有这种像帝王一样的无限权力,并不见得会剑指宫廷,向自己的统治集团开刀;这里还得添加一味催化剂:具有专制主义的权力观。



布哈林(左)、李可夫在1938年第三次莫斯科审讯中被送上被告席

### 6. 专制主义的权力观

在近现代世界上,大体存在着两种权力观:一种是专制主义的权力观,一种是民主主义的权力观。民主主义的权力观,主张主权在民,即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是权力的最终决定者,也就是主张民权,即权力归民有、民治、民享;另一种是专制主义的权力观,主张权力归专制者个人所有,或者赤裸裸地主张“君权神授”,宣扬统治者的权力为上天赋予,其权力代表“天意”;或者打着人民的旗号,宣扬权力是人民给予的,却没有任何民意授受的程序和机制,就径直由一人专断独裁一切。这种权力观,认为权力高于一切,把权力视为最高价值;为保护、维持这种权力,可以动用一切,不惜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也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哪怕血流成河,哪怕洪水滔天。而民主主义的权力观,以民心民意民权为最高价值,当看到有更好的途径可以维护、实现这个最高价值时,当权者可以坦然地自愿让出权力,放弃权力。而对专制主义者来说,让其放权,无异于与虎谋皮,因为在他看来,权只能为他独享独有,如此才天经地义。而失去权力,对他就无异于失去生命;为权,为这个唯一的最高价值,专制者可以豁出一切,包括党和军队,包括国家和人民,一切的一切。

当斯大林大反布哈林,推行同列宁新经济政策相背的方针路线,实行工业化“大跃进”、强迫集体化而遭到严重挫折,引发全(下转第71页)

# 杜润生：一个符号

○ 陈越光



会议场景(吴思摄)

【编者按：今年，杜润生老人虚岁一百。杜老有许多头衔，其中一个头衔是本刊顾问。但是，用他本人的话说，他只是农口的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意味着什么？7月18日，农村发展研究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宾馆隆重举行庆生会，同时授予杜老“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特别贡献奖，授奖致敬词回答了这个问题。特此摘录，并表达本刊对杜老的敬意和祝福。】

追溯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历程，无论是在文献的丛林中检索，还是在人们记忆的长河里回望，我们都看到有一个众望所归的名字——杜润生，杜老。他被称为“农村改革之父”，“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长”，“中国农村改革的策划者、开发者、原创者”……然而，他自己说，他只是“农口的一个符号”！

这个“符号”，是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理论的符号——

30年来，“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对中国社会现实影响最大的原创性经济理论，杜老以及他领导的团队正是这一理论的贡献者。杜老被公认是上世纪80年代制定中国农村改革政策最有影响的核心人物之一。从1982年起，身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老，主持起草了关于农村工作的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他创造性地提出

“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这一概念，对推动中国农村变革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这个“符号”，是为农民谋发展团队的符号——

30年前，杜老是农口这个团队的组织者、领导者；30年来，杜老始终是这个团队的灵魂和象征。他象征着“爱人民就要爱农民”的情怀；象征着不同年龄、不同职级、不同知识背景的人在为农民服务的大舞台上优势互补“出成果出人才”的追求；象征着面对以复杂性和多样性为特征的中国农村情况，“尊重农民选择”和“调查先行”的传统；象征着朴实与清廉……

这个“符号”，是科学决策、寻找共识方法论的符号——

30年前，涉及几百万平方公里地域、涉及几亿人生存和发展方式的农村改革，其对方方面面利益格局的调整力度不可谓不大，其对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制度变革的创新力度也不可谓不大，其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意识形态的冲击力度更不可谓不大！然而，没有血与火的碰撞，没有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的手法，甚至也没有行政处罚的措施，使这石破天惊的变革在波澜不惊中有条不紊推进的，是广大农民的创造、是地方和基层党组织的担当与引导、是最高决策者的决心与明智，也是杜老团队在穿针引线中提供的一系列充满智慧的方法：研究问题“用归纳法不用或少用演绎法”；两难选择中“两害取轻两利取重”的比较法；“把大家讲的东西集中起来”在“不同意见中找共识”的方法；先改革后承认，先个案后文件，“经验先于理论”的方法；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公式所体现的“分散决策”的方法；“在重大问题上对待不同意见，要争取一致，但不强求一致”的“学会等待”的方法……等等，等等，杜老的方法论不仅活在农村改革的历史中，而且至今活跃在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

# 张恺帆在1959年

○ 宋 霖

1933年冬的一天,在上海龙华镇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囚室中,被捕前任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的25岁的安徽青年张恺帆,在墙角写下了他的新作:“龙华千载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终。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1959年,萧三为诗取题《龙华殉难者狱中遗诗》,编进《革命烈士诗抄》出版。诗中崇高的政治道德与气节操守,感动了读者,在全国传颂。其实,烈士没有死,他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刚51岁,正年富力强。萧三写信向张恺帆致敬,并致抱歉之意。张复信说:“我是幸存者,能获烈士称号,当不胜荣幸,何歉之有?”

同年,这位“活着的龙华烈士”被打成“反党联盟”首领,开除党籍、逮捕囚禁。

## 一、缺乏党内民主,必然导致恶果

1957年“反右派斗争”,安徽打出右派分子31472人。把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和杨效椿等人打成“反党集团”,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

1958年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生产上的瞎指挥风等“五风”泛滥。7月31日,舒城县千人桥农业社放出早稻亩产11471斤虚假“卫星”,张恺帆陪同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赶去祝贺。此时,张恺帆是不清醒的,他做诗赞颂:“千人桥上万人瞧,谁放红星出九霄。槐树中心旗杆队,社员风格比天高。”到了“卫星”满天时,他清醒了。他感受到了清醒者的痛苦。

7月,安徽办起9万多个“公共食堂”。8月22日,安徽在全国第一个宣布早稻平均亩产已达千斤(实际318斤)。9月,毛泽东视察安徽时说,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从8月到12月,省委贯彻“钢铁元帅升帐”,全省241万人(最多时500万人)“大办钢

铁”,10万人进山伐木,严重破坏了森林资源。教育、科技、文化等部门也竞相提出了荒诞的高指标。很多干部看到了问题,但由于以言治罪的“反右派斗争”刚刚过去,大家都不敢说。

12月27日至29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视察安徽,张恺帆负责陪同。彭10天前在故乡湖南见到乡亲们挨饿,6天前收到一位伤残老红军的诗:“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这两位同年(1928年)入党的老党员谈得非常投机。彭谈了党内风气不正、浮夸、不讲真话、报喜不报忧。张谈了党风不纯、吹牛浮夸成风、弄虚作假、高产高得没了边。

8个月后,这两位“敢为人民鼓咙胡”的忠诚正直的共产党员,同遭毁灭性的政治打击。

## 二、说假话搞浮夸,是吏治的败坏

安徽1958年产粮167.9亿斤,浮夸成450亿斤。高产量导致高征购,农民在挨饿,省委却认为“农民把粮食藏起来了”、农村在“大搞瞒产私分”。

1958年冬,安徽农村开始饿死人。12月29日,张恺帆在省委常委会议上提议“分头到农村去,与民同乐。”他是讲究方法的:老百姓没饭吃,没人敢说,说了没人肯听,大家都下去看看吧。曾希圣支持这个提议。当时,书记处书记都兼任一个县或一个大型厂矿的党委第一书记,书记们分赴各地。

北京回忆久久文化传媒  
特 约 刊 登  
回忆久久为您撰写回忆录  
咨询热线: 400-653-6199

张恺帆时兼巢县县委书记。他12月31日到巢县,与县委第二书记张建下乡调查。他们看到农民十室九空,公共食堂大锅里清水煮青菜,只有一星半点粮食,情况严重。张恺帆赶回合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作汇报,被批评为“受了农民的骗”。有人说农村“白天一片青,晚上一片红”,意为:白天吃青菜是假象,晚上点灯弄好的吃,各村灯光一片通红。张恺帆赶回巢县,与县委农工部部长陈建章坐吉普车到四乡察看,农村一片漆黑,所谓“一片红”纯属捏造。

1959年1月24日,省委通过决议:继续反对右倾保守思想。2月7日,省委号召开展“反瞒产斗争”,提出了更高的农业生产指标。张恺帆带着省水利厅副厅长周骏,到含山、和县农村作调查。看到饿死人现象更加严重,连夜赶回合肥,要求向常委会议作汇报。在战争年代与他结下了深厚友谊的老领导曾希圣劝诫他:“你不要汇报了。你为什么总看阴暗面,不看好的呢?好的是主流,我看你是有点右,要注意。”

2月下旬,省里派人到巢县调粮。张恺帆说:“存粮很少,巢县几十万人民要吃饭,不能再调。”来人说:“农民把粮食藏起来了,搞‘白天一片青、晚上一片红’。”张恺帆不顾后果、拍案而起,说:“这完全是造谣!我建议省委派人来查!”几天后,省委调查组进驻巢县查粮,一无所获。3月9日至20日,省委召开六级干部万人大会,宣传纠正“共产风”等问题,宣布开放粮食市场调剂余缺,同时指出:农村不缺粮,全省普遍发生了“瞒产私分”。

在上下不讲真话的可怕氛围中,安徽1959年粮食生产任务于3月30日向全省广播了:“超额完成720亿斤。”这是上年产量的4.28倍,是当年实际产量(140.2亿斤)的5.14倍。“五风”肆虐,安徽出现了严重的“饿、病、逃、荒、死”。

关于灾难成因,至今有人说是“三年自然灾害”,把责任推给老天爷。事实上,安徽历来多灾,那几年恰恰少灾,较大灾害有两次,一是1958年5月起,大部分地区70天未雨,沿长江地区90天未雨,受旱作物面积1833万亩;二是1959年6月21日至10月31日少雨干旱,成灾面积3428万亩,致秋粮减产52亿斤。1960年和1961年,安徽两年无大灾。而人祸,仅1959年,

就造成了粮食生产500亿斤以上的巨大落差!饿死人(即所谓“非正常死亡”)已不可避免。

据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出版并向国内外发行的《安徽四十年》公布:安徽1959年至1961年出生1417529人,但1961年仍比1958年减少了4064710人。以1960年与1958年相比,全省户数减少了360393户,其中农村减少27.1万户;城镇人口增加68万人;农村人口减少420万人,其中农村劳动力减少268.4万人;真是创钜痛深!

说真话和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成为政治禁忌,是执政党犯错误的开始。说假话搞浮夸,是吏治的败坏。哄瞒虚夸盛行和“一级糊弄一级”成风,是干部政治道德气节操守的衰微。这个历史教训,是用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血泪换来。

### 三、庐山之外省委书记抗“左”第一人

农村饿死人越来越严重。家乡无为县人不断,有的进门就哭。张恺帆从省粮食厅了解到,无为1958年上报产量13亿斤、征购7亿斤,已完成征购3亿斤。他非常震惊:无为年产粮六七亿斤,征购7亿斤农民怎么活?他提出要去无为调查,得到了曾希圣的同意。许多同志看到张恺帆直言遭嫉,处境已经不好,纷纷登门劝阻。他说:“怕什么呢?共产党不能不管群众疾苦!”

7月2日,庐山会议召开。仿佛是历史老人的刻意安排,张恺帆的行为举措,与庐山上的彭德怀惊人的一致——

7月2日,庐山会议开幕。同日,张恺帆带领省民政厅副厅长白犁平、省粮食厅副厅长刘健民、省人委办公厅主任夏云、秘书处副处长刘康,前往无为。他在行前严格规定:不准提前通知行程,以防做假。

3日,彭德怀在西北小组会上发言,直陈时弊。同日,张恺帆一行进入巢县,沿路揭开公共食堂锅盖查看,全是白水清汤漂几片菜叶。

4日,彭德怀在庐山发言,批评公共食堂。同日,张恺帆一行进入无为。无为是鱼米之乡,旧谚“三年不遇水旱愁,锅巴打墙头”。眼前情景令他们触目惊心:公共食堂基本断炊;行人面有菜色,多数走路不稳,要拄拐棍;孩子们饿得不成人形;因为劳动力锐减,大量田块没有插秧,放眼望去一片白水。



张恺帆在1950年代的照片

群众认识张恺帆，纷纷围上来诉说：“我们还不如以前的鸡，鸡一天还有两把米。”“听说上头每人每天发二两原粮，发到我们手里才好。发到公共食堂，层层克扣，我们就一点也见不到了。”“把自留地还给我们吧，种点瓜菜，也好度命。”有老人下跪，为饿得奄奄一息的孩子哭求：“请张省长救命！”张恺帆泪流满面，愧疚难当。

张恺帆知道，这几年无为无大灾。1958年5月12日起，百日未下透雨，致境内西河、永安河、花渡河上游断流，闸北、沈斌、牌楼、汪田、昆山等乡丘陵山地旱灾严重，平原和圩区未受大的影响。造成如此悲惨局面的原因是：造假、浮夸和建筑在浮夸基础上的高征购。

他们来到石涧公社沿河梢村。全村十几户人家有9个孩子父母饿死，成了孤儿。有的农户全家饿死。公社党委书记汇报说上半年死亡564人。张恺帆把各大队上报的数字相加，1369人，作假已成习惯。就是这个公社，1958年冬组织过“卖粮现场会”：从粮站仓库里把粮食挑出来，敲锣打鼓喊口号，转一大圈，回到粮站“卖粮”，再挑回仓库去。对这种欺世瞒天的恶行，人民群众既痛恨又无奈。

抵达县城，县委第一书记姚某汇报说：“产粮13亿斤，准备征购齐7亿斤。”张恺帆问：“这么多粮食，为什么有人饿得浮肿？”姚答：“浮肿的都是好吃懒做，不做事当然没有饭吃！”姚报告：“全县浮肿1万余人。”当日夜，县粮食局局长向张恺帆

反映：姚书记叫弄了两本账，另一本账是真实的产粮7亿斤。姚作风粗暴，动辄整人，下级畏其如虎。

5日，彭德怀和周小舟在庐山交谈湖南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同日，张恺帆让白、夏去开城区调查，自己带其余人去陡沟区。陡沟景况比石涧更悲惨：路旁堆着树叶、蒿蓼和塘草，是牲口都不吃的，乡亲们就用此充饥，十人九病；强迫移民并村，致使村舍残破。乡亲们哭诉：“能不能不办食堂，粮食少点就少点，发到我们手里。”

6日，彭德怀在庐山发言批“左”。同日，张恺帆去南乡襄安、泉塘、蜀山等公社察看，当晚返回县城。白、夏二人从西乡回来，说饿死人严重，有的干部动辄打人、捆人、吊人，已激起民愤。

当夜，张恺帆严厉批评县委第一书记姚某：“你说只有万把人浮肿，一派胡言。我问你，芜湖地委通知每个浮肿病人发1斤红糖，你是不是报了20万人？”姚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张恺帆讲了调查到的悲惨情况，竭力语气平和，问：“老姚，你准备在无为饿死多少人？”姚脸色煞白，不敢再吹牛了。张恺帆命令：“从明天起，每人每天不得少于1斤原粮，全部直接发到群众手中。公共食堂暂时停办。自留地归还群众。告诉你，你不发粮，我就不走了！你通知下去，明天开大会，基层干部都来，我要讲话。”

张恺帆的命令是有政策依据的。中共中央5月7日指示分给农民自留地，5月26日发文强调公共食堂自愿参加。他知道，公共食堂是毛泽东和中央多数领导人支持办的，它被视为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一个标志，虽然中央强调“自愿”，但紧接的一句是：“又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把食堂一风吹散。”现在，人民在大批饿死，为了救人，张恺帆顾不得了。他甘冒政治风险，挺身而出为民请命。

他不知道，在庐山，朱德、彭德怀等人对公共食堂提出了尖锐批评。朱老总说，公共食堂“全垮掉也不见得是坏事”。

他没有想到，35天后，自己会被毛泽东宣布

是：“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

#### 四、“我吃人民饭，不能吃粮不当差！”

7月7日，无为县县、区、公社、大队、小队五级干部大会在县城观政潮广场召开，张恺帆做报告。以下所引皆当年记录原文。

他首先将批评的锋芒，直指“大跃进”和浮夸风，说：“浪漫主义太‘浪漫’很了，本来是个很漂亮的大跃进，可是粉堆厚了一点。比如明明亩产400斤，硬说是800斤、1000斤。”“过去有人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哪有那么容易！破除迷信不是不要科学，而是要我们更科学一些，如果破除科学，那也就是迷信！”“去年我到肥西，有个生产队长告诉我：‘一亩试验田下了200斤种，打算收200万斤。’我说：‘这是做梦！’破除迷信，也不要科学了。”

他批评“全民大办钢铁”的蛮干，批评强迫移民并村，说：“去年搞钢铁，把人家锅搞掉，有的连小锅也拿掉，一口不留。这种做法，过去叫‘搬锅台’，也是不得人心的。”“有的把人家公孙三代并在一间房里睡觉，成什么话！”“可以马上搬回去的，马上搬回去。没有条件的，秋后一定要解决。”

对自留地问题、是否允许农民饲养家禽家畜问题，他说：“留自留地，发展家禽家畜，好处很多。总的来讲可以增加物质财富，鼓励群众生产积极性。社员生活搞好了，集体生产才能搞好。同志们不要怕这个、怕那个，说什么资本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不劳而获、剥削别人。请问，社员搞点小块土地，养几个鸡生几个蛋卖卖，这是剥削了哪个？我们是领导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走共同贫穷的道路！”“现在有许多事情蛮干一通，不讲道理，把大家搞得死死的，搞得穷穷的，这不叫干劲，叫蛮干。这样干下去，只会错误更大，恶果更大！”

对最敏感的公共食堂问题，他说：“食堂一般不要搞了。据我了解，群众现在只要把粮食、烧草、菜园地等给他，没有锅，给他解决，他们是双手欢迎，愿意单吃的。”他指出：有些干部坚持搞食堂，是为了方便自己多吃多占。他说：“现在有的人，只要当上干部，一家人全沾光。到一个村

上去看，穿得好的，长得胖的，总是干部，或者是干部家属。”“有一部分人，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动辄打骂、不给饭吃。”“有的白天吃三餐，晚上还要吃夜餐！”

在讲到某些干部打骂群众、克扣粮食的恶劣作风时，他说：“如果屡次警告，再不改正，提高到原则上来认识，就是反革命分子！因为他们这样搞，就是叫群众来反对共产党，革我们的命，杀我们的头，这不是反革命是什么？！”

他申明：“我吃人民饭，我要管事。我不能吃粮不当差！人民给我权力，我就要行使职权，我就有权干涉，任何人胡作非为是不行的。我们的革命成果不能让少数人断送！”

张恺帆代表省委和县委宣布发粮救济饥民：“每人平均每天不能少于1斤（按：指原粮）。具体安排是：1至5岁半斤，6至12岁12两（按：此为1斤16两旧制），13至17岁1斤，18至64岁1斤4两，65岁以上1斤。从今天起就安排下去，一直到接上早稻。”另外，“重病号除应有标准外，每天加二两黄豆。对产妇、老弱，应根据现有力量，尽可能加以照顾。”他还宣布纪律：“不准层层克扣。会议一结束，马上组织检查。我打算蹲几个月不走，如果查到哪个克扣粮食，一定要按法纪严处！”发粮方法：发到每一户，直接交到农民手中。

观政潮广场上欢声雷动！广场之名是旧名，打从这一天起有了新的含义：观政，观为谁执政、施什么政！

在全国省委书记中，他是庐山之外奋不顾身抗“左”第一人。

7月9日，他给省委和曾希圣写报告，报告无为情况和即将实行的“三还原”措施：1.吃饭还原，停办公共食堂；2.自留地还原；3.房屋还原，让农民回自己家居住。并于当晚严令县委立即付诸实施，他说：“救人要紧！”

#### 五、为坚持原则付出了惨重代价

10日至12日，库存的150万斤大米和300万斤稻谷，迅速发往农村；30万斤黄豆加工成豆腐、豆浆，供应浮肿病人和没有奶喝的婴儿；设法弄来的一批肉食品，供应给病人。此举拯救了数

十万濒临死亡的人民的生命。

为此,两个多月后,张恺帆全家跌入苦难,六个亲人惨死。张恺帆的表兄王试之是爱国民主人士,抗日战争中帮助过新四军,曾希圣常住在他家,受株连被批斗致死。张恺帆本名张昌万,他的二弟张昌选、堂兄张昌华、堂弟张昌树、堂侄张柏五,被批斗、殴打、逮捕,一根绳子拴四个人,全都惨死在关押地。他的外甥谢一贤(姐姐的独生子)为躲避抓捕,逃出无为,饿死在他乡大路边。他的三弟张健帆(昌青)是新四军老战士,在上海工作,与无为事件无关,受株连被开除党籍、押送崇明岛劳改。老战友倪化黎、戴云龙等人被逼自杀。后来平反时统计:仅无为一县,因张恺帆事件受株连被批斗、被处理的县、社、队党员、干部和群众,共达28741人。

无为人民承受了巨大的苦难。该县1957年人口近百万(982979人)。大饥饿迫使农民外逃(时称“外流”),到1960年年底共有15万多人(153276人)逃离无为。同期,增加的人口多于外逃人口(出生72712人、迁入99322人,合计172034人)。在悲惨的1960年,无为人口降至662557人,比1957年减少32万人,大多数是饿死。如果没有张恺帆放粮救人,后果更不堪设想。无为县生产力受到了巨大破坏,耕牛减少9674头,大型农具减少176244件(占60%)。村庄残破,土地荒芜,万户萧疏。

14日,彭德怀改定写给毛泽东的信(即所谓“万言书”)。次日,张恺帆给省委和曾希圣写报告,汇报情况,提出“现在几乎所有水面(包括行水沟)都被水产部门和社、队养鱼,禁止捕捞,社员毫无活动余地,市场上也无鱼虾供应,群众很有意见。我意应当把行水沟全部开放,允许群众利用早晚闲散时间,张捕点鱼虾,以调剂生活,改善营养,活跃经济。”这个意见后来被概括成“两开放”:开放水面,开放自由市场。

解散公共食堂,杜绝了干部层层克扣粮食,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同时,也遭到了既得利益者顽强抵抗。7月12日晚,县委第一书记姚某对张恺帆说:汤沟公社七洲大队公共食堂办得好,“是雷打不散的”。次日清晨,张恺帆由县委书记处书记谢永康陪同,前往七洲调查。那里食堂确实没有断炊,有一群人正在里面吃面条。群

众得知张恺帆到来,纷纷围上来说:“就他们干部和干部亲属有吃的!哪里我们社员的份啊!”张恺帆强压怒火,当场宣布:“这些所谓办得好的食堂,是对少数人办好了!立即停办!”当天,该大队41个食堂垮掉了36个。张恺帆继续去他1930年11月领导“六洲暴动”的旧地作调查,六洲公社481个食堂当即解散了447个。无为全县的人民群众欣喜若狂!奔走相告!短短3天,全县6069个公共食堂“一风吹散”。只120个没散,被干部隐瞒了。后来,在批斗张恺帆时,有人编造了“张恺帆反党言论”:“什么雷打不散?我就是雷公!看看打散打不散!”

为了全面反映情况,张恺帆打电话要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陆学斌派两个人来无为,协助写成《无为县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张恺帆写了批语:“是否作为内部参考,请陆学斌同志提请省委决定。”这个正常的工作配合,后来被打成“张、陆反党联盟”。

一场政治风暴,已在紧张酝酿中。

7月15日,一个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要芜湖地委第一书记作陪到无为,由县委第一书记姚某陪同,把张恺帆调查过的地方,重新“调查”了一遍,写出了内容完全相反的报告,上报省委。同日,张恺帆在省委工作组会议上讲话。他说:“领导作风,听好的不听坏的。反映真实情况、讲真话的受辩论,是‘扛白旗子’。说假话的‘有干劲’。上下不讲真话,正气下降,邪气上升。群众饿得这样子,死人无所谓,干部熟视无睹,不讲党性,首先要检查人性!”这段话不久被作为“反党言论”揭发出来。

庐山会议风云突变,曾希圣在庐山打电话给省委书记处,指示通知张恺帆赶快回合肥,不要在无为调查了。那人没有通知。

反调查使张恺帆无法继续工作。7月22日,他在全县公社书记会议上讲话,动员双抢(抢收抢种),说:“总的讲,你们的工作是八个字:成绩不小,问题很多。对造成恶果的干部要处理,但要放在以后。当前要全力抓生产。”他没有想到:造成恶果的干部没被处理,即将被处理的,是他自己。

24日,张恺帆返回合肥。此前一日,毛泽东在庐山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列席庐山会议的一个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赶回合肥,组织对张

恺帆的批判。

8月1日晚，省委常委会议在稻香楼召开。张恺帆被指控为“大闹无为二十天”、“反党反社会主义”、“攻击人民公社”、“煽动群众闹事”、“地主倒算”、“捏造事实向党进攻”、“揭无为的盖子就是揭省委的盖子，要把我们搞垮！”4日，中共安徽省委给中共中央写了《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报告，派专人送上庐山。

庐山上正是风狂雨暴，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被强加“反党”罪名，蒙受劫难。安徽省委的报告，适时提供了庐山之外唯一的一个省委书记的“反面典型”。

## 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诗人情怀

8月10日，毛泽东对安徽省委的报告写了批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

9月19日，中共安徽省委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宣布“将张恺帆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等职务，并责令其交代包庇反革命分子及其他重要问题。”陆学斌“给以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撤销候补书记、宣传部长、副省长等职务，并交组织部门继续审查，同时责令其彻底交代。”张恺帆的妻子、新四军老战士史迈与此事无关，也遭受批判、行政降级。

当日夜，张恺帆枯坐斗室，直至天明。他将满腔忠烈和孤愤，倾注进诗中：“神差鬼使到无城，（张恺帆自注：饥神饿鬼）为报真情获罪人。五十一天伤乱箭，万千张口说曾参。无心偏惹三还恨，有口难吹七字尘。（七字：反党反社会主义）。北望都门泥首拜，不难化骨见忠贞！”

几天后，他和家人被押送淮北濉溪县甘家口林牧场劳动改造。无篷卡车载着一家老小，驶出合肥，颠簸北行，四野一片萧瑟凄清，张恺帆一路

多有吟咏。入党31年后被开除出党，他不屈服，坚信自己没有错：“三十一年还旧我，一肩行李出庐阳。鳧长鹤短谁争得，自有春秋玉尺量！”原来相处很好的人，都弃他而去。面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颇为伤感：“昨日门如市，今朝犬不惊。扪心无愧怍，何必论人情。”有的人“变脸术”使他大吃一惊：“嘴上呼兄弟，心中直骂娘。一朝落陷阱，投石若飞蝗。”面对凶险莫测的前途，他亦有垂老之叹：“三十一年空怠慢，千锤百炼未成钢。更番投入洪炉里，炉火青时鬓亦苍。”虽然被判为反党，他的信仰依然坚定：“能受折磨真战士，不遭人忌是庸人。此行莫漫伤零落，霜叶如丹犹似春！”到淮北不几天，是1959年国庆节。淮北城乡饿死人严重，他无力解救，唯有仰天浩叹：“建国十年长，黎元尚菜糠。‘五风’吹不禁，惭愧吃公粮！”

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在全省展开。揪出了一批“小张恺帆”、“代理人”、“追随者”。在人民群众中，“张青天”之名不胫而走，一再禁止，皆无效果。

## 七、“石关关不住，民怨已冲天！”

1959年11月，张恺帆被秘密逮捕，押回合肥。原来，还要定他“混进革命队伍的内奸”。至此，他已全无顾虑了。当一个办案人员说他在国民党监狱坚持斗争“是与敌人演双簧戏”时，他拍案而起，严厉痛斥。那人冷笑说：“张恺帆！你落到这步田地，还敢发脾气呀！”张恺帆目光如炬，盯着那人，说：“要是我还在台上，你敢！”那人失色避走。

他刚强如铁，也柔情似水。妻子史迈双目已近失明，他寄诗劝慰：“丈夫坦荡本无忧，唯独卿卿惹我愁。病眼欲盲宜保护，丝毫泪水不须流。”10岁的儿子新元被告知：爸爸在遥远的六安林场种树。新元总也想不明白：这树，怎么会种不完呢？就连着写信，央求爸爸快快回家。张恺帆读信，泪流不止，情不能抑：“送罢残冬又送春，小楼岁月最凄清。几回泪湿元儿信，望我归去总不成！”

史迈1920年出生在桐城（今属枞阳）书香之家。父亲史大化是中国同盟会会员、著名爱国人士，曾协助吴汝纶办学，参与创办安徽大学。叔父史逸是

1923年加入中共的革命烈士。三哥史伟在北京读大学时加入中共,在山东抗日前线牺牲,噩耗传来,全家恸哭;父亲拭泪仰天大笑说:“吾有子矣!”在兄弟姐妹中,哥哥史洛文、姐姐史洛明(王仲方夫人)抗战开始即奔赴延安。她1939年带弟弟史康参加新四军,同年加入中共。此时,她精神痛苦、饥饿煎熬,几乎陷入绝境。

张恺帆被囚禁207天,什么问题也找不出来。一负责人说:“现在送你回淮北继续劳动,不然,你要说我们关你了。”

安徽经济极度困难,路有饿殍,省委却在岳西县石关大兴土木,建造别墅群。张恺帆愤然写下《书愤》:“画栋深山里,哀鸿大路边。石关关不住,民怨已冲天!”

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召开。曾希圣调离安徽。李葆华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7月20日,省委宣布撤销《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为他们彻底平反。

张恺帆毕生遵守政治道德,重气节、讲操守。他对旧官场流传下来的种种恶习,深恶痛绝。他的老战友张劲夫撰文说:“他不是做官的

材料,不讲究为官之道,但他是革命的材料。”到上世纪80年代初,张恺帆担任了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安徽省政协主席,还兼任了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他又有几首诗作,在全国广为流传:“改革势头诚大好,党风腐败究堪哀。劝君少把支流比,质变多从量变来!”“贪污腐化寻常见,艰苦清廉几见闻。未必高层都不见,只因心地欠光明!”“贪赃枉法寻常事,官倒官升走后门。未必浮云遮望眼,只因儿女感情深。”“振兴华夏凭吾党,腐败官僚究可哀。我愿层峰严律己,率先带个好头来!”

张恺帆“反党联盟”案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五风”特别是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风、生产上的瞎指挥风,至今远未铲除。毛泽东在建国初说过:“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正,国将不立。如果臣下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

(作者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史研究所原所长)

(责任编辑 黄 钟)

(上接第63页)面经济紧张,甚至引发1932—1933年大饥荒,造成近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激起党内对他权力的质疑,在党的七大上丢掉近300张票,败给基洛夫时,他不是看到自己的错误,看到党心民心的向背,自动放弃总书记职位,而是为维护这一权力,不惜伪造投票结果,并大搞“秋后算账”,悍然发动“大清洗”,把十七届中央委员和党代表大会代表逮捕过半,对全党和所有反对派进行全面镇压。结果,株连、波及苏联社会各阶层,造成1937—1938年间68万多人被杀,300多万人被捕,至少近250万人被作为政治犯处理,至于遭受株连者,则以千万计。

还不仅仅限于战前这一次大清洗、大镇压。战后,当斯大林怀疑军内党内出现对其不忠的苗头,感到权力、威望受到威胁时,再次向党内、军内干部开刀,制造了“航空工业案件”、“明格列尔案件”、“列宁格勒案件”、“医生案件”等等,仅在“列宁格勒案件”一案中就冤捕冤杀2000多人,甚至连当时党内最年轻有为、最有前途,并看好未来党政接班人的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

也蒙冤受屈,不能幸免而死于非命。

斯大林“这把刀子”为什么会向共产党自身开刀?回答这个问题,只能综合上述各个方面的因素,既看到俄罗斯教派厮杀恶斗的“大”传统,又看到俄国革命运动中党同伐异的“小”传统;既看到歪曲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把阶级斗争“利器”指向党和人民内部的理论错误,又看到从神化党、神化领袖,到最终神化斯大林个人,造成对他的个人崇拜的整个造神过程;既看到苏联党政高度合一,最后党也长入国家和经济权力机构,成为其核心枢纽,而党的最高领导人则变为独裁者和极权者,同时也联系到专制主义权力观对斯大林所起的异化、腐蚀作用,对他心灵所产生的毒害,——只有对上面这一切因素,所有方方面面,做出综合分析,才能比较全面地理解斯大林“这把刀子”对其统治集团自身实施“自残”、几乎“自废武功”的深层原因。■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黄 钟)

# 南京解放前后的陈修良

○ 唐宝林



陈修良 1946年4月潜入南京,以姑妈张太太身份的照片

陈修良(1907-1998)几乎活了一个世纪。作为一个中共党内不大不小的干部,陈修良犹如一个弄潮儿,多次被抛到浪尖上,也多次沉没深渊,九死一生。

—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中共华中分局城工部(部长沙文汉,陈修良的丈夫)曾成立南京工作部,部长是大革命失败后长期在上海坚持城市秘密斗争的陈修良。她在江北的六合县设置机构,隔江领导南京地区的秘密工作。1946年4月,中共华中分局成立南京市委,派陈修良任市委书记直接进入南京城内工作。

南京是国民党首都,除配备重兵,严加卫戍

外,还遍布特务网,密侦暗探,滥施捕杀。整个“大南京”笼罩在森严白色恐怖中。自中共建党以来,南京的党组织连续八次被大破坏,市委领导人几乎全部牺牲,因此南京在中共党内被称为“虎穴”。陈修良作为南京市委第九任书记再次潜入这个虎穴,需要有极大的勇气。但是,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

她与沙文汉诀别在长江北岸时,感慨地吟诵“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表示了义无反顾、准备牺牲的决心。随后在江边脱下军装,换上便衣潜入南京。当时南京全部党员只有200人。要配合解放军解放南京,谈何容易!但在1947年5月6日成立的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组织部长钱瑛,以及刘少文、吴克坚、沙文汉领导的情报部、策反委员会)领导下,坚决贯彻“十六字方针”——即“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1947年,南京市委在上海局刘晓直接领导下,首先在南京发动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波及全国的“五二〇”学生运动,使国民党统治受到严重打击。毛泽东为此特别发表文章,宣称在国统区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国民党已经处于“全民包围之中”,对其历史意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在1948年淮海战役胜利后,南京市委的工作立即转到配合解放军解放南京的活动上来。情报、策反、解放和接收工作极其繁重,陈修良屡屡接到中央及上海局的紧急指示,为了做好这些工作,经上海局批准及指示,陈修良大胆而谨慎地发展党员,南京解放时发展到2000人。他们中许多人,或由南京的党员打进去的、或由国民党军警宪特部门中的积极分子中拉出来的。

按照当时党的政策和策略,党的情报工作允许运用各种力量,包括使用能够悔过自新的叛

徒、特务。有的虽然不发展入党,但经过工作后,也愿意在国民党之船沉没时自救而为中共做点事情。如在美军顾问团(AAG)、中统、三青团以及联勤总部等部门,都经常有人送来重要情报。而他们都是出身于非工农家庭的知识分子。

正是这些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获得了大量国民党最高军政部门的机密情报。如为支持解放军渡江作战,南京市委的策反和情报系统,先后在驻防南京的国民党陆海空和警察部队、保密局、国防部、美军顾问团、联勤总部、青年部等部门发展或安插了中共党员40多名。他们分别在各自部门,采用不同的方式,通过不同的渠道收集、刺探敌军事情报,获得了蒋军封锁长江时的通讯口令;南京军统特务名单及活动情况,同时还得到了军统布置潜伏在南京的秘密电台和密码、一些重要军事会议的内容及其文件。渡江作战前,解放军总前委司令部先后收到了由南京党组织朱启銮、白沙化装成商人冒险过江送来的汤恩伯拟定的《京沪、沪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和《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等重要情报。

此外,情报部门还从国民党军令部弄出了《1948年国民党后备军力量》;首都警察厅的《南京城防工事地图》以及有关警察部队的兵力和装备的重要情报资料,冒着生命危险弄到国民党军队从芜湖到安庆之间的江防部署图,浦口沿江地带国民党前线司令部位置、干部名单、炮兵阵地、人员编制、武器装备等情报。渡江前,打入蒋军京沪杭总部作战参谋的党员沈世猷,他提供了国民党长江布防、江北桥头堡等许多重要情报。

包括三大战役中的其他战役中,多有这种事。所以,最高领导“用兵如神”的秘密就在于此,解放后毛泽东在接见韩练成时说过一句真心话:“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韩兢《隐形将军韩练成》,群众出版社2008年)坦陈了情报策反工作在战争中的作用。一个人下一盘棋,要另一方怎么落子,就怎么落子,哪有不赢的道理!

与此同时,由陈修良等两三人亲自领导的南京市委策反部,还在1948年~1949年间,成功策反了一系列国民党自称为“固若金汤”的长江防

线海陆空军大起义。如以俞渤为首的国民党空军八大队起义,“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师长王宴清为首的首都警卫师97师起义。

就这样,当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华东野战军(由“二野”和“三野”组成)准备在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拒绝接受共产党条件而进攻江南时,原计划“攻占浦口,炮击南京”方案及时撤销,以避免这个六朝古都和人民在战火中受到不必要的损害。因为在南京东西两侧江面最狭窄的江阴要塞和安徽荻港地方党策划起义的情况下,解放军首先突破长江,然后迅速从南京后方包抄过来。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立即下令南京守军全面向杭州等东南方向撤退。于是,从22日起,南京就成为没有国民党军的空城。但是,这时在江北的解放军还不知情。陈修良和南京市委一方面采取措施积极与解放军联系,迎接解放军进城,一方面组织党团员、积极分子和广大群众保护南京城,不使散兵、特务、流氓等不法之徒抢劫破坏。正如陈修良在当时给华东局转中央的一封电报中所述:

“四月二十二日下午,敌军警宪仓促撤离南京时,全市即陷入无政府状态中,流氓地痞和贫民集体进行抢劫各米面油行,警宪仓库等。解放军于二十三日夜方有少数部队陆续进城,抢掠依然不停。维持治安地下党早有准备,二十二日起即出动保留下来的警察实力2000余人(郊区与城内按地区组织,党的系统受警委领导。解放前包括统战关系,全市97单位中有关系者64局所,撤退时一部分被迫离城后仍弃枪回城者不少),商店职员组织的义务警察约1000人,工人纠察队3000余人。各专科以上学校师生员工应变会的组织,各政府机关公务员联谊会组织起来的员工,混乱时即将敌人遗弃枪支多少不等,武装自己,青木棒不计其数。此项群众数量相当巨大,无法统计,至少七八千人,立即站岗、放哨、巡逻,保护机关、仓库、公用事业等。维持治安中,死义警一人,贫民死伤数人,物资破坏不大。蒋匪临走时将司法行政部烧了,西郊警察局因我控制力极大,全部未撤走,曾接应渡江。我三十五军初进城时,因未与地下党联络,不了解情况,即命令人民武装及警察全部缴枪,致一天之内助长了抢掠之风。解释误会后,仍令警察徒手站岗,

并派军队看管各重要机关。数天后,秩序即告稳定,南京已无战争景象。警察复员,经审查后已复员至4000余人,现已归公安局领导。工人、店员武装组织,拟经表扬与教育后,每人发给生活津贴费二千人民券,争取先后复员就业。”(《陈修良给华东局的报告》,1949年5月2日)

24日中午,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先头部队,在南京党组织和人民帮助下,胜利渡过长江。先是在南京地方党帮助下,一条小木船在长江上六次往返不受阻碍;然后在地方党组织的三艘小火轮、八艘巡逻艇和两艘私人

轮渡载着35军官兵和辎重渡长江时,并没有后来电影中渲染的受敌人炮火猛烈的轰击下血战,解放军先到的部队是在南京人民敲锣打鼓在长江岸边和新街口夹道欢迎声中进入城市的。在南京党的精心保护和工作下,南京的自来水、电灯照明,一如平日,甚至连报纸也没有停刊,24日凌晨已由南京党的同志占领的广播电台,首先宣布了解放军渡江,南京解放的消息……

这完全是和平解放的景象,但是解放后,为了突出军队武装是解放南京的主因,大力贬低上海局和南京市委、国民党起义官兵、广大学生、工人、农民、市民、民主人士的作用,使人民长期不知真相。

## 二

然而,解放军和根据地南下干部与南京秘密工作干部会师后,在思想观念、工作作风、知识能力、地位待遇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严重冲突,后者遭到严重打击和迫害。

长期在贫穷落后的农村生活的主流派(解放军和根据地南下干部)被严重的“农民意识化”,第一次进入现代化的大城市所发生的一系列现象,使陈修良十分惊讶!她痛心地看着,解放军进南京时完全忘记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传统和刚刚开过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的



解放初陈修良和沙文汉与女儿合影

“两个务必”教导。首先是争相抢占国民党中央机关和高级官员的好房子,高档家具和汽车等。南京宫门一带造的洋房特别多,还嫌不够,波及其他地区的好房子。尤其是有的干部以胜利者自居、盛气凌人、动辄训人等作风,不少官兵还不按规定购买车票,恃强乘车、购物,以及不购门票,强行进入娱乐场所;有些晚来的干部没有捞到好处,甚至伸手要住好房子、坐好汽车、骄横蜕化、铺张浪费。

三野因要东进上海,很快奉命撤出,继而跟进的二野,在“二野穷,二野苦”一片叫喊声中,抢占风更加激烈。一些人提出种种无理要求享受特殊待遇,干出不少更严重违反群众纪律的事。(陈修良未刊稿)有个别高级干部,甚至当着陈修良的面说:“一个人最好能讨两个老婆!”陈修良听后十分惊愕。当时还没有婚姻法,什么事情还不是他们说了算,一时间在南下干部中,出现了许多抛弃农村原配,追求城市新欢的“陈世美”现象。

针对这种情况,思想纯正、作风正派的军管委主任刘伯承在5月9日南京市政府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农民革命的首领洪秀全,他到了南京,脱离了群众,自己腐化起来,就失败了。我们干部一到南京,骄横腐化的现象已经在发生中,如有的同志在接管中以胜利者自居,盛气凌人,动辄叫人家‘伪职员’,随便骂人是‘洋奴’、南京公共房产占75%,本已多而漂亮,竟然有同志还嫌不好不多,住了这

院,又搬到那院;有的同志则丢了马要坐吉普车,现在又丢了吉普车要流线型轿车;有的同志不问政治条件只想在苏、杭娶妻,甚至有在舞场玩弄舞女夜不归营之事;有的带兵的人则不免显出骄横,不大听指挥的样子。这些是多么可怕的倾向啊!不要忘了我们的母亲是谁?敌人就隐蔽于我们的卧榻之侧,窥伺我们,挑拨我们使我们如何脱离群众,以便打倒我们。我们一定要警惕起来,与这些恶劣倾向作斗争,尤其作教育,丝毫不能放松让他们发展。”(《刘伯承同志在南京市政府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社通讯稿,载南京市委党刊《南京通讯》,第1期,1949年6月10日)

在市委会议上,陈修良表示赞成这个意见,并且组织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观看“闯王进京”戏剧。结果引起许多解放军和南下干部的极大不满,进而引起他们对原城市秘密党同志严重的打击和迫害。

4月25~28日,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总前委最高领导人先后来到南京。毛泽东亲自点将的宋任穷(当时任二野政治部主任)带着南京领导干部的新名单和200人的干部队伍,来到南京进行全面接收。28日公布华东局的决定,成立南京市军管会,主任由刘、宋两位书记兼任,陈修良虽参加了军管会,但如下这个名单正好反映了南京地方干部的实际地位。

军管会主要领导成员和下设机构:

委员兼主任:刘伯承

委员兼副主任:宋任穷

委员:张际春、江渭清、段君毅、陈同生、李达、柯庆施、徐平羽、罗士高、陈士榘、张霖之、孔从周、陈修良、周兴、黄华、刘宠光

秘书长:陈同生

副秘书长:李静宜

供给部部长:张友亮

外侨事务处处长:黄华

房地产管理处:第一处长:朱启鏊

第二处长:汤成功

财经接管委员会:主任 段君毅

副主任 刘峰 万里

交通接管委员会:主任 刘宠光

军事接管委员会:主任 孔从周

副主任 谭善和 邓有伦

政务接管委员会:主任 罗士高

副主任 林徽 齐仲恒

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 徐平羽

副主任 王明远 任崇高

公安部:部长 周兴

在总共37个职位中,原南京市委只有5人(下划线者),而且多为副职。(南京市军管会名单和南京市军管会各部负责人名单,1949年5月公布,存南京市档案馆)

进城后的干部配备,中央在1949年2月3日已早有准备:“如南京国民党不准备集中兵力守南京等城,我们可能于三月或四月占领南京。华东、华中调动集中及训练一万五千名干部的工作,应立即动手去做,并于二月底前去徐州集中待命。华北局所派一万七千干部在石家庄训练,交华东局率领随华野、中野向江南前进。哈尔滨、沈阳、唐山、天津、北平的城市工作干部,准备抽调相当数量去接收上海、南京、苏州、杭州诸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1949年2月3日,中央档案馆藏)也就是准备派出大量北方干部接收江南城市。这说明全国胜利前夕,中央早就决定了排斥原地方干部的方针。

解放南京给陈修良带来的极大振奋,很快被无数的困惑和谣言所替代。作为前市委书记和现组织部长的她被推到了会师后南下干部与地方干部冲突的风口浪尖。在管理城市的问题上,没有现代技术知识的农民出身的干部很难胜任承担厂长、校长、经济部门管理这种负责工作,当陈修良按照宋任穷的意思,把原地下党员配备担任副职以后,就有外来干部向上反映:“副职全是地下党的,想要与我们平分秋色。”

在南下干部优先已任命之外,还有些空缺的领导岗位,市委要求组织部提名,市委党委会会议上批准。陈修良根据党的干部标准,把一些经过考验的原市委领导人分配到政府和群众团体的领导岗位上。柯庆施等人就说陈修良搞“本位主义,任人唯亲”。

还有人暗中挑拨离间,说会师以后,南京地地下市委还在秘密开会。传到刘峰、朱启鏊同志的耳边,他们很奇怪,一再打电话给陈修良,要求面晤。陈说:“我恐因此更惹起是非,没有同意碰头,但谣言仍在流传,日子很不好过。”

陈修良以前在策反和情报工作中,曾经强调

为了配合解放军解放南京，“使战士少流血”，却被说成“言下之意好像地下党很有力量，可以不依靠解放军打进来，就能先解放南京。”（陈修良工作笔记）柯庆施在一次常委会上说：“过去地下党同志有一个口号叫做‘保管好工厂，将来就好当厂长’，那么说，你保护了总统府，总统就是你当了？”（陈修良《关于南京党的几个问题》，1969年6月4日，手稿）陈修良当场驳斥没有这回事，但邓小平却相信了。后来在南京全体干部4000人大会上，也当着大家的面，批评陈修良。

南下干部不相信原南京干部是真革命的，经常把原南京党的秘密活动视为是国民党“特务”工作，就经常跟踪后者，看他们是否与暗藏的敌人接触；有的未经批准在驻地抓特务，除上述错捕两个原秘密党员外，公安局发现一个为蒋介石接电话的党员，认为他是“特务”加以逮捕，经过了近30年，“四人帮”垮台以后这位同志才经流放地回到南京平反。人生的主要经历都在冤狱中度过。

一位原秘密党员由于工作出色，解放后当了公安局的邮政科科长。另一个南下干部不服气，千方百计找他的茬儿，有一次两人吵架，科长一发火，把枪在桌子上一拍。于是就造谣地下党员要“枪毙共产党员”。此事反映到市委，把这位科长当作反革命抓了起来。陈修良作了调查，认为是误会，不是反革命，应该批评教育。在4000人干部大会上，南下领导人又以此为例，说“一个公安局的科长，要枪毙一位共产党员，还不是反革命吗？”结果在接着进行的整党运动中，这位科长被整治得死去活来，自杀了。

胜利会师时，陈修良和秘密党的干部来不及换装，仍穿旗袍、皮鞋、西服。于是在解放军官兵中，流传起这样一个描述城市妇女的顺口溜：

头发是火烧的——烫发。

胳膊是摸鱼的——旗袍和短袖衫。

腿是过河的——小腿外露。

鞋是跌人的——高跟皮鞋。

有一次，陈修良因穿了一件有垫肩的外套，柯庆施竟然拍着陈的肩膀、当着许多战士的面说：“大家看看，这就是资产阶级服装。”故意羞辱陈修良。就这样，解放后的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陈修良和原南京地方的党员，即被围困在谣言四起的压抑环境

中，工作十分困难，思想极为痛苦。在全国解放前夕，为了与南下干部区别，党内出现一个新名词“地下党”。在建国后成为中共另类党组织的代名词，具有很强的贬义。历次运动中凡发现有“地下党”历史背景，可以成为审查和打倒某个人政治问题的充分理由，到“文革”时更是登峰造极。他们的逻辑是：凡“地下党员”如果没有成为烈士，活下来的就一定是叛徒或潜伏下来的特务（南京以外的一切城市工作的地下党员，无不如此）。所以可以先作为“叛徒特务”关押起来，进行打击和迫害，再进行审查。结果南京的地下党员2000人，后半生在历次运动中受尽屈辱和迫害，许多忠诚的同志，没有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却被害死在“红色冤狱”中。活到“文革”后获得平反的，也已无法挽回逝去的岁月。

对所谓地下党的集中整肃，在南京解放后很快到来。华东局第一书记于9月17日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召集了一次南京市支书及排以上干部党员大会（也称4000人大会）。会上的报告题目是《论忠诚与老实》，吹响了对南京地下党进行全面整顿（实为打击与迫害）的号角。

这个报告，在不作起码调查的基础上，以听信党内上述种种谣言为依据，推翻刘伯承所作的“会师是成功的”结论，竟说“南京会师不好”。而主要原因是原南京市委在淮海战役后，组织大发展，致使大量“反革命分子混进党内来”，造成南京党组织的严重不纯，报告为说明“大发展”，竟不顾事实把南京党员数夸大为七八千到一万人。报告还借用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的话说：南京党内存在着三种人：“一条心”的（与党一心一意）；“两条心”的（混进党内的破坏者，即反革命）；“半条心”的（包庇反革命的，组织上入党，思想上没有入党的）。把责任指向陈修良，说就是党内“半条心”的在包庇“两条心”的反革命。所谓“包庇反革命”是因为陈修良经过核实，认为那位与解放军吵架的邮政科科长不属反革命。报告说：地下党在解放南京问题上要与解放军争功。保护了总统府，就想当总统了！陈在会上当即递条子指出，所举事例，均属不实，却遭到讥讽训斥。

报告还用根据地及解放军的党是“大儿子”、地下党是“小儿子”这种封建继承制的定位法，说明从南京开始所有长江以南解放城市的领导班子，必须以前者为主，后者必须拥护和服从，否则

就是“不老实”。

在听完这个报告后，陈修良气愤得浑身发抖，同志们都散去了，她却坐在原地，站不起来。因为她无法与大人物平等对话，澄清事实，讨还公道，并且必须在会后，由她领导的原南京“地下党”进行集中学习和整顿，还要她作违心的动员报告，拥护这个报告，检查自己的“错误”。

整党开始不久，陈修良到北京出席亚洲妇女代表大会，接着又作为中国党政代表团派赴苏学习“老大哥”的治国经验。半年后当她回国时，看到了南京整党运动报告真感到触目惊心。

1950年4月在柯庆施主持下的南京市委，给中央和华东局的整党报告中夸大其词称：“地下党员近二千人中，淮海战役以后发展的约有九百余人；过去发展党的方针有偏差手续不严格，比较偏重青年知识分子，在旧警局人员及一般公教人员中过分放手；解放后又未坚决执行中央和华东局停止发展的指示，如电信局在解放前后几天突击，有一人一天发展八个党员，南大支部原只有二十九个党员（正式只六个），解放时发展到二百五十余个（九倍），因而必然带来了组织不纯的情况。”通过整党“严重的暴露了组织不纯的情况，学区系统（大、中、小学）已坦白反省参加过其他党派、社团、封建组织的有202人（全数822人）；工区535个党员中，地下党员占364人，其中有政治关节和历史关节的有200人；不按入党手续的253人。”（《中国共产党南京市委委员会关于整党学习情况给中央、华东局的报告》，1950年4月20日，打印稿）

所有这些所谓的有政治问题的党员，都被严肃处理，并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受到残酷的冲击。而在“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却未发现一个坏人混进南京党内。历史是公平的，但是这个公平又来得太晚了。几乎所有的原南京党员受尽各种屈辱与磨难，直至1979年后南京“地下党”问题才获平反。许多人已经含冤逝去。

公开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选中，对解放战争中其他战役，指示很多，很详细，唯独对渡江战役最少，只有一份。但他对南京局势最为关注。因为这关系到“建国大业”。他写出了“钟山风雨起苍黄”，为此，对解放后的南京局势，他极度关注：部队进城表现如何？解放军与他派的南下干部与地方党会师情况如何？“土八路”进国民党首都

这个大城市后如何管理？等等。当他知道解放军进城后像“闯王进京”，大行抢掠，甚至从“美国之音”中听到部队闯入美国大使馆，引起美国政府的抗议时，他怒不可遏。他绝不做“李闯王”、“洪秀全”。于是，除立即电令立即纠正外，全面总结了“南京经验”，经过精心策划，做出了以下两条重要决定：

一、必须整顿军队纪律，在南京以后解放的城市中，特别是下一个上海，必须使军队进城后秋毫无犯。

指示到达已在丹阳的总前委，陈毅在驻丹阳的部队中也了解到军队中确有如南京那样的情况。5月10日他在丹阳大王庙院子里向军队干部和接管干部作报告，严肃指出：“这种情形不搞好，到上海一定要天下大乱。”指出“我们野战军的‘野’，在城里不能‘野’！”吸取南京的教训，总前委和华东局还对部队进驻上海后的驻地布置、入城程序、入城纪律、涉外问题都作了周密部署和具体规定，还就入城纪律作了演习。真正做到“持军整齐，秋毫无犯”，军队进城后不进高楼大厦和民宅，而是露宿街头，获得中外舆论的一致好评，与解放南京形成强烈对比。

二、明确规定新解放城市的领导班子，必须“以南下干部为主”。陈毅把在上海坚持了十几年秘密斗争做出了极大贡献的上海局领导刘晓叫到丹阳，令其向尚在上海地下斗争的其他领导同志传达，必须绝对执行，并特别强调“地下党的主要任务是在配合与协助解放军，当上海解放后，地下党的任务即告结束”；“要真正从思想上使全体地下党员了解以解放军及解放区干部为主体的重要性，因为他们不仅有长期政权工作与接管城市的经验，而且他们多年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对政策有研究和了解。他们是我党政治影响的代表，他们代表着一种伟大力量”。反复叮咛：“解放军进入上海后……执行军管会一切决定……党的接管工作委员会，以军事代表为主任，并须坚决服从军事代表，此点万分重要，也须作思想准备，希特别注意。”（南京党史办编：《南京革命斗争大事记》，第426~427页，打印稿。陈修良保存资料）

5月23日，南京市委就会师问题向中央、华东局写了报告。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作为“正确处理”解放军和南下干部与地方党组织关系的经验，立即

转批给中共华中局和西北局：“兹将南京市委关于外来党和本地党会师问题的经验转发你们，请你们充分注意此项问题，务必抓紧指导，不要再蹈我党历史上对此问题处理不善的覆辙。”（参见《宋任穷回忆录》，264、265页）

从此，与“南下干部”相对的“地方党”、“地下党”这些名称随之迅速推广，并开始见于党的文件。这一大批出生入死冒险斗争并做出杰出贡献的战士，解放后重新被打入“地下”了。他们的命运就是几年前才被披露出来的“新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这份文件只发到当时的少数

大军区的领导人。以致在完全实行了这个方针，打击了绝大部分地下党员（实为党内有独立思想和民主观念的知识分子，并扩大到党内其他领域及党外知识分子）后，又经过了改革开放约30年后，看过这个文件的个别幸存者才披露出来。

在这一大背景下，为共产党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陈修良很快变成阶下囚，受尽屈辱、打击和迫害。

### 三

1950年6月，在苏联学习参观后的陈修良回到南京故地，看到了许多过去出生入死的战友在整党运动后的悲惨命运，悲哀又无奈。还看到她的副手组织部副部长（南下干部）给她整的黑材料（给华东局组织部的报告），如说“地下党对自己力量似乎估计过高，据说当初想依靠自力进行接收，后来客观情况与主观想象均有出入，认识分歧，思想纷乱，由是其开端……”陈修良感到非常委屈。（陈修良给华东局组织部的信，1950年9月，陈修良保存文稿）

这时，柯庆施已经成为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她不得不要求离开南京，来到了还有一些老战友在领导岗位上的上海市委。但在“新十六字方针”的阴影下，始终只能担任“副职”，而且频繁调动。虽然她并不计较职务高低，每到一处努力工作，调查研究、创造性地提出工作建议，而每到工作开始或获得成绩时，就被调任了。



“反右”前夕，女儿高中毕业全家三人在杭州最后一张合影（1957年春）

1955年，由于华东局撤销，沙文汉出任浙江省长，陈修良调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1955年春发生针对地下斗争领导干部的大冤狱“潘汉年事件”。省委书记立即在浙江省委干部会议上说：“我们浙江也有第二个潘汉年，大家要提高警惕性！”（陈修良回忆：《生活就是考验》1987年，内部印刷）接着就动用公安手段，对沙、陈夫妇进行监视、限制行动、削减工作等等。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经常到杭州，省委故意不通知沙文汉参加迎接。毛看了来迎接的人名单，就问省长为什么不来？回答是：“他身体不好，一般应酬不参加。毛很生气……”（史永给陈修良信件，1997年12月25日）

在1956年7月浙江省第一届二次党代会上，陈修良代表宣传口在大会上直言对省委的工作报告和下届候选人，包括省委书记工作作风的批评，沙文汉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党政分开”、不搞“以党代政”和要求“党内民主”的发言。据此，1957年陈修良被打成“极右派”，沙文汉成为党内级别最高的“右派”。

1957年浙江省委的这次“反右”运动，是毛泽东将“反右”运动从党外转入党内的重大步骤。柯庆施多次到杭州参与省委的“整风”“反右”会议，1957年12月毛泽东坐镇杭州指导，批准把在柯庆施帮助下写的省委工作报告在全国发表。

接着被批斗、抄家、降职、减薪、扫地出门，一家星散；陈修良被劳动改造，群众专政，受尽屈辱。1958年3月8日，三八妇女节那天，陈修良

被发配农村监督劳动时,沙文汉怕她想不开,鼓励说:“你以前长期在城市工作,很少有农村生活的经历。这次下去,就把它看作上一次农业大学吧,这样可以更深地去了中国的实际”;了解陈修良性格的刚烈,沙文汉还特别叮嘱:“我们今后遇到的情形可能会更坏,你一定要有思想准备。但是在任何困难考验下,我们要约定都不能自杀!”陈听后十分动容,眼里噙满了泪花,沉重地承诺:“我绝不自杀!”

此后,陈修良先后在农村和杭州大学,经过长达22年的劳动改造,“文革”被关进“牛棚”批斗,遭受许多磨难和屈辱,许多杭州大学的难友教授被冤死或自杀。1964年1月,沙文汉在冤屈中病逝,她却坚强地活了下来。

“四人帮”下台后,她的冤狱才开始平反。右派改正了,但是给沙文汉留下历史上有“政治问题”的尾巴。她又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几次冲破阻力直接向胡耀邦同志写信。1983年11月,沙文汉案终于获得彻底解决。

自从1978年1月陈修良右派“摘帽”,到上海开始了她生命旅程中另一个最重要的阶段。此

后20年她在为她和沙文汉彻底平反而斗争的同时,又以历史亲历者的身份,全力以赴为拨乱反正、平反冤案、还原长期被歪曲和掩盖的历史真相而奋斗到最后一息。她不仅为南京秘密党时期的历史平反,而且为大量的战友和部下的冤案平反作证。更为整个中共党史作证,提出研究中共党史不能脱离研究苏共斯大林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框架、批判那只归功于毛一人的“个人崇拜史”,只归功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起义史”,只有战争的“军事史”,全盘否定城市的政治、文化、社会斗争、群众运动、统战、情报、策反工作的“伪党史”。她参加各种纪念会,宣讲历史的真实情况,纠正种种传统观念。耄耋之年她长期生病住院,就在病床上写。不能坐了,就站着在窗台上写;不能执笔了,就口述录音。在生命的最后20年,还为后代留下了百万多字、涵盖了近70年的党史资料。她希望后人不能忘记历史,因为真实的历史是战胜愚昧、暴力、非理性的武器、是中国走向民主化和现代化的铺路石。■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黄 钟)

社科人文 文学小说 党建管理 经济管理 书画摄影

## 正规出书 约稿通知

**书稿内容:**(一)社科人文类书稿:回忆录、自传或人物传记、年鉴、社科著作等;(二)管理和学术类书稿:党建管理、行政管理、经济、金融或企业管理等研究专著;(三)文学类书稿:散文、诗歌、杂文、时评、游记、通讯等;(四)小说类书稿:历史、当代、言情、武侠、反腐等长篇、中短篇小说;(五)美术类:画册、书法作品集、摄影作品等。

**书稿要求:**书稿(作品)内容健康,艺术性强,底蕴丰厚,文笔流畅。字数为6-8万字以上,个人专著、多人合集均可,公开发表或未公开发表均可。

**出版发行办法:**以丛书形式或独立书号形式出版,以畅销书或合作出版方式运作;达到畅销书要求的,签订标准出版合同,按版税或买断方式支付稿酬;根据作品和作者意愿,面向国内或海外公开发行。其中国内公开发行的,由专业权威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查询。

全国免费投稿热线:400-680-8368

投稿地址:北京朝阳区八里庄东里3号654信箱

综合编辑部收;邮编:100025

电话:010-57733088、57733087、57733086;

传真:010-89506878;在线投稿:bookbj@126.com

联系人:伽悦、高晶、文馨(编辑)

新书欣赏、订购,请登录:<http://www.bookhk.net>

北京东方朝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代写个人传记、回忆录

- 专人为您代写个人传记、回忆录等作品
- 只要您口述就行了,其余交给我们来做

作为历史重大事件的见证者、亲历者,曾经刻骨铭心,曾经心潮澎湃。一幕幕、一件件,至今历历在目,难以释怀,成为一生中挥之不去的心结。

**把这一切忠诚的记录下来,著作成文字,留给后人,就可以世代代流传,成为历史长河中永不磨灭的记忆!**

专人代写、排版设计、出书,全程服务  
贴心服务,关爱之至——您省心、放心!

24小时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08-8708  
欢迎来人、来函、来电联系咨询或登录网站查询详情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8号朗廷大厦A-308 邮编:100024

电话:010-65735038 57192223 传真:010-85785578

邮箱:bookzj@126.com 联系人:汪芳、顾娜、牛萍萍(编辑)

网站:<http://www.zuojia.com>

北京东方朝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实践检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三个过来人对话录

○ 韶 华

“五一”节短假，文艺界的老朋友老齐和老范，来我家喝小酒。正在兴头上，忽然电话铃响了。讲了老半天，我把电话放下，老齐问：“什么事？老周！”我说：“是机关打来的。今年不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吗，机关要开座谈会，要我参加并且发言。”

“你去不去？”两人齐问。

我说：“我还没有定下，因为去了就要讲好话，我又讲不出来多少，所以我说，如果身体允许就去。”

老齐原来当过文联创作组组长，老范则是大学文学系教授，两人早就离休了，说：他们也接到了本单位这样的电话，70年了，还不大大庆祝一番呀。可是他们都说：“不想去，因为去就要发言，无非是‘光辉’的明灯呀，航行的‘灯塔’呀。讲些套话没有意思。”

我说：“我们现在纪念《讲话》，不能只是歌颂‘伟大’、‘正确’，更不能‘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的态度。对待《讲话》，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方法。对70年我们实践《讲话》的实际、经验、教训，要敢讲真话。检验《讲话》的唯一标准是：它是不是推动了文艺创作，是不是繁荣了我国的文化？”

老齐说：“老周，你想想，粉碎‘四人帮’后，在政治上，党中央作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明毛泽东晚年犯了许多错误，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定性为‘十年浩劫’和‘十年内乱’，给刘少奇等几百万个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可是对于他的文艺思想，还没有讨论过。老周，酒后吐真言，趁着酒兴，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都是过来人，可不兴说假话哟！”

我说：“那自然。我以为《讲话》的内容大体

上分为三个部分或者是三个关系问题：一，文艺和生活的关系；二，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三，文艺和人民的关系。《讲话》中文艺和生活的关系，是这么论述的：文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作家艺术家要长期到生活中去，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文艺家要深入生活，在生活中获取创作的素材。这个论断是正确的。”

老齐说：“你这么说，可也对，可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的‘阶级性’呢？《讲话》主要内容是文艺从属政治，为政治服务甚至为当前的政治任务服务。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说‘文化大革命’吧，它是最大的政治。1967年5月23日，正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人民日报》纪念《讲话》发表15周年题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明灯》。可见它首先是个政治文件，是‘文化大革命’的宣言书。文艺创作都要服从它。可是我们看看从属和歌颂‘文革’的作品，服务‘文革’的作品，像歌颂上海王洪文夺权的电影《一月风暴》之类，下场如何？所以文艺从属政治是错误的！”

老范急忙接过话题：“因为政治这个东西太变化无常：过去正确的，现在变成错误的了。过去批判的东西，现在成了歌颂的了。我们再大范围看看‘世界政治’的是非变化：中苏关系，上世纪50年代是‘老大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牢不可破的友谊’，后来变成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苏联垮台后，现在成了战略伙伴。再说中美关系，过去‘美帝国主义’是头号敌人，现在怎么说呢？好像成为共同管理世界的伙伴了。所以政治这个东西，是变非，非变是，敌变友，友变敌。近代历史上这种例子太多了。所以文艺不能绑在政治的战车上。”

老齐接着说：“再说经济上：经济当然反映政治。原来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现在否定

了；原来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现在也否定了。原来国有化是社会主义，民营即私人经济是资本主义，现在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已经占我国GDP的50%以上了，怎么说呢？”

我说：“我举个小例子：我有一位作家朋友，写了一部歌颂‘文化大革命’的小说。反面人物是走资派，正面人物是造反派。作品刚写完，‘四人帮’完了。于是作者把反面人物和正面人物调了个个儿，反面人物是造反派，正面人物是老干部。人们把这类作品叫‘改组派’，给文艺从属政治、服务政治开了个大玩笑。”

老齐说：“文艺作品一从属政治，作品都是短命的。如：配合‘三反五反’运动的作品，运动一结束作品的生命就完了。写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作品，歌颂工商业改造的作品，现在还能发表吗？王洪文在上海夺权后，立即有电影《一月风暴》出笼。还有讽刺知识分子‘走白专道路’的《苗苗》……凡是服从政治，配合运动的作品，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不少作家朋友说过：我人没死，作品死了！”

我忽然想起一个比较典型的文艺服务政治的例子，说：“我们辽宁省在毛远新掌政时，‘文化大革命’已经搞得经济濒于崩溃，买生活用品的票证达40多种了。人民生活极端困难。为了证明经济大发展、大繁荣，发明了‘哈尔套大集’。由政府下令，对农民摊派任务，让他们扛着鸡蛋，抱着鸭子，牵着猪、牛、羊等副产品，敲锣打鼓披红挂花去赶集。你可别以为在大集上可以买到生活用品，太天真了。因为各个公社都要推广大集，大家一商量，这些产品，今天到你这个公社赶，明天到我这个公社赶，牲口是公家的，谁也不爱护，不喂草，赶来赶去死了不少。可是创作了电影《到处莺歌燕舞》，在全国放映。可笑不可笑？”

大家都笑了。我又想起了一个文艺从属和服务政治的新鲜例子，说：“不久前重庆作家们紧跟政治，歌颂唱红打黑，宣传‘重庆模式’。据说几部重头作品已经‘杀青’了，不知道怎么出版！”

老齐说：“刚才说的是作品。我们再看看文艺从属政治的作家、艺术家们的命运：从1951的‘三反五反’，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了大小运动50多次。文艺界打出了多少反革命和反

党集团呀！‘胡风反革命集团’、‘丁陈反党集团’、‘罗舒白集团’……不少人进了秦城监狱。”

老范插话：“‘文艺作品要创造各色、各样的典型人物’是创作的常识。可是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1962年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提出，‘也可以创造中间人物’，当做‘中间人物论’被批判了好几年，人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至死。这也是‘文艺从属政治’的一个典型恶果。”

我接着他的话：“我们还可以看看30年代老作家文艺从属政治之后的创作：按习惯次序排列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新中国建立后，他们都是虔诚相信《讲话》，也努力实践《讲话》的。鲁迅死了，不说他。可郭老没有写出《女神》，他的诗，我只记得：‘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两句……茅盾在解放后基本没有写什么文学作品。曹禺配合政治的热情很高，在三年大饥荒时写了《卧薪尝胆》，为团结少数民族，又写了《昭君和番》，再也没有达到《日出》和《雷雨》的艺术水平。老舍写了《龙须沟》，也没有超过《骆驼祥子》，还在‘文革’中自杀了。不是他们没有才能，也不是懈怠，而是从属政治、服务政治的结果。”

老齐说：“上世纪60年代初期，李建彤写了一部小说《刘志丹》，是歌颂陕北革命历史的。毛泽东一句话：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除作家被开除党籍，监督劳动外，原来陕北的领导人像习仲勋、刘景范，也都遭了殃，许多西北解放区的老干部被打成反党分子。这个冤案株连了好几百人。”

老范说：“和文艺从属政治相关的，是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问题。歌颂光明，暴露黑暗，也是文艺创作的常识，可是从1957年‘反右派’以后，连相声《买猴》讽刺‘粗枝大叶’的‘马大哈’，也被当做‘攻击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马三立被定为‘右派’。再一个是文艺的‘阶级性’问题。文艺的阶级性也经不起推敲。中国的古典四大名著，是属于哪个阶级的文艺？能推到封建文艺的被告席上吗？俄罗斯的托尔斯泰，法国的巴尔扎克等，他们的作品可以列入资本主义文艺吗？我国建国之后翻译了那么多苏联的作品，都是修正主义文艺序列吗？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

传统文化都打成了‘封’，外国作品都打成了‘修’和‘资’，即‘封资修’，连《四郎探母》这样的传统剧目，也打成了“汉奸戏”，尘封多年。”

老齐说：“在‘文革’中，只剩下八个样板戏。那时，每年‘5·23’开庆祝会纪念《讲话》，庆祝文艺丰收。结果呢？电影院、电台、电视、戏剧就那‘八个’。每次开完《讲话》的庆祝会，演出和放映的节目，演的还是‘八个’，人们看烦了，发了票，人们不去，接着是发票记名，带号码。收票后谁来、谁没来，一查便知。这是对《讲话》的‘态度问题’。后来把看样板戏当成‘政治任务’，甚至改用开演后把大门上锁的办法，不让人们出去，强迫审美，想来有些好笑。”

我忽然又想起一个例子，说：“到1972年，‘文革’搞了六年，出版社没有出过什么像样的文艺作品。于是全国开了出版工作会议，号召大家写书、出书。于是郭沫若的《李白和杜甫》应运而生。书中把李白吹捧了一番，按‘阶级分析法’，把杜甫定为‘小地主阶级’的代表。我真不明白，郭老是怎么想出来的呀！”

我们三人一起大笑起来，这虽然是个悲剧，但我们笑得很开心。

老齐接着说：“‘文革’期间，由于没有书看，人民精神饥饿，一个文艺爱好者，写了一部《第二次握手》，在群众中大量传抄。公安部门立案侦查，结果查出是湖南省一个叫张扬的青年的习作。于是根据‘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的‘最高指示’，判了重刑。如果不是粉碎了‘四人帮’，作者恐怕性命难保。”

“唉……”我们三人叹了口气。

老齐接着问：“现在还常常演样板戏，样板戏是什么？你们怎么衡量样板戏？”

老范想了想，说：“如果单独评说这些作品的艺术水平，大体可以入流。但样板戏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台锣鼓，是‘文化大革命’的伴奏曲，是江青夺权的资本。”

我又说：“样板戏出笼后，还有一套创作必须遵守的‘原则’，也太滑稽。那不都成了‘仿作’了？创作中要‘三突出’，都是哪三突出？我不记得了。”

老齐说：“所谓‘三突出’即创作中第一要突出人物，突出人物中，要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

物中，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还有‘三结合’，即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还有‘主题先行’等。领导为你想好主题思想，你按照主题，编个故事去图解主题。写工业的格式是：厂长犯错误，书记来帮助，老工人忆苦，揪出狗特务。写农业的格式是：主任犯错误，书记来帮助，老贫农忆苦，揪出狗地主。你不照这个模式写，就是否认阶级斗争。主人公要：身穿红衣裳，站在高坡上，伸手指方向。前几天电视台播放过一个节目，是电影《海霞》的编创人员的回忆录。因为他们没有遵守‘三突出’原则，受到批判斗争。如果不是粉碎了‘四人帮’，编创人员，会被打成反革命的。可怕不可怕？”

我说：“在文艺和人民的关系上，《讲话》当时提出的是为工农兵服务，在战争年代，这么说可以理解。现在除了工、农、兵，还为谁服务？全国城市五亿市民，四亿学生，两亿农民工，大大小小企业家几千万个，合资的外国企业也有几百万职工，他们算不算人民？现在如果说为全民服务不错？为精神文明服务，为文化建设服务，为提高道德水平服务，为提高我国的软实力服务，对不对？”

老范说：“还应该讲清一个问题：到了1956年——也就是《讲话》14年之后，《讲话》有了发展，就是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本来是对的，可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后，闹得万马齐喑，只有一家独放，一家独鸣了。还有，建国不久有人已经感到‘文艺从属政治’和服务对象有些问题了。所以改为‘为人民服务和社会主义服务’。正常的说法是‘双百方针，二为方向’，‘文艺从属政治，服务政治’是很少提了。但这么重要的问题，模模糊糊，很多人没有细想，也没有深入研究过这个问题，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老齐说：“一种文艺思想、文艺理论对不对，要看它在实际中是推动了文艺的发展？还是阻碍了它的发展？咱们现在想一想，《讲话》70年来，我们有哪一部作品，可以作为文化遗产留给后代呢？……”

我们想了半天，想不出来。……

三个人且喝且谈，都非常高兴。直到很晚他俩才告辞。

睡了一觉，忽然想起了我们这次谈话的内容

很有意思。觉得在文艺这条线上,对于毛泽东思想,还没有人这么说过。我根据回忆,整理出这篇稿子,打电话问他们可不可以发表,他们说:“你看着办吧。”

我问:“你们没有余悸,不怕再挨批呀?”

他们说:“我们已经都当过右派了,再当一次无妨。”

我说:“如果我们为这次谈话再挨批,网上一炒,立马会成为国际大笑话!过去我们三人有点小名气,如果有人这么一批,我们三个就出大名了!”■

2012年5月2日—10日于沈阳金秋医院

(作者为中国作协书记处前书记)

(责任编辑 黄钟)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长河孤旅: 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	赵 诚	38.00	6.00
孤舟独树	康国雄口述 何蜀整理	38.00	7.00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	托洛茨基著 施用勤译	58.00	8.00
敬畏民意: 中国的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	俞可平	45.00	7.00
邓小平时代: 中国改革开放纪实	杨继绳	35.00	7.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锐著	29.50	7.00
苏北利亚	于 疆	22.00	6.00
转折: 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吴思 李晨主编	36.00	6.00
起点: 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吴思 李晨主编	36.00	6.00
亲历记(一)(二)	吴思主编	58.00	11.00
天下得失 蒋介石的人生	汪朝光等	42.00	6.00
中山舰事件: 国共关系史上的秘案	张聿温	32.80	6.0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119.00	12.0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150.00	12.00
国家记忆(一)	章东磐	98.00	10.00
国家记忆(二)	章东磐	88.00	9.00
可操作的民主	晏 欢 寇延丁	28.00	7.00
红墙医生: 我亲历的中南海往事	袁天鹏 王 凡	36.00	7.00
张学良遗稿: 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	东 平 窦应泰	38.00	7.00
西安事变新探: 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杨奎松	48.00	8.00
走出腐败高发期	高 波	58.00	8.00
邓小平访美那九天	陈天璇	32.00	7.00
官场怪圈定律	李茗公	46.00	8.00
黄埔恩怨	王晓华 张庆军	38.00	6.00
国共往事风云录(全四卷)	尹家民	146.00	14.00
我想重新解释历史	吴 思	28.00	7.00
求索中国: 文革前十年史	萧冬连、谢春涛等著	88.00	10.00
读史求实	杨奎松	38.00	7.00
历史的碎片: 侧击辛亥	张 鸣	26.00	7.00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	金冲及	128.00	12.00
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全五套)	北京电视台卫视频道《档案》栏目组编	144.00	14.00
母亲杨沫	老 鬼	45.00	6.00
血色黄昏	老 鬼	39.00	6.00
血与铁	老 鬼	39.00	6.00
烈火中的青春: 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	老 鬼	38.00	6.00
1911-1912 亲历中国革命	埃德温·J·丁格尔	36.00	7.00
亲历民主 我在美国竞选议员	龚小夏	28.00	6.00
天安门: 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史景迁	19.6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 锐	22.80	6.00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杨继绳	42.00	7.00
通往立宪之路	刘刚 李冬君	60.00	8.00
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张木生	58.00	8.00
1943 一盆红红的火(谢韬日记选编)	谢 韬	49.00	8.00
高岗传	戴茂林、赵晓光	59.00	7.00
西路军——河西浴血、生死档案、天山风云	冯亚光	126.00	12.00
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南泉黄宗良等	246.00	20.00
走向革命: 细说晚清七十年	雷 颐	29.80	7.00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	88.00	10.00
何方谈史忆人: 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	何 方	39.80	7.00
望九琐忆——一位老者的20世纪	白永达	22.00	6.00
底层的叩问——肖复兴人生笔记	肖复兴	25.00	6.00
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内部发行)	乔云华	58.00	8.00
共和国大审判(二)——特别法庭内外纪实	王文正口述 沈国凡采访	38.00	7.00
大国悲剧: 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49.00	8.00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	金以林著	48.00	8.00
红墙知情录(一、二、三)	尹家民	95.00	10.00
历史: 何以至此	雷 颐	28.00	6.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6.00	7.00
三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四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解读 I	杨天石	60.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解读 II	杨天石	38.00	6.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54.00	9.00
牛棚杂忆	李季编	29.00	7.00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	林贤治主编	38.00	7.00
历史大转折中22个首任省长、市长和自治区主席纪实	孟庆春	49.80	7.00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	侯井天	98.00	11.00
1957年的夏季: 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 正	26.00	7.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克 李锐 龚育之等	28.00	7.00
流逝的岁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回忆录	李新著	39.00	8.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5.00

## 代购代邮

《转折》《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本书的文章是从《炎黄春秋》杂志中精选出来的, 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中的重大事件, 本书作者中的很多人参与了改革以来重大事件的决策, 这些文章让读者充分了解过去年代有意或者无意掩盖的历史真相。

《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本书是我国学者在苏东剧变后对苏联亡国、苏共亡党的深度解读与反思, 力图回答人们所关心的101个重要问题。由阎明复和李凤林作序推荐!

内容要目: 列宁是怎样认识与发展党内民主思想的? 斯大林是怎样控制意识形态的? 斯大林模式是怎样形成的? 斯大林是如何破坏党内民主的? 斯大林模式移植到东欧的后果是什么? 究竟是何种制度性因素导致苏共垮台? 苏联特权阶层形成的原因及对苏联剧变的影响是什么? 苏联最高权力是怎样交接的? 苏联共产党是个什么样的党? 苏共党内实行怎样的监督机制? 苏联人为何“不珍惜”苏联? 戈尔巴乔夫缘何要对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 我们应该从苏联剧变中汲取什么教训?

《亲历记——第一辑、第二辑》: 本书的文章精选于2000—2009年《炎黄春秋》杂志“亲历记”栏目, 作者们曾经是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他们以自己的角度, 忠实的记录下历史, 读者可以从文章中对当时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作出自己的评判。

《走出腐败高发期》: 本书以17世纪的明朝、18世纪的英国和19世纪的美国三个腐败高发期为样本, 通过大量的案例, 生动而深刻地剖析了腐败高发期的特征、类型和阶段, 提出了治理腐败的途径。

文章要目: (1) 顶层腐败——空心化的权力核心; (2) 官员蜕变——不负责任的“执政团队”; (3) 政策失败——掠夺性的财税政策; (4) 体制衰败——逆淘汰的公职选拔; (5) 社会颓败——两极化的“消费世界”。

如果说腐败是导致明王朝被农民起义和后来金政权“破产清算”的罪魁祸首的话, 那么, 为什么英国和美国却在腐败高发期中实现了改革重组和大国崛起?

或许能给我党的反腐工作一些启示吧!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 100045 收款人: 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 邮购三本书以上, 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炎黄春秋QQ在线: 2368298257

# 怀着青年时代的共同理想

## ——悼念彭迪

○ 穆广仁

7月1日,彭迪走了。走的突然,似乎又在意料之中。6月中旬,打电话相约,打算到他的住所看望。钱行接的电话,说彭迪并没有大变化,约见时间另定。事后他女儿小红告诉我,那几天他的病情突然变化,没有如实告知母亲,以免增加她的精神负担和痛苦。

对我来说,彭迪的离去不只是唏嘘、孤零、悲伤,更是更多的承担。他有很多想做的事没有做完。

第一次结识彭迪,是1961年在日内瓦。新华社派了一支庞大的记者队伍,去参加“关于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简称“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报道。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这次大型的国际会议期间,要训练一批驻外记者队伍,新华社应当把此事当做走向世界的一次大练兵。

中国记者团团长是吴冷西,负责新闻报道和评论的是彭迪。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14个国家,17个代表团。中国代表团团长是陈毅外长。老挝有3个

代表团(苏发努冯、富马、文翁等3个亲王各率领一个代表团)。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和评论员不下2000人,其中不乏像索尔茨伯里、托平等资深名记者、国际评论家。

我是调来新华社不久的一个新兵。其时,由于我在国际部东方组分工印度支那(包括老挝)地区的报道,就被列入记者团队。这是我第一次被派到国外当记者,无论是政策水平、新闻业务、涉外经验、外语水平,都根本不够格,也只好硬着头皮,抱着一个学习态度上阵。

此前,只知道彭迪是新华社首批驻外记者中的佼佼者,曾任雅加达分社、伦敦分社的首席记者、社长,其他并无所知。在日内瓦的国际会议新闻中心大厅里,目睹彭迪和西方的名记者们侃侃而谈,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各国各界人士、名流之间。当时,对彭迪那样的高手,我只有高山仰止之份,自感“混迹其间”之愧。

会议每天各国代表发言的报道,由钱行以代表



1961年中国记者团合影(在新华社日内瓦分社),第二排右四为彭迪,第三排右四为穆广仁

团工作人员身份在会议厅内写成,跑出会场交予我们编辑,发往北京总社。而评论则由彭迪负责。

熙熙攘攘的新闻中心大厅,是各国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互相交流信息、搜集情报的中心。每天晚上,新华社记者们将采得的信息,集中起来向代表团汇报;吴冷西在代表团驻地(华山别墅)听取代表团讨论的意向、对策,然后回到记者团驻地(新华社日内瓦分社),向记者团吹风,并且出题目,要求记者写评论,并且在当天夜里写成、发出,并指示彭迪的稿件由他审阅,其他人的稿件由彭迪审阅。

开始,评论由彭迪、言彪(伦敦分社记者)二人轮流撰写;后来让我也参加写,既是有意练兵,也是为了稍微减轻他们二人的负担。我注意到,彭迪除了在新闻中心获取第一手的信息外,每天都要到报摊上买回大量西方各国的大报,从中了解各国的动向;他的文章不是按照代表团的意向“自说自话”,而是在表述我国对外政策时,利用西方传媒的材料,使文章更加生动、视野开阔,更有说服力。这是我学习撰写国际评论的第一课。

彭迪文章的“高价值”期,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任驻美国记者的那几年。美国制定《与台湾关系法》,大量向台湾出售武器,政府和媒体极力鼓吹“一中一台”、“打中国牌”、“不放弃(台湾)老朋友”等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彭迪发表多篇文章,与《华尔街日报》和一些反华谋士展开论战。其中一篇题为《泱泱大国 却不知道谁干涉了谁的内政》的评论,震撼了美国国务院。据从美国回来的友人说,从此,彭迪的文章成为美国国务院的必读文件。这些文章尖锐泼辣,幽默风趣,生动精彩,引人入胜。它们成为我学习的榜样,其间,我乃追随其后,撰写了反击美国媒体的若干评论。

从华盛顿分社卸任回国后,彭迪仍在新华社总编室工作,任副总编辑。从国际部到总编室,我一直在他的领导下学习和工作。

1989年春夏之间,发生了“政治风波”。暴风骤雨之后,每个人都被要求写一份“反思”(检讨)。彭迪交了卷之后不久,怀着我所不知的心情,偕同妻子钱行离开了祖国,在美国寄居了几



穆广仁与彭迪(右)

干年后,2003年无语地回到北京。

他俩回到新华社黄亭子宿舍原来的居所。一天,我拜访了他们。彭迪问我这几年国内的情况。我坦然回答:这几年还是有进步的,尽管进步极其微小。现在人们可以在家里私下发些议论,发点牢骚,不必担心又闯下大祸了,但只限于私下。比之疾风暴雨的政治运动年代,这当然是极其微小的进步,然而这是千千万万中国人以血和泪的代价换来的。

我敢于以这样的坦率回答他,是因为那几年我与友人合作编写《红岩儿女》这部书(一部记述解放前中国青年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史书)的过程中,解读了彭迪、钱行在燕京大学读书时的革命生涯。他们是上世纪40年代参加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独裁斗争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先驱。他们上了红岩,又转赴延安。他们既是红岩一代,又是延安一代。

《红岩儿女》第一部中,引录了彭迪、钱行40年代在燕京大学生活的自述。自述的大意说:燕京大学在北平的时候,若干“相互信得过的学友”组成一个秘密的小团体“Saturday Group”,在一起谈论时局,对国家民族前途深怀忧患意识,迫切要求抗日、民主。燕大西迁成都后,这个小团体恢复了活动,吸收了新成员。他们经常在英籍教授、地球物理学家赖朴吾(Ralph Lapwood)家里聚会,教授给他们讲述他在华北抗日根据地所见所闻,阅读他从根据地带回的书报杂志,一起讨论战局和政治形势。他们的活动引起三青团分子的注意,并受到威胁和警告。在日益险恶的

政治形势下,这个小团体被迫自动解散。其中一部分人参加了“民协”,另一部分人组成一个更加秘密的组织“创造社”(Creative Team,简称CT)。

在成都,燕大进步同学分别组成名称不一的“团契”组织,以基督教青年会“团契”的形式展开联谊活动,这些团契逐渐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大团契。彭迪是这个大团契的领导人之一。

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日趋高涨,成都各大学的进步分子感到,分散的小团体各自为战,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在成都的9个大学的进步学生(包括隐蔽的、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自发地在校际间互相联系。谢韬(当时在金陵大学读书)在回忆中说:“形势逼人啊!朋友们碰面,都说该实行大联合了。”就在1944年秋天的一天,他们聚集在成都市北的文殊院,经过热烈讨论,成立了“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推举与红岩(中共南方局驻地)有联系的王晶堯为临时负责人。不久,彭迪、卫永清、李慎之、张定、于明、赫鲁、石泉等,成为“民协”的第一批会员。

这期间,彭迪、钱行一直在寻找和中共地下党的联系,迫切希望直接参加抗日工作或者到延安去。1943年钱行收到她哥哥钱应麟从延安发来的一封信,以隐秘的语言要她去红岩找刘昂(钱之光夫人)。1944年,他俩去重庆,上了红岩,转赴延安。后来知道,延安需要外语人才,经周恩来同意,才把他俩调去延安的。在延安,他俩都在新华社从事外电翻译和对外新闻报道工作。

看来,他们没有赶上延安的整风和“抢救”运动。他们抱着建设一个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的理想而奔赴延安,全国解放后,仍然为着这个理想勤奋地工作。在新华社和彭迪一起工作的同事的心目中,彭迪一直是个谦虚谨慎、勤勤恳恳、平易近人的好党员、好领导。他从来没有炫耀过奔赴延安的金牌经历,没有把“延安一代”当做傲人一头的资本。更重要的是,在共和国历经一次次政治运动的磨难后,他保有着清醒的头脑,保有着当年参加革命时忠于信念理想、热爱自由民主、勇于独立思考的精神。

从美国回国后的几年中,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耄耋老人,他不辞辛苦地在电脑上写作,参加知识界的时政研讨会,为中国的宪政民主、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与意识形态上的拨乱反正,大声地

呐喊了。

彭迪是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这些普世价值的维护者。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改革开放以后,开明的党的领导人对国际公认的普世价值观如个人自由、政治民主、尊重人权、人道主义等公开正式加以肯定。但实际上还有许多人忧心忡忡,唯恐中国人染上被他们当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病毒,担心他们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受到损害。他们把这些普世价值视为与中国特色不能相容的“西方异物”,一概加以否定。彭迪说,其实,主张接受普世价值的人们,并非主张完全照搬西方,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不矛盾。

彭迪在一篇文章中说,邓小平1980年在总结文革的历史教训时指出,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实行,容易造成个人专断,过去的总病根就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但是这个教训并没有为某些领导人所理解。彭迪说,“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而实际上一切重大问题都是由党做决定,人大听命。我当过全国人大代表,深有体会。”他说,一些老一代革命家(如任仲夷等)和知识分子认为,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不只是集立法、司法、行政权力于一身,还包括党政军民、经济、文化、教育、思想等各个领域。这种权力的集中造成某些领导滥用职权、贪污腐化,任其发展下去,贻害无穷。

彭迪建议改进党的宣传工作。他的一篇评论说:“作为一个60多年的党员和记者,也算得上是个宣传工作者吧。我想对党的宣传工作提点改进的意见,希望大家批评指正。”他说,“党中央十七大正确地做出决定,开始解决停滞不前的政治改革问题,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党的宣传工作面对一个改革开放的社会,应当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他认为,首先,要放宽舆论,不能要求全国“舆论一律”。发表不同政见是公民的权利。13亿中国公民只许有一种声音,不仅是违反宪法,实际上也办不到。其次,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宣传报道的基础是事实,应该客观全面如实及时反映真实情况。但实际上我们的宣传往往没有严格恪守这个原则。他说,“我本人在新华社总编室处理稿件时,深有体会。多年来,我们强调以政治需要作为‘舆论导向’,作为新闻报道的取舍原则。”他举例说,二战

# 陈翰笙的五个细节

○ 高 放

田森教授历经七次修订,最后完成了题为《国魂——三个世纪的陈翰笙》的传记。田森与翰老有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深交,该书除了给予读者以人民革命家、人民外交家、社会活动家、社会科学家和人民教育家这样五重名家、大家的鲜明形象外,还写到了翰老的诸多细节。尤其是以下五个社会上鲜为人知的细节,是常人难以做到的。

第一,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展后,他对整天不工作,只搞政治运动很反感,敢于提出:“右不好,要反右,搞‘左’了也不好,为什么不反‘左’呢?”他明确表示,不同意搞“反右派”斗争。为此他遭到猛烈批判,险些被划为右派分子,幸好得到周总理保护过关。可是当他所在的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南亚组组长陈洪进被划为右派分子,在大会上遭到批斗时,他却敢在大会上挺身而出为之辩护说:“你们在发言中列举的他的所有错误言论,没有一条不是从我这里听说的”,“你们把他打成右派是很不公正的,还不如把我打成右派更好。”

第二,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运动。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常到下边视察,了解到各地虚报产量的情况。他敢于逢人就说:这不是大跃进,而是“大跃井”,意即自己往井里

猛跳。知情知心者都劝他少说为好,不要再去“捅娄子”。他反而强调应该人人敢讲真话,才能使我们的事业进步得更快。事情发展到研究所所有的年轻人公然贴出大字报说:他在一天之内把一份英文日报一年之内的报纸通读了一遍,并且已经圈选完毕。这无非是想作为研究所工作“大跃进”的大喜报来宣传。翰老看后却敢于贴出自己撰写的小字报,来批驳这张大字报所说之事绝不可信,一针见血指出:这不是大跃进,而是“大跃井”。他这张小字报贴出后,遭到众多大字报围攻。他泰然处之。

第三,“文化大革命”风暴骤起后,他这位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打进国民党活动的老革命,就因为与国民党C.C.派头子陈立夫有过交往,居然被打成国民党特务加以批斗。他一身正气,决不低头。还由于他与第三国际有长期联系,有人硬逼他交代共产党叛徒的名单,他宁愿自己受辱受苦,决不胡说半个字。造反派甚至逼迫他这位70岁高龄的老人跪在冰天雪地里好几个钟头,甚至对他动手挥拳,他也是威武不能屈、宁死不胡说。连党外著名作家萧乾眼见这种真情后都惊奇地赞扬说:“他是我心目中最神圣的共产党人!”

第四,“文革”后期他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

后西方国家从恢复到发展,进步很快,我国被远远抛在后面,但我们那时的报道则是大喊东风压倒西风,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西方一天天烂下去。有相当一段时期,我们的宣传对外国人民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民主,都当做敏感事件加以控制;对美国宇航员首次登月,水门事件,根本不予报道。这种处理,反映了主管宣传者欲掩盖事实、蒙蔽人民的主观意图,是对人民缺乏信心的表现。再者,宣传工作,作为公众舆论,负有批评和监督政府官员的职责。可是我们一些政府官员,把媒体工作者当做他们的下级,喜欢恭维奉

承,不愿听取刺耳忠言,甚至压制批评。

在和彭迪的交往中,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有青年时代的共同理想,都在南方局(红岩)的指引下参加了当时的地下组织(成都的“民协”、重庆的“新青”),入党后都长期在新华社工作。因而他既是良师,又是挚友。有些问题,我要经常向他请教;我们写的某些文章,常作为“未定稿”互相交换。永远的遗憾是,在他生前最后的日子,没有实现最后的约见。(2012年7月15日)■

(作者为新华社原副总编)

(责任编辑 黄 钟)

后,他自己主动找工作做,在家里办起了英文讲习班,给愿意学习英文的青年人尽义务讲授英语。知情上门求学者越来越多。有一天有两个素不相识的女孩子登门拜访,也想参加学习,她们如实自称是刘少奇的女儿。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已经早被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永远开除党籍。当时许多人都是为了避嫌而不愿与“黑帮”的子女接近。可是翰老不怕自己被株连,为刘少奇的两个女儿补习英文。翰老这样做,当时确实遭到不少人非议,说他与大“黑帮”子女划不清界限,甚至由组织出面要他交出跟随他学习英文的学生及其家长的名单。连他胞妹也劝他尽快收摊,可是他依然我行我素。直到1979年9月,这时刘少奇尚未获得平反,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专门登门拜望翰老,对他雪中送炭教她女儿深表由衷感激之情。他却敢于对王光美细说:“刘少奇不是叛徒,应当早日为少奇同志平反。”事过半年后,即1980年3月党中央才公布了为刘少奇彻底平反的决定。

第五,“文革”中发生的种种绝灭人性的惨剧,使他逐步认清了江青之流祸国殃民的罪行。

然而在许多人当时敢怒不敢言的恶劣环境中,他却不顾个人安危,也不怕别人揭发,敢于直言不讳大骂江青。1975年1月19日下午翰老到田森家去看望他,两人正交谈热烈之时,忽然翰老用劲往痰盂里吐出了一口吐沫,连声说:“呸!呸!呸!好一个臭妖婆江青!”主人好意劝他压低一下嗓门,以免院外别人听见,可是他依然气愤难抑,历数江青罪状,破口大骂不停。他不仅私下里骂,而且还敢于在党小组会上指名道姓公开批评江青。不少人都为他捏一把冷汗,为他如此坦荡直言而深感忧虑。历史上有很多人很多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聚会,以各种方式为争取国家民族解放和自由民主而奋斗。翰老也敢于直抒胸臆,吐露心声,他在那天与田森同志分别前,紧紧握手说:“我真想在天安门广场上献出我的身躯,只要能唤起人们的觉醒。”

从上述这五种细节小事可以看出翰老的政治嗅觉非常敏锐,思想境界非常崇高,革命气节非常自重,助人愿望非常浓烈,所以他在关键时刻每每都会敢讲真话,见义勇为。■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黄 钟)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Hearing Aids

服务热线:010-84608877

SW 声望听力

www.sw-tl.com

请认准西门子听力集团授权证书 西门子听力仪器(苏州)有限公司

数字型耳背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0第2460986号 数字型耳内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0第2460987号

注:请认准西门子标识/请详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苏医械广审(文)第2010040048号

# 美国政党的轮流执政与司法独立

○ 董郁玉

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治架构中,司法独立是其支柱之一。美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表明,司法独立,对美国政治制度的稳固,对竞争激烈却从未失序的政治权力交接,进而对社会公正和正义的促进,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美国的制度框架下,司法独立最重要的体现,就是美国最高法院所具有的司法审查权。这种权力,既是美国司法体系制衡行政当局和立法机构的根本所在,也是其保持独立性的根据所在。然而,说到独立性,美国最高法院的那些大法官们,从来就不是上帝派来的怀揣着一颗公正之心而降临世上的天使。相反,他们都是食五谷杂粮、现喜怒哀乐、受经历影响和有利益倾向的普通人。尤其是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下,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由出自政党的、担任联邦最高行政长官的总统提名,而由最高立法机构听证通过的程序,更是对法官、对司法机构的独立性构成了制约。

由此,人们完全可以发问,在这种政党、权力和机构的相互制衡中,法官和司法机构的独立性还能存在吗?或曰:在这种相互制衡所给定的独立性下,法官和司法机构做出的裁决还能称得上是公正的吗?

从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看,正是在政党政治趋向极化的进程中,其独立性也在日益强化,同时对行政当局和立法机构的制衡也在加强。大体而言,历任美国总统,如果在其任上能够得到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机会,大都会选择与本党政治倾向一致的人作为候选人。并且一般而言,最终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也都会不负“党望”,在相关法律决定中,采取与其政党相一致的立场。

但是,大法官的司法决定,并非只是其政治倾向的法律化,而其实是受制于法官本人的专业知识以及职业操守的;社会公正和正义,始终是牵制和制约大法官的个人党派倾向的最重要力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曾说他:“我制造了一个傻瓜。”

量。此外,在美国建国200多年的历史中,最高法院历任大法官的总人数仍在屈指可数的范围内,大法官的声誉及其法律地位,是每一个有幸获得这个职位的人所首要顾及的问题。这种出自于“自私”的考虑,也同样是促使大法官尽可能地最少偏见、最多公正的动力来源。

最近的例证,就是在美国被万众瞩目的有关奥巴马的医疗法案的判决了。6月28日,美国最高法院做出判决,认为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医疗改革法案的主干部分并不违宪。这个判决,是对出身民主党的现任总统奥巴马极为有利的司法结果。而为此判决投下决定胜负一票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却是由出身共和党

的前任总统布什任命的。

当然,上述这个判决,虽是一个法律判决,但却可以产生巨大的政治后果。对这种政治结果,约翰·罗伯茨当然不会置身事外。实际上,他是法律上专业上的“技巧”(具体到其援引法律做出判决的专业手法及其长远的政治、法律影响,得另文说明),平衡了最高法院其他8名大法官中(4:4)的党派倾向,让最高法院“远离”政治。罗伯茨在判决中写道:“本法院成员受权解释法律,但我们既没有专业知识,也没有做出政策性决定的特权。做出这些政策性

决定的权力当属由民选产生的国家领导人。如果人民不同意他们的(政策性)看法,可以将他们选下来。我们的工作不是保护人民免受他们政治选择的影响。”

罗伯茨的上述说明,恰恰道出了权力制衡和司法独立的诸多精妙之处。在现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看来,权力制衡并非是权力与权力缠绕在一起,定要分出胜负的“贴身肉搏”,也并非是权力和权力“过不去”式的相互削弱和降低效率的钳制;民主制度下的权力制衡,其实是以不越权力之界(“做出这些政策性决定的权力当属由民选产生的国家领导人”)为前提的,而司法独立的保持,除了要积极地行使司法权力以外,对权力行使的消极态度(“我们的工作不是保护人民免受他们政治选择的影响”)也是使权力间的界限保持分明的必要条件。

在美国,司法独立只是权力分立的一个方面。而权力分立,则是整个国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之所以把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分置于不同的部门,并使之形成相互制衡的关系,其根本目的就在于限制权力。因此,说美国宪法的主旨就在于限制权力,这其实正触及了美国宪法的精髓。

不过,在党派政治中,所有国家权力,不论是



杜鲁门总统:“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把一个人送到最高法院,他就不是你的朋友了。”

行政权力、立法权力还是司法权力,都有政党竞争的因素掺杂其中。在美国,谁掌白宫,谁控国会,是由选民说了算的事。但是,哪个党派倾向的人能在最高法院大法官中占多数,却并不是有权任命大法官的总统都有机会能定夺的。出身不同党派的美利坚总统在其至多8年的任期内(连任四届的富兰克林·罗斯福除外),即使有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机会,也很少能够得到以本党政治倾向的人去替换不同政党政治倾向的大法官的机会。

这是因为,美国的权力分立制度,不只是纸面上的制度设计,而是有一系列精巧的技术手段作为运行保障的。在司法独立方面,“法官终身制”,是保证最高司法机构能够独立于有权任命其成员的总统的技术性支撑。实际上,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的历史上,除非不可抗力的病死和意外,几乎没有在任大法官在出身“异党”的总统掌控白宫时宣布退休,从而为该总统提供任命“异党”政治倾向的大法官来替代自己的机会。这样的做法,就在党派政治的背景下,“随机”而又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司法机构保持分立和独立的可能性。

在不同政党通过竞争以取得国家权力的政治制度中,由民选总统来任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虽有侵蚀法官独立性、进而危及司法独立的隐忧,但却是政党竞争权力制度下的相对最无害的做法,同时也是符合民主制度政治逻辑的办法。由民选总统来提名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这种权力的基础实际上也是选举中大多数民意的伸延。因此,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由民选总统任命的过程,实则也是大法官被多数民意间接授权的过程。正是总统的任命,使法官的产生过程“间接”具有民意基础。而这种民意基础,又反过来使最高法院这个司法机构具备与行政当局同样的独立根据,从而又以这种独立性,对行政和立法机构进行制衡。

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0多年的历史,其间44任美国总统共任命了110名大法官,平均每任总统提名任命大法官的机会不到3次。正是在这样的“平均”数中,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一人就独占了11次——因为华盛顿要行使总统职权来任命新组建的联邦最高法院的所有大法官。“运气”不好的总统,如卡特等4任总统则没有得到提名和任命大法官的机会。而大法官的平均任期几近15年,时长远超总统任期和总统连任的限制任期。因此,在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担任过首席大法官的人数只有17位,与44任总统的人数比起来要少得多。

因此,在大多数时间里,每个总统所“遭遇”到的联邦最高法院及其大法官的党派比例,都是随机的。但是,正如前述,“最高法院是选举结果的尾巴”,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遴选过程,实际上是受大多数民意间接授权的过程。正是这种民意背景,使得大法官也并非在每一事情上都以党派倾向来决定自己的立场。1974年,正是共和党出身的首席大法官伯格的一纸判决,导致了同样是共和党出身的时任总统尼克松的下台。而现任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此次“临阵倒戈”,也同样不是完全出于党派立场的考虑。

大法官的产生办法,基本上保证了司法机构的独立性,从而确保了司法独立的制度架构。司法独立,是把权力关进笼子中去的制度基础。由于在任总统所获得的民意,与在任大法官所间接获得的民意的不同步性,使得总统与大法官之间自然具有疏离感。这样的疏离感,是使最高法院大法官谨慎行事,使处于国家权力最高位的总统不敢为所欲为的原因。这是因为,“总统所做的好事,随着他们任期的结束而完结了。但是,他们所做的坏事却会继续留在最高法院”。

其实,美国司法独立性的政治和社会“效益”,还不只是使总统因忌惮独立的司法,而不敢随意行使手中的行政权力干所谓坏事,更重要的还在于,即使总统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来干“好事”,也不能随意。这是因为,从古至今,政治家们所干的坏事,都是在干好事的名义下成就的。或者说,由于没有权力的制衡,政治家们往往随心所欲,把好事也办成了坏事。如果干好事不易,坏事干成的可能性就更小。

这一点,从罗斯福推行“新政”过程中,其许多“利国利民”的法案屡屡在联邦最高法院遭到几乎所有大法官一致反对的事实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过,人们对法律的遵从,对法治的信心,也正是在这种不“跟风”的独立司法运作中建立起来。司法独立,是人们尊重法律,建树公正和正义标准的起码制度化环境。

此外,对于一个社会所有成员而言,司法独立,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法律执行体系,而是其自由生活形态的基石。对此,写出《通往奴役之路》的哈耶克可谓深有体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哈耶克正在美国推销他的这本著作。在出租车上,哈耶克从车载收音机的广播中听到了罗斯福总统病逝的消息。震惊之余,哈耶克听到了出租车司机——罗斯福总统与最高法院争执所在的那些“新政”法案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对罗斯福总统的评价:罗斯福是个好总统,但他不应该那样对待最高法院……这个评价,同样令哈耶克震惊。哈耶克由此想到,普通民众的独立判断和自由生活状态,是通向奴役之路上的最大障碍。而独立的判断和自由的生活状态,皆有赖于独立法官的示范和独立司法的保障。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官、法院都匍匐在行政权力之下,那么,还有哪个普通民众不跪倒在其面前呢?

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不是超党派的,但政治家们宁愿这些大法官是超党派的。在民主制度下,无论代表哪个党派的出面竞争国家权力者,都不能把国家权力的宝座焊在自己的屁股上。这就意味着,哪一个政党,都有可能成为政治竞争的失败者。摆脱“成王败寇”的制度性保证,就是一个独立司法体系的存在。在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最高法院的判决,导致布什成为总统,戈尔落败。但也仅此而已。最高法院并没有因为这个判决而得到总统的更多“关照”。而不仅是布什,所有美国当选总统,也都没有因为当选总统而有利用最高法院的机会,来打击报复政治竞争的对手。

因此,美国的司法独立,是美国政党政治下的司法独立。在两党政治竞争的过程中,通过种种复杂而精巧的制度设计,司法独立的制度依然稳固。■

(责任编辑 黄 钟)

# 我所目击的胡耀邦发病经过

○ 鲍 彤

前几日,偶然间看到贵刊2010年第2期,上面刊有一篇王敏清局长的署名文章,题目为《我参与了抢救胡耀邦》。读过之后,感到文中所谈的当年胡耀邦同志发病和抢救经过不够完整,有的与事实有相当出入。作为当年耀邦同志发病现场的目击者之一,我认为有必要致函贵刊,对这一历史瞬间的事实加以厘清。

该文在前半部分,驳斥了几种社会上流传的关于胡耀邦同志发病过程的说法,认为他们说的不符合事实。为了“以正视听”,作者叙述了他的经历,说,“1989年4月8日中午12点15分,我……突然接到中南海打来的电话,说‘胡耀邦病倒在怀仁堂’”之后,立即乘车赶往中南海,参加了抢救胡耀邦的过程。作者说他“当时是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局局长、内科主任医师,又是第一时间到达中南海现场的当事人,并处理了抢救胡耀邦的全过程,直到把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病房。”对于作者的身份,我不是很清楚。仅就其上面叙述的经过来看,至少他没有参加那个“全过程”。因为,耀邦同志发病的时间,不是中午12点前后,而是比作者得到通知的时间早了两个小时甚至更早一些。

1989年4月8日上午9时,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听取教委党组起草的关于教育改革文件的汇报。作为政治局常委的政治秘书,我列席了会议。胡耀邦坐在椭圆桌这头,主持会议的赵紫阳坐在那头。我们这些列席会议的人员坐在后排,我所坐的位置距离耀邦同志仅3~4米左右。

会议刚开始不久,我估计不到10点,耀邦在座位上,一边捂着胸口,一边向紫阳挥手,说:“紫阳同志,我这里不太舒服,要请假……”紫阳见耀邦用手按着心口,就问:“你是不是心脏有病……”耀邦一边挣扎着想站起来,一边说:“过去我自己也不知道,上次出差……(我不记得耀

邦是说‘湖南’还是‘江西’),他们(那里的医生)说我……”紫阳说:“你如果有心脏病,现在千万不要动,千万不要站起来,不要移动。”紫阳立即叫中办马上找医生。这时,耀邦已疼痛得说不出话了,靠在椅子上。紫阳问:“谁有心脏病的急救药?”政治局委员江泽民在座位上犹豫了一下,说,“哦,我有,我没有心脏病,从来不带这种东西,不过老伴一定要我带”,于是从包里找了一个急救包出来。可是在座的人都不知道急救药应该怎么用。这时,一位工作人员说,他知道,站起来讲解。

至于药是不是给耀邦服用了,我不清楚。反正中南海的保健医生、护士带着仪器药物很快就赶到了,立即投入抢救。又过了一会,看到医务人员在紧张工作,赵紫阳松了一口气,说:“我们腾地方,这里需要安静。为了保证对耀邦同志全力抢救,我们大家转移到勤政殿开会。抢救工作请家宝同志留在这里主持,有什么情况随时到勤政殿报告。”大家都依言迅速离开会场。后来,政治局会议快结束时,温家宝到勤政殿报告:“抢救过来了。”会议结束后,紫阳留下家宝,又详细询问了情况,叮嘱在可能时尽快转送医院。

这就是我所目击的胡耀邦同志发病的经过。这里,我想指出的是,贵刊所发的这篇文章中所谈到的,是作者在当天中午12点之后的经历,但是耀邦在两个小时前发病的第一时间,作者并没有在现场,他所了解的情况并不完整;他所否定和指斥为“臆造”的一些说法,有的是事实,有的与事实接近。

最重要的问题是,作者说,“我在做保健工作数十年期间,无数次的重病抢救中,从未见过有高层领导人在抢救现场指挥。”作者这些话,对其他人的抢救,想必符合事实,唯独不符合抢救胡耀邦的现场。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都在场,和我同坐在后排的芮杏文、阎明复、温家

宝等列席会议的人员,都看到了,可以证明,大家都非常关心耀邦同志的安危。而且,作者还进一步说,“领导人我一个也没见到!难道他们见我,都撤离了?”这句话不知道作者想说明什么问题。

胡耀邦同志是我们所尊重和爱戴的领导人。他在疾病袭来甚至可能危及生命的时候,仍

然坚守在他的岗位上。主持会议的赵紫阳同志在耀邦发病之后,立即叮嘱耀邦切不可起身走动,叫工作人员赶快请医生,在医生到达并开始工作后,决定中断会议,转移会场,以便为耀邦提供安静的抢救环境,这些都是事实。我作为目击者,有责任将亲眼所见讲出来,留给历史。

2012年6月12日

# 读《才德反差巨大的康生》引出来的话

## ——康生与山东土改整党及其他

○ 凌 云

《炎黄春秋》2009年2月号刊出曾彦修同志口述文《才德反差巨大的康生》。文中提出康生在山东土改整党中“扫荡了两个区党委”。一个指渤海区党委。这是对的。另一个指的是胶东区党委。他说的有误。

我想说说我所知道的情况。

全国土地会议后,康生原计划去冀中搞土改整党。他率领工作团在清风店战役前到达晋察冀中央局,参加全区干部会议。会议还没有结束,接到少奇同志的来电,说邓子恢同志在山东渤海区整党中发现那里的问题严重,请求中央工委去人支援。邓是不久前从华中转移到山东的,处理这类问题想必有困难。少奇同志要康生率领工作团立即转去山东渤海。到达渤海区党委所在地已是1947年年底。这里正在召开全区三级干部整党会议。康生在大会上第一次讲话就亮出他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号,掌握了整党工作的领导权。这次渤海整党,斗倒了书记景晓村、行署主任李人凤,还牵涉了别的一些人受到错误的批判以至处分。渤海整党中的错误,当然应由康生负主责。曾文说“扫荡”也不为过。

当时以康生为团长的工作团中,不少是老革命,如:高文华、杨之华、张琴秋、徐冰、张晓梅以及于光远等。应当说明,工作团全体成员列席整党大会,规定一条:只听(了解情况),不说(不讲话,不发表意见)。我认为所有的人都遵守了这

一条。整党结束后进行土改。这时,任弼时同志关于土改政策问题的讲话已经发表,康生准备留在山东工作已无暇顾及土改工作团的事,土改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曾文说的另一个被“扫荡”的,指的是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在山东整党中,林浩是重点人物,这不错。但说康生到胶东区党委“把林浩斗下来了”却不是事实。数年前,彦修同志发表在《炎黄春秋》的一篇文章中,也说到这件事,说是我与毛岸英陪同康生去胶东区党委的。这都不是事实。

事实是:康生到达渤海区党委稍作部署后,他对我说,许世友同志是背着“包袱”离开延安的(黄立功事件后)。这些年来,他没有回过延安。康生说,既来了山东应当去看看他,也有话同他说。当时许世友的司令部在胶东掖县。康和我及警卫员乘一辆吉普车去的掖县。没有毛岸英同行(确有一次毛岸英随康生出行,是去西柏坡。时间较晚。当时毛泽东到达那里,康去开会,带岸英去见他父亲)。康在许的司令部驻地住了两三天吧,即转去滨海区五莲县某村。那里是饶漱石与少数华东局负责人的驻地。这是康到山东后第一次与饶漱石见面。几天后原车回渤海。此行根本不了解胶东区党委在哪里,也没有同区党委任何人接触。

康生为团长的工作团于1948年5月潍坊解

放前结束。之前,康生已经中央决定留在山东,任华东局副书记,兼鲁中南区党委书记(由鲁中、鲁南、滨海等区刚合并起来的),并准备华东局南下后出任山东分局书记。这时山东全区的整党也到了结束的时候。康生到达华东局(驻地在益都闵家庄),饶漱石组织并亲自主持了一次参加人数众多的“报告会”,欢迎康生的到来,请康生作报告。

康生讲话的主题是山东整党,批判的矛头直指黎玉和当时被认为是黎玉左右手的林浩(胶东区党委书记)、景晓村(渤海区党委书记)。我以为这是康生到山东后,第一次就山东整党问题正式的公开的讲话。以他当时的地位,对饶漱石是很大的支持。康生对饶漱石视若仇人,起因在1950年夏,饶致电中央和康生,建议康离开青岛去杭州疗养,被康视为饶要把他赶出山东,结下了仇怨。

下面换一个话题。

曾文从“康生与曹轶欧两人闹得非常紧张,康生得了神经病”起的一段话,出于臆测。我想将事实补叙明白。

1949年10月康生因病去青岛休养后,只短期(数天)回过济南两三次,一直在青岛养病。山东分局的领导工作由副书记傅秋涛主持。曹轶欧是分局组织部副部长,留在济南,住在分局机关内。时间不长,主要是曹的原因,她同分局一些领导人的关系搞得很紧张。1950年春的一天,曹半夜找到省公安厅副厅长季明(原是延安

中社部的干部,与曹熟识),神情紧张,说她在山东分局内已遭到严密监视。季竭力解释,曹听不进去。第二天,分局领导们得悉后,既气愤,又无奈,多从一时神经错乱方面解释。如何处置呢?怕干扰康生养病,不能去青岛;去医院、休养所,曹一概拒绝。最后想到我,要我把她接到我家中,做做疏解工作。我提了两个条件,一是分局要为此做出正式决定;二是必须得到曹轶欧本人的同意。曹来我家后,住了三天,日夜缠扰,我无法应付。我真后悔做了这件蠢事。我建议分局立即送曹去青岛康生处休养,得到同意。傅秋涛亲来与曹谈话,派人送曹去了青岛。这件事是我与康生断交的开始。文革中,康生为什么要整我?说来话长,这里就不说了。

谁也想不到,这时康生在青岛也以为自己被监视着。监视他的是谁?诬指的是他亲自发电从中社部调来的秘书。康、曹两个阴谋家到了一起,从青岛到杭州,对这位秘书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处处提防,视之若仇敌。回到北京,秘书不要了,要相关组织进行审查。文革中,他拿到了当年刘少奇对审查报告的批示。批示中不仅说这是个“好同志”,还说康生有病,病人的话不能全信。康生大为震怒,立即组织专案组在曹轶欧亲自掌握下,对这位好同志进行残酷迫害。

这一对搞阴谋的恶人夫妻,文革中搞了多少冤案,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康生确有文才,成了他欺世盗名的资本。 ■

## 对黄家生质疑的回应

转来的黄家生的信收到。就信中所述回复如下:信中提到的刘少奇到上海一事,全是被采访者的话,有录音为据;采访李振田是1998年在北京,采访陆熙昶则是2001年在上海,两人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刘少奇建国初来上海休假一事,由于年代久远,老人们将1951年记成1950年,5天记成一个月也并不奇怪。工作人员有些苛刻的要求也许会有过。作为国家领导人,休假期间探望宋庆龄等名人也是有的,但這些小事都不会影响“开国元勋”们的“德高望重”。

景玉川

## 更正

本刊2012年第6期第46页左栏正文第2行至第12行“事情发生之后……建立民主统治。”与后文重复,应予删除。

本编编辑部

贵刊2012年第5期载晏乐斌《贵州的大饥荒年代》一文,人事记忆有误。本人一直在金沙工作,特作更正。其一,“遵义地委书记孟子明”,不对,孟子明当时是毕节地委书记;其二,王国民在金沙没有当过县长,只任过县委副书记,当时县长是邱继刚。但文章披露金沙“粮食关”时饿死8万多人是事实。

贵州读者 童礼双



全国免长话费咨询  
400-668-0650

# 愿人人都有作品传世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从事图书合作出版的文化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与多家出版社建立了密切业务关系。

## 代理出版：

- 个人出书：诗歌、散文、小说、生平传记、学术著作等。
- 老人出书：回忆录、自传、诗词、散文、思想理论著作、书画图册等。
- 家庭出书：家庭照片画册、家史档案、家谱族谱、先辈遗文、家族音像等。
- 学生出书：优秀作文集、书画作品集、学生纪念集、孩子成长图册等。
- 学校出书：教学经验谈、教研论文集、名师纪念集、名校成就图册等。
- 博客出书：个人博客作品集、网络专题作品合集、社区网文合集等。
- 旧书翻印：旧书急用少量翻印、书刊资料整编重印等。
- 电子音像：音乐、戏曲、录像摄影、光盘复制、磁带复制等。

另有：合作出书 常规出书 宣传推广 合作教材 录入排版设计 著作/署名/挂名/编著

## 出书类型：

- A类：国内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可在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查询。可在国内主渠道（新华书店等）发行销售。
- B类：无书号出版，用于交流与赠送，不进入书刊发行渠道，数量一般在300册以内

## 基本价格：

- 1、大32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三千元，300页印刷100本四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 2、16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四千元，300页印刷100本五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 (注：A类型代理出版的书，1000册起印；所有书籍无论开本印量越大越便宜。)

##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书稿详情（如需要公司寄送参考样书）→公司报价→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报送出版社（如需正规出版）→出版社三审三校（如需正规出版）→邮寄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回邮样书→印刷送书（附赠成书光盘）。

## 欢迎“组稿代理”与“项目合作”

目前，中国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传统文化精神逐步回归，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渐成热点；本公司大力开拓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网络数字传播与纸质书代理出版业务。尤其自（学生出版网）（老人出版网）（人人出版网）（出版发行网）开办以来，深受离退休老人与各地文联、作协、民间作者、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欢迎，每年代理出版作品近百余部；为方便作者就近洽谈与交稿，我公司设立“地方组稿代理”与“编辑出版分站”，请有写作经验与组稿能力的单位或个人洽谈合作。

服务热线：010-58608407 82057551 58608409  
传 真：010-58608409 投稿邮箱：5805191@163.com  
登陆网址：（老人出版网）www.lrchuban.com（学校出版网）www.xxchuban.com  
（人人出版网）www.rrchuban.com（出版发行网）www.51isbn.com  
公司名称：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邮编：102218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立汤路188号北方明珠大厦三号楼1509室

7月A类出版套餐优惠  
(新华书店发行销售)

32开1000册22800元起  
16开1000册26800元起

## A类出版作品展示



## B类出版作品展示



# 让每个老人都有回忆录、 让每个家庭都有家族史！



## 一、出书修谱、采编创作、音像制作：

个人出书，历史见证；家族出书，文化传承！本公司首创“三千元五十本起个人、家族订制型自费出书”模式，四年来编辑出版个人文集自传、家史家谱两千余种，同时提供录音整理、加工润色等文秘、创作服务，提供个人、家族电子相册、纪录片的拍摄制作服务，受到离退休老同志的热烈欢迎！

## 二、“老人出书沙龙”与“寻根修谱讲座”：

全国首家“家史家谱传记书店”坐落于中关村海淀图书城，定期举办“老人出书沙龙”与“寻根修谱讲座”吸引了

全国各地修谱写传的老同志、重视家族姓氏文化的老华侨，还有倾心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留学生、驻华文化官员、家谱研修学者。三十多家中外媒体前来采访报道，著名的有新华社、中国日报、光明日报、中国老年杂志、北京广播电台及香港卫视、凤凰周刊等！

## 三、家谱传记编写培训班

为了帮助不擅长写作的普通人实现修谱立传的愿望，我们组织专家编写了《怎样写自传》、《怎样编家史》、《家谱编修指南》等实用教材，将于近期开办“家谱传记编写培训班”，北京作者或身体情况较好的外地作者可以报名来京上课，出门不便的老同志可以报函授班自修结业。

## 四、家谱姓氏礼品

为了帮助大家学谱修谱，我们设计开发了自填式《传世家谱》，配套《家谱编修指南》，将望而生畏的修谱工程变成看图写字式的家庭作业，真正使家谱文化普及百姓家。《传世家谱》烫金彩印、庄重高雅，既是实用谱牒，也是交际法宝、赠礼上品！

## 五、欢迎开设地方分部：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与传统文化的回归，订制型“个人出书、家族出书”必将大为风行，成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一大时尚！仅北京一地家谱传记出版的年需求量就在五万部以上！各地老人都渴望出版个人与家族著作，只是苦于找不到专业服务单位。本公司现以“一间家谱传记特色书店，加一个出书组稿小组、一个家谱编修主管、一个培训讲座主管”的“1+3”模式面向全国招商，请各地有志于家谱传记、姓氏文化开发者洽谈代理、合作共赢！



服务热线：010-6892 0114

6252 5116

展示接待：北京海淀图书城25号“家史·家谱·传记书店” 邮编：100080

网 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家族出书网》(www.jzcsw.net)



北京回忆久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Beijing Memo99 Culture & Media Co., Ltd.

# 听您讲述人生经历 为您撰写回忆录

我们已为千余位主人公撰写了个人回忆录

您的回忆录是这样诞生的

- ◎历史顾问与您共同制定采访提纲
- ◎访谈人员和您一起回忆人生故事
- ◎专业撰稿人将您的经历凝练成文
- ◎资深编辑三审三校
- ◎设计师为您量身制作精美图书版面

回忆录咨询热线 400-653-6199

北京回忆久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歌华大厦B座11层

传真：010-84186201 邮编：100007

公司官网：<http://www.huiyi99.com>



**实践检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主席怎样培育8341部队**

**南京解放前后的陈修良**

**建国前党对新闻自由的说法与做法**

**贵州“文革”触及“贵州事件”**

**审判独立的60年纷争**

